



列 宁

进一步,退两步

1.3
13
0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进一步，退两步

（我們党內的危机）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ШАГ ВПЕРЕД,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

(Кризис в нашей партии)

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第7卷中的译文排印

列 宁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們党內的危机)

中共中央 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編譯局譯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 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7 $\frac{1}{8}$ · 插页 2 · 字数 165,000

1964 年 3 月第 1 版 1960 年 3 月第 2 版

1964 年 11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193 定价 (四) 0.62 元

一 印数 35,001—90,000

目 录

序言.....	1
(一)代表大会的准备.....	5
(二)代表大会上的派别划分的意义.....	7
(三)代表大会的开始。——組織委员会事件.....	11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19
(五)使用語言平等問題引起的事件.....	22
(六)土地綱領.....	30
(七)党章。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	38
(八)火星派內部分裂 以前 关于集中制問題的討論	46
(九)党章第 1 条.....	50
(十)无辜被加上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72
(十一)繼續討論党章。总委员会的成員.....	84
(十二)党章問題討論的結束。中央机关补选問題。 “工人事业社”代表退出代表大会.....	90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結束	104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爭的一般情况。党內的革命派 和机会主义派	132
(十五)在代表大会以后。两种斗爭方法	145
(十六)勿因小书而乱大謀	164
(十七)新“火星报”。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	176

(十八) 稍微談談辯証法。两个变革	206
附录 古謝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212
注釋	222

进 一 步,退 两 步

(我們党內的危机)¹

序 言

当持久的頑强的激烈的斗争进行的时候，通常经过一些时候就开始显出来一些中心的基本爭論点，战役的最終結局如何，就要看这些爭論点是怎样解决的，而斗争中所有一切細微的枝节問題，同这些爭論点比較起来，都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

我們党內的斗争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斗争引起全体党员的深切注意已經半年了。正因为我在向讀者叙述全部斗争的概况时不得不涉及到許多毫无兴趣的細节，許多实质上没有什么意思的无謂爭吵，所以我想一开头就請讀者注意两个真正中心的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很有意思的，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并且是我們党內当前最迫切的政治問題。

第一个問題是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們党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政治意义問題，这两个派别的划分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前的一切划分都远远地推到后面去了。

第二个問題是新“火星报”在組織問題上的立場的原則意义問題，因为这个立場真正带有原則性。

第一个問題是关于我們党內斗争的出发点，斗争的根源，斗争的原因，斗争的基本政治性质的問題。第二个問題是关于这个斗

爭的最終結果，鬥爭的結局，把一切屬於原則方面的東西綜合起來和把一切屬於無謂爭吵方面的東西剔除出去而作的原則性總結的問題。解決第一個問題要靠分析黨代表大會上發生的鬥爭情況，解決第二個問題要靠分析新“火星報”的新的原則內容。這兩種分析占了本書十分之九的篇幅，在分析中我們得出一個結論：“多數派”是我們黨的革命派，而“少數派”是我們黨的機會主義派；目前構成這兩派的意見分歧主要不是在綱領問題上，也不是在策略問題上，而只是在組織問題上；新“火星報”愈是努力加強自己的立場，這個立場愈是脫離由補選問題引起的無謂爭吵，則在新“火星報”上也就愈清楚地顯露出新的觀點體系，這就是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

現在論述我們黨內危機的一些報刊的主要缺點就是，在研究和闡明事實方面對黨代表大會的記錄幾乎完全沒有加以分析，而在闡明組織問題的基本原則方面，則對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同志在提出黨章第1條條文以及為這個條文辯護時所犯的根本性錯誤同“火星報”現在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性觀點的整個“體系”（當然這裡是指可以說得上的體系而言）之間顯然存在的聯繫，也沒有加以分析。關於黨章第1條條文爭論的意義，儘管“多數派”的刊物已經好幾次指出，但是現在的“火星報”編輯部似乎根本看不見這種聯繫。其實，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現在只是加深、發展和擴大他們最初在黨章第1條條文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其實，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者的整個立場，還在討論黨章第1條條文時就表現出來了；當時他們擁護散漫的、團結得不緊的黨組織；他們反對自上而下地建黨，即從黨代表大會以及它所建立的機關出發建黨的思想（“官僚主義”思想）；他們主張自下而上地建黨，讓任何一個大學教授、任何一個中學學生以及“每一個罷工者”都

能自封为党员；他们反对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加入党所承认的某一个组织的所谓“形式主义”；他们倾向于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屈服于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他们倾向自治制而反对集中制，总之，现在新“火星报”上流行的一切，使人愈来愈明确地看出他们最初所犯的錯誤。

至于說到党代表大会的記錄，那末对記錄采取这种实在不应该有的忽視态度，只能說是由于我們的爭論被一些无謂爭吵弄模糊了，也許是由于这些記錄中有大量的十分辛辣的真情实話。党代表大会的記錄使我們看到唯一、确切、完备、全面、充分和正确地反映我們党内真情实况的情景，那些参加运动的人自己描繪的各种观点、情緒和計劃的情景，我們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色彩及其对比力量、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的情景。正是党代表大会的記錄，也只有这些記錄，才能向我們表明，究竟我們已經在什么程度上真正清除了旧的、純粹小組的联系的一切残余，而代以統一的偉大的党的联系。每一个党员，只要他願意自覺地参加自己的党的事业，都應該仔細研究我們党的代表大会，——正是應該研究，因为只讀一遍記錄所包含的一大堆材料，还不能了解代表大会的情况。只有經過仔細和独立的研究，才能（而且应当）使簡短的演說提要，討論的枯燥摘要，小問題（似乎是小問題）的小冲突构成一个完整的東西，使每一个出色的发言人都党員面前以生动的姿态出現，使出席党代表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都很分明。本书作者如果能够推动大家广泛地独立地研究党代表大会的記錄，这项工作就算沒有白做。

还有一句話要奉告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他們一看見我們发生爭論，就幸災乐禍，洋洋得意；他們为了自己的目的，当然会竭力断

章取义，摘引我这本专门谈论我们党内种种缺点的小册子中的个别词句。可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是久经战斗的了，决不会为这小小的针刺所惊扰，却能够不管这些针刺，继续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而且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让敌人先生们试把他们“党”内真实情况的图画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哪怕只是稍微有些象我们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所提供的图画也好！

尼·列宁

1904年5月

(一)代表大會的準備

常言說，每一個人都有權利在 24 小時之內咒罵自己的審判官。我們的黨代表大會，也和任何一個政黨的每一次代表大會一樣，也成了某些覬覦領導地位而遭到失敗的人的審判官。現在，這些“少數派”分子怀着十分天真的心情“咒罵自己的審判官”，並且千方百計地想破壞代表大會的威信，減低它的意義和權威。這種傾向在“火星報”第 57 號發表的一篇署名為實際工作者²的論文中，可以說表現得最突出，該文作者對於代表大會是不可侵犯的“偶像”這一思想深表憤慨。這是新“火星報”的特點，我們決不能把它默默地放過去。大多數被代表大會否決的人員組成的編輯部，一方面繼續自稱為“黨的”編輯部，另一方面又竭力歡迎那些硬說代表大會不是偶像的人。這不是絕妙的嗎？先生們！是的，代表大會當然不是偶像，可是對於那些在代表大會上遭到失敗以後居然“譴責”起代表大會來的人，又該作何感想呢？

其實，請回想一下代表大會準備過程中的一些主要事實吧。

“火星報”从一开始就在 1900 年的出版預告中說過，在實行統一以前，我們必須劃清界限。“火星報”曾經力求把 1902 年的代表會議³變成非正式的會議，而不是黨的黨代表大會^①。“火星報”在 1902 年夏秋之間設法恢復這次代表會議上選出的組織委員會時，採取了十分慎重的行動。最後，劃清界限的工作結束了，——我們

① 見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記錄第 20 頁。

大家都认为是結束了。1902 年底，組織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火星报”欢迎組委会的确立，并在第 82 号社論中說，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刻不容緩的最迫切的必要的东西^①。可見，誰也沒有理由責备我們对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态度是匆忙的。我們的行动准则正是：裁衣以前量七次。我們有充分的道义的权利期待同志們在裁了以后就不要哭泣，也不要重新再量。

組織委员会制定了非常細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章程（那些現在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字样来掩盖自己在政治上毫无气节的人，也許会說这个章程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东西），并且交給所有的委员会討論通过，最后正式批准，其中第 18 条是这样規定的：“代表大会的一切決議和它所进行的一切选举，都是党的决定，各級党組織都必須执行。这些決議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借口来違抗，只有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才能取消或加以修改。”^②这几句話从前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就默默地通过了，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可是現在听起来，这些話好象專門給“少数派”下的判決詞，这就令人奇怪了，难道不是这样么！規定这一条文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走一下形式嗎？当然不是。这个决定看来是必要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党是由許多分散的和各行其是的集团組成的，它們可能对代表大会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这个决定正是表达了所有革命家的善良的願望（現在有人对这种願望未免讲得太多而且太不恰当，本来应当用“調皮的”字眼表示的东西却娓娓动听地用“善良的”字眼来形容了）。这个决定等于俄国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相互說出的真心話。这个决定應該保証一切同召开代表大会有关的巨大的人力、風險以及費用都不至于白費，應該

① 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 卷第 276—277 頁。——編者注

② 見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記录第 22—23 頁和第 380 頁。

保證代表大會不至於變成一幕滑稽劇。這個決定事先就規定任何不承認代表大會的決議及其選舉的現象是破壞信任的行為。

新“火星報”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說代表大會不是偶像，說代表大會的決定不是聖經，這究竟是嘲笑誰呢？這種發現有沒有“新的組織觀點”，或者只是一些想掩蓋舊痕迹的新企圖呢？

(二)代表大會上的派別劃分的意義

總之，代表大會是經過很細致的準備工作並根據十分完備的代表選舉制的原則召開的。大家一致承認代表大會的成分是正確的，並且認為全黨應該無條件地執行代表大會的決議，這是大會主席在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以後所作的聲明（記錄第 54 頁）中的提法。

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究竟是什麼呢？就是在“火星報”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則的和組織的基礎上建立真正的政黨。“火星報”三年來的活動以及大多數委員會對“火星報”的承認，這就預先決定了代表大會應該按照這個方針進行工作。“火星報”的綱領和方針應該成為黨的細領和方針，“火星報”的組織計劃應該在黨的組織章程中明文規定下來。但是，要達到這樣的結果，不經過鬥爭是不行的，因為召開代表大會時採用的完備的代表選舉制，可以保證那些會堅決反對“火星報”的組織（崩得和“工人事業社”）以及那些口頭上承認“火星報”是指導性的機關報，但是事實上卻別有企圖，並在原則方面表現得很不堅定的組織（“南方工人社”以及靠近該社的某些委員會的代表），都能出席代表大會。在這種情況下，代表大會不能不變成“火星報”方針的勝利而鬥爭的舞台。代表大會也確實成了這樣的鬥爭舞台，每一個稍微細心閱讀代表大會的記錄的人，馬上就會看清這一點。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詳細研究一下

在代表大会討論各種問題時暴露出來的最主要的派別，并根据記錄的精確材料重新揭示代表大會上每一個基本集團的政治面貌。在代表大會上由“火星報”領導而融合成為統一的政黨的那些集團、派別和色彩的真實面目究竟是怎樣的呢？——這是我們應當通過分析爭論情況和表決情況來闡明的问题。闡明這個問題，無論對於研究我們社會民主黨人的真正面目，或者對於了解產生意見分歧的原因，都是有根本的重要意義的。正因為如此，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以及我給新“火星報”編輯部的信件中，都着重於分析各種派別劃分。“少數派”中一些出面反對我的人（以馬爾托夫為首）根本不了解問題的實質。他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只限於提出一些局部的修正，對譴責他們轉向機會主義的問題作一些“辯解”，甚至沒有打算針對我的話描繪一下代表大會上派別劃分的其他任何情況。現在，馬爾托夫在“火星報”（第56號）上，企圖把一切想確切劃分代表大會上的各個政治集團的嘗試叫作簡單的“小組政客手腕”。馬爾托夫同志，你說得太厲害了！可是新“火星報”的厲害的話有一種獨特的屬性：只要我們把全部分歧的演變過程（從代表大會開始）確切地重提一下，這些厲害的話就會不折不扣地首先反對現在的編輯部。請你們這班提起小組政客手腕問題的所謂黨的編輯先生們看一看自己吧！

現在馬爾托夫一想到我們在代表大會上的鬥爭的事實就非常不愉快，以致他竭力想根本抹殺這些事實。他說，“所謂火星派分子是指那些在黨代表大會上以及在代表大會以前對‘火星報’表示完全同情，擁護它的綱領和組織觀點，贊成它的組織政策的人。在代表大會上，這樣的火星派分子共有40多人，——當時投票贊成‘火星報’的綱領並贊成承認‘火星報’是黨中央機關報的決議的就有這麼多人。”只要翻開代表大會的記錄就可以看出，除了阿基莫

夫一人棄權以外，全體代表一致通過了這個綱領（第 288 頁）。這樣，馬爾托夫同志硬要我們相信，無論是崩得分子、勃魯克爾以及馬爾丁諾夫，都曾經證明他們“完全同情”“火星報”並且擁護“火星報”的組織觀點！這是令人可笑的。這是把一切參加過代表大會的人在代表大會以後成為有平等權利的黨員（而且還不是所有的人，因為崩得分子已經退出去了）和在代表大會上引起鬥爭的派別混為一談。結果不是研究代表大會以後的“多數派”和“少數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組成的，反而暗中用“承認了黨綱”這麼一句冠冕堂皇的話來打掩護！

試拿在承認“火星報”是中央機關報問題上的表決情況為例。你們可以看出，馬爾丁諾夫，即現在被馬爾托夫同志硬說是擁護過“火星報”的組織觀點和組織政策的那個馬爾丁諾夫，堅決要求把決議案分成兩部分來表決：一部分是僅僅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另一部分則是承認“火星報”的功績。在表決決議案的前一部分時（承認“火星報”的功績，對它表示同情）贊成的只有 35 票，反對的有兩票（阿基莫夫和勃魯克爾），棄權的有 11 票（馬爾丁諾夫，5 個崩得分子，以及編輯部的 5 票；我和馬爾托夫各兩票，普列漢諾夫 1 票）。由此可見，反火星派集團（5 個崩得分子和 3 個工人事業派分子）在這裡，在這個對馬爾托夫現在的观点最有利的並且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例子上，也是暴露得極其明顯的。再看對於決議案的后一部分的表決情況，即對於不說明任何理由並且不表示是否同情而只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的表決情況（記錄第 147 頁），贊成的有 44 票，也就是連現在的馬爾托夫都算作火星派分子的 44 票。總票數是 51 票，除了編輯部的 5 票棄權以外，還有 46 票；有兩票（阿基莫夫和勃魯克爾）表示反對；可見在其余的 44 票中是包括所有 5 個崩得分子在內的。這樣一來，崩得分子在代

表大会上就成为对“火星报”表示完全同情的人了，——請看，正式的“火星报”就是这样撰述正式的历史！我們現在預先向讀者說明一下这个正式真理的真正动机：如果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沒有退出代表大会，那末現在的“火星报”編輯部就会成为而且真正会成为党的編輯部（而不是現在这样 quasi^① 党的編輯部）；正因为如此，所以也就需要把現在所謂党的編輯部的这些最忠实的卫士提升为“火星派分子”。不过这个问题要留待下文再詳細說明。

其次，試問：如果代表大会是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間的斗争，那末是不是还有一些动摇于两者之間的中間的、不坚定的分子呢？任何一个稍微了解我們党以及任何代表大会的一般面貌的人，都会 a priori^② 对这个問題作出肯定的回答。馬尔托夫同志現在很不願意提起这些不坚定的分子，于是就把“南方工人社”以及倾向于該社的代表描繪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把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意見分歧說成是微不足道和无关紧要的。幸亏現在我們面前有大会的全份記錄，我們可以根据文件材料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事实問題。我們在上面說明了代表大会上的一般派別划分情况，当然还不算是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正确地提出这个问题。

如果不分析各个政治派別，如果不把代表大会看作某些色彩之間的斗争的图画，那末就絲毫不能了解我們的意見分歧。馬尔托夫企图把崩得分子也算作火星派分子，以便抹杀各种色彩之間的区别，其实这不过是迴避問題而已。只要看一看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以前的历史，就可以 a priori 看出（以后可以檢查和詳細研究）三个主要集团：火星派，反火星派，以及不坚定的、犹豫的、动摇的分子。

① 冒牌。——編者注

② 預先。——編者注

(三)代表大會的開始。——組織委員會事件

在分析代表大會上的爭論情況和表決情況時，最好按照代表大會開會的順序來進行，以便循序漸進地指出那些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的政治色彩。只有在絕對必要時，我們才離開時間順序而綜合地考察有密切聯繫的問題或者性質相同的派別。為了不偏不倚，我們將力求指出所有最重要的表決，同時當然要撇開許多有關枝節問題的表決，這些表決占去了我們代表大會過多的時間（部分原因是我們沒有經驗，不善于使各專門委員會和全體會議分工討論問題，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一些幾乎是有意的阻撓）。

第一個引起爭論并使各種色彩的差別開始暴露出來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把“崩得在黨內的地位”一項提到第一位（作為代表大會“議程”第一項）來討論（記錄第29—33頁）。從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托洛茨基以及我所擁護的“火星報”觀點看來，這個問題是毫無疑問的。崩得退黨一事顯然證明了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既然崩得不願意同我們一道行進，不願意承認黨內大多數人和“火星報”一致主張的組織原則，那末“裝個樣子”好像我們是一道行進，那是沒有好處而且是荒謬的，只能阻礙代表大會的工作（正如崩得分子曾經阻礙過一樣）。問題早已在報刊上談得很清楚了，每一個稍微細心思考的黨員都知道，剩下的只是把問題公開地提出來，直言不諱地老老實實地作一個選擇：是自治制（那末我們就一道行進）還是聯邦制（那末我們就分道揚鑣）。

崩得分子在其全部政策方面一向是支吾其詞的，他們這一次也想支吾搪塞，故意把問題拖延下去。阿基莫夫同志曾表示贊同他們的意見，並且——大概是代表整個“工人事業社”——馬上提

出他在組織問題上同“火星報”的分歧意見(記錄第 81 頁)。站在崩得和“工人事業社”方面的有馬霍夫同志(他代表尼古拉也夫委員會的兩票，不久以前這個委員會還對“火星報”表示同情呢!)。當時馬霍夫同志覺得問題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並且認為“關於民主制，或者反過來說(請注意這幾個字!)關於集中制問題”也是個“疼處”，正如現在我們“黨的”編輯部中多數人所說的那樣，但是他們在代表大會上卻還沒有覺察到這個“疼處”!

總之，反對火星派的有崩得、“工人事業社”和馬霍夫同志，加在一起恰恰構成當時反對我們的那個 10 票的數目(第 83 頁)。贊成的有 30 票，——正如我們下面所看到的——火星派方面的票數經常在 30 票左右。當時有 11 票棄權，——大概是不願意站在互相鬥爭着的兩“黨”的任何一方。值得指出的是，當我們表決崩得的章程第 2 條時(由於這個第 2 條被否決，崩得退出了黨)，贊成第 2 條的以及表示棄權的也是 10 票(記錄第 289 頁)，而棄權的又是三個工人事業派分子(勃得克爾、馬爾丁諾夫和阿基莫夫)以及馬霍夫同志。可見，當表決崩得問題在議程上討論的次序問題的時候形成的派別，並不是偶然的。可見，所有這些同志不僅在討論次序的技術問題上，並且在實質上也是同“火星報”有意見分歧的。“工人事業社”在實質上所持的分歧意見是每個人都清楚的，而馬霍夫同志在關於崩得退黨一事的演說中却再好沒有地說明了自己的態度(記錄第 289—290 頁)。這個演說是值得談一下的。馬霍夫同志說，在通過了否決聯邦制的決議以後，“關於崩得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地位問題，在他看來已經由一個原則問題變成對待歷史上已經形成的民族組織的現實政策問題了”，這位發言人繼續說：“當時我不能不考慮到我們的表決可能產生的一切後果，因此我想投票贊成整個第 2 條”。馬霍夫同志出色地領會了“現實政策”的精神，

他在原則上已經否決了聯邦制，因此他在實踐上也就想投票贊成章程內實行這個聯邦制的那一條！於是這位“講求實際的”同志用下面的話說明了他那種深刻原則性的立場：“但是（好一個有名的謝德林式的“但是”！），由於代表大會的其餘一切參加者幾乎一致表決了，所以我是贊成還是反對就只有原則意義（II）而不會有什麼實際意義，於是我不肯棄權，以便原則地”……（上帝阿，把我們從這種原則性里救出來吧！）……“表明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立場是跟投票擁護該條的崩得代表們的立場不同的。相反地，如果崩得代表像他們自己預先主張的那樣對這一條棄權，那末我就會投票贊成這一條了。”誰能懂得這一點！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因為大家都說“不是”，就不肯大聲說一個“是”字，認為這樣說事實上是沒有用處的。

在表決了崩得問題的討論次序以後，接着在代表大會上又爆發了“鬥爭社”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也產生了極有趣味的派別分化，並且同代表大會上的最“關痛癢的”問題，也就是同中央機關的人選問題有密切聯繫。負責決定代表大會成分的委員會，根據組織委員會兩次決議（見記錄第388頁和第375頁）以及組織委員會代表在這個委員會中的報告（第35頁），反對邀請“鬥爭社”參加代表大會。

組委會委員叶哥羅夫同志說，“‘鬥爭社’問題（請注意：這裡說的是‘鬥爭社’，而不是該社的某一個成員）對於我是一個新問題”，於是她請求休會。為什麼組委會兩次解決過的問題對於組委會委員竟是一個新問題呢，——這始終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在休會時，組委會把當時偶然列席代表大會的委員（有幾個組委會委員是“火星報”組織中的老組員，沒有列席代表大會）^①召集起來開會

① 關於這次會議，請參看組委會委員和在代表大會以前被一致選為編輯部委託人兼編輯部第7個委員的巴甫洛維奇所寫的一封信*4（同盟記錄第44頁）。

(記錄第 40 頁)。關於“鬥爭社”問題展開了爭論。工人事業派分子表示贊成(馬爾丁諾夫、阿基莫夫和勃魯克爾,第 36—38 頁),火星派分子(巴甫洛維奇、索羅金、朗格⁵、托洛茨基、馬爾托夫等人)表示反對。代表大會又分裂成我們已經熟悉的那些派別。“鬥爭社”問題引起了頑強的鬥爭,馬爾托夫同志當時作了一個特別詳細的(第 38 頁)和“有戰鬥性的”演說,公正地指出俄國國內團體和國外團體的“代表名額不均等”,認為給國外團體以“特權”未必有什麼“好處”(真是至理名言,現在從代表大會以後發生的一些事件看來,這話是特別有教益的!),認為不應當助長“黨內組織上的混亂,即沒有任何原則性的理由就發生分裂”(真是一針見血地說穿了……我們黨代表大會的“少數派”!)。一直到停止報名發言時,除了工人事業派分子以外,沒有一個人有什麼理由公開表示支持“鬥爭社”(第 40 頁)。應該給阿基莫夫同志以及他的朋友們說一句公道話:他們至少沒有閃爍其詞,也沒有隱蔽觀點,而是公開地奉行自己的路線,公開地說出自己的想法。

在停止報名發言以後,按問題實質來發表意見已經是不容許的了,可是葉哥羅夫同志却“一再要求宣讀組委會剛才通過的決議”。怪不得代表大會的參加者對這種手法一致表示憤慨,連大會主席普列漢諾夫同志也表示“莫名其妙,怎麼葉哥羅夫同志一再堅持自己的要求”。看來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在代表大會全體代表面前按問題的實質公開而明確地發表自己的意見,或者是根本不發表意見。但是,既然已經同意停止報名發言,忽然又以做“結論”為借口向代表大會捧出組委會的新決議,並且正是對於已經討論過的問題的決議,這簡直是暗中放冷箭!

下午繼續開會,仍然莫名其妙的主席團決定放棄“形式手續”,而採用在代表大會上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的是後的方

法，即“同志式的解釋”的方法。組委會的代表波波夫宣讀了組委會的決議，這個決議是除了巴甫洛維奇一人反對以外由組委會全體委員通過的（第 43 頁），決議內容是建議大會邀請梁贊諾夫出席代表大會。

巴甫洛維奇聲明，他過去和現在都不承認組委會會議是合法的；組委會的新決議“同組委會以前的決議相抵觸”。這個聲明引起了很大的風波。另一個組委會委員，“南方工人社”的成員叶哥羅夫同志迴避切實地回答問題，而想把重心轉移到紀律問題上去。他說巴甫洛維奇同志似乎違背了黨的紀律（！），因為組委會討論過巴甫洛維奇的抗議並決定“不把巴甫洛維奇的個別意見通知代表大會”。於是爭論就轉到黨的紀律問題上了，普列漢諾夫在代表大會的熱烈掌聲下用教訓的口吻向叶哥羅夫同志解釋說：“我們這裡沒有什麼限權代表委託書”（第 42 頁，參看第 379 頁所載代表大會章程第 7 條：“代表不應當以限權代表委託書來限制自己的職權。他們在執行自己的職權時是完全自由和獨立自主的”）。“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機關”，因此違背黨的紀律和代表大會的章程的正是設法妨礙任何一個代表把所有一切黨內生活問題直接請求代表大會解決的人。於是，爭論問題就歸結於二者必居其一：是小組習氣呢，還是党性？是為了各種團體和小組臆造出的權利或章程而限制大會代表的權利呢，還是不僅口頭上而且事實上在代表大會面前完全解散所有一切下級機關和舊時的小團體，直到建立真正的黨的領導機關？讀者由此可以看出，在以實際把黨恢復起來為目的的代表大會上一開始（第三次會議）就爆發的這次爭論，有那麼重大的原則意義。這次爭論可以說是舊時的小組、小團體（如“南方工人社”）和復興的黨之間發生衝突的集中表現。於是各反火星派集團立刻就暴露了自己的面目：無論是崩得分子阿勃拉姆

桑，無論是馬爾丁諾夫同志，即現在的“火星報”編輯部的熱心的同盟者，或者是我們熟悉的馬霍夫同志，都發言支持叶哥羅夫和“南方工人社”而反對巴甫洛維奇。現在同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搶着以組織上的“民主主義”自夸的馬爾丁諾夫同志，甚至拿……軍隊做比喻，說軍隊中只有經過下級機關才可以向上級機關申訴！！這個“緊密結合的”反火星派的反對態度的真正意思，是任何一個出席過代表大會或者在代表大會以前仔細注意過我們黨內歷史的人，都完全清楚的。這個反對派的任务（也許不是該派所有一切分子都經常意識到的，不過有時是惰性使得他們這樣做），就是維護各個小團體的獨立性、獨特性以及狹隘利益，以免被廣大的、根據“火星報”的原則建立起來的政黨吞掉。

當時還沒有來得及同馬爾丁諾夫聯合起來的馬爾托夫同志，正是從這個角度看問題的。馬爾托夫同志堅決地並且公正地反對那些“認為黨的紀律只是意味着革命家應當服從他所參加的那個下級團體”的人。“在統一的黨內決不容許有任何強制性的（着重號是馬爾托夫加的）派別”，——馬爾托夫當時向那些擁護小組習氣的人這樣解釋，卻沒有料想到他的這些話正是斥責了他自己在代表大會快結束時以及代表大會以後的政治行為……強制性的派別對於組委會是不容許的，但是對於編輯部卻完全可以容許了。當馬爾托夫從中央的角度看問題時，他就譴責強制性的派別，可是，當馬爾托夫對中央人選表示不滿時，卻又堅持這種派別了……

值得指出的事實就是，馬爾托夫同志在他的演說中，除了指出叶哥羅夫同志的“重大錯誤”以外，還着重指出組委會所表現的政治上的不堅定性的。馬爾托夫公正地憤慨地說，“以組委會名義提出的建議，同委員會的報告（我們要補充一句，根據組委會委員的報告所作的報告，第43頁，柯里佐夫語）以及組委會從前的建議相抵

触”(着重号是我加的)。你們可以看出，馬尔托夫当时，即在他沒有“转变”以前，清楚地了解，用梁贊諾夫代替“斗争社”絲毫不能消除組委会行动上的极端矛盾性和极端动摇性（党員們从同盟代表大会記錄第 57 頁上可以看出，馬尔托夫在转变以后又是怎样看問題的）。馬尔托夫当时並沒有局限于分析紀律問題，他也直率地問过組委会：“有什么新情况使这种改变成为必要的呢？”（着重号是我加的）其实，組委会提出自己的建議时，甚至沒有足够的勇气像阿基莫夫等人那样公开维护自己的意見。馬尔托夫現在否认这一点（同盟記錄第 56 頁），但是看了代表大会記錄的讀者却可以看出是馬尔托夫錯了。波波夫以組委会的名义提出建議时，对于建議的理由一个字都沒有談（党代表大会記錄第 41 頁）。叶哥罗夫把問題中心轉移到紀律問題上去，但是他实质上只是說“組委会可能想出一些新的理由”……（但是究竟想出来沒有，以及想的什么理由呢？——都不得而知）……“它可能忘記提出某人等等。”（这“等等”二字就是該发言人的唯一后路，因为組委会决不会忘記它在代表大会以前討論过两次以及在决定代表大会成分的委员会以前討論过一次的“斗争社”問題）。“組委会所以通过这个決議，并不是因为它对‘斗争社’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只是因为它想消除将来党中央机关一开始活动时就会碰到的不必要的障碍。”这不是說明理由，同正是迴避說明理由。任何一个有誠意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們連想也沒有想到要怀疑任何一个参加代表大会的人的誠意）都想要消除他认为 是暗礁的东西，想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方法来消除这种暗礁。所謂說明理由，就是要解釋并且确切說明自己对于事物的看法，而不是用一些老生常談支吾搪塞。但是要說明理由，就非得“对‘斗争社’改变自己的态度”不可，因为組委会从前所通过的那些截然相反的決議也是想要消除暗礁的，但是那些決議所

认定的“暗礁”恰巧是在相反的方面。所以馬尔托夫同志非常激烈并且振振有詞地攻击这种理由，說这是一种“小气的”理由，是想“抵賴”才提出来的理由，并且劝告組委会“不要怕別人怎样議論”。馬尔托夫同志的这些話真把在代表大会上起过巨大作用的那种政治色彩的实质和意义形容得唯妙唯肖，因为这种色彩的特点正在于沒有独立性，小里小气，沒有自己的路綫，怕別人議論，永远在两个营垒之間动摇不定，怕公开說出自己的 *credo*^① 等等，——总之，就是带有“泥潭性”^②。

正因为这个不坚定的集团在政治上沒有气节，結果除了崩得分子尤金以外(第53頁)，誰都沒有向代表大会提出邀請“斗争社”的某一个成員出席代表大会的決議案。投票贊成尤金的決議案的有5票，——显然都是崩得分子；动摇分子又变节了！至于中間集团的大概票数究竟有多少，从大会代表投票表决柯里佐夫和尤金两人关于这个问题各自提出的两个決議案的結果可以看出：拥护火星派分子的有32票(第47頁)；拥护崩得分子的有16票，就是說，除了反火星派分子的8票以外，有馬霍夫同志的两票(第46頁)，“南方工人社”分子的4票以及另外两票。下面我們就要說明这样的分配决不是偶然的，但是我們首先要簡略地指出馬尔托夫現在对那次組委会事件的意見。馬尔托夫在同盟中硬說“巴甫洛

① 信条，綱領，世界观。——編者注

② 現在我們党内有一种人，一听到这个字眼就大惊小怪，拚命叫喊，說别人用非同志的态度进行論战。有人由于太愛讲(讲得不是地方！)官腔而使感覺失灵到十分奇特的地步……恐怕没有一个经历过内部斗争的政党不曾用过这个詞，因为这个詞一向是用来形容在各种战士之間搖来摆去的不坚定分子的。所以那些善于把党内斗争限制在严格的范围内的德国人，并不因为听见 *ever-sumpfit* (即“泥潭的”。——編者注)这个字眼而生气，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讲一种可笑的一本正经的 *pruderie* (官腔。——編者注)。

維奇等人的态度过火”。只要把大会记录拿来参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反对“斗争社”和組委会时发言最詳尽、最热烈和最激昂的正是馬尔托夫本人。他企图把“罪过”轉嫁到巴甫洛維奇身上，只不过暴露了自己的不坚定性：在代表大会以前由他投票选举到編輯部的第7个委員正是巴甫洛維奇，在代表大会上他是完全站在巴甫洛維奇方面(第44頁)来反对叶哥罗夫的；后来当他从巴甫洛維奇那里遭到失败以后，就轉过来責难巴甫洛維奇“态度过火”了。这只能令人发笑。

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56号)上諷刺說有人把邀請某某人的問題看成有重要意义的問題。这个諷刺又是反过来影射了馬尔托夫本人，因为正是組委会事件成了象邀請某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这样“重要”問題的爭論的伏綫。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由于是涉及自己的“下級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級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組习气，决不是党性态度。只要把馬尔托夫在同盟中的演說(第57頁)和他在代表大会上的演說(第44頁)对照一下，就可以充分証明这一点。馬尔托夫在同盟中說，“我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无論如何都要以火星派分子自命，却又以成为火星派分子为可耻”。不了解“自命”和“成为”之間的区别，不了解言和行之間的区别，——这才真令人奇怪呢。馬尔托夫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曾自命为反对强制性的派別的人，可是在代表大会以后他却又成为拥护强制性的派別的人了……

(四)“南方工人社”的解散

也許有人认为討論組委会問題时代表之間形成的派別是偶然

的。这种看法是錯誤的。为了消除这种錯誤看法，我們暫且离开時間順序，来分析一下在代表大会快結束时发生的同上述問題有密切联系的事件。这个事件是解散“南方工人社”引起的。在这里与“火星报”的組織方針对立的，即与主張团結全党力量、消除那种分散力量的混乱状态的方針对立的，是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集团在沒有真正的政党时曾做过有益的事情，可是当工作已經按集中制原則进行时，它就成为多余的了。从各个小組的利益着想，“南方工人社”同“火星报”旧編輯部一样有权利要求保存“继承性”，保存自己的不可侵犯性。从全党的利益着想，該社应当服从大会关于把該社力量調到“一定的党組織”中去的决定（第 818 頁，代表大会的決議末段）。从小組利益和“庸俗观念”来看，解散一个同“火星报”旧編輯部一样不願意解散的有益的团体，不能不是一个“棘手的”問題（魯索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語）。从党的利益来看，解散这个团体，使它“融化”（古謝夫語）在党内，是必要的。“南方工人社”公开說，它“不认为必須”自行宣告解散，而要求“代表大会果断地表示自己的意見”，并且要代表大会“立刻表示是或者不是”。“南方工人社”直接引証了“火星报”旧編輯部……在解散以后所引証过的那种“继承性”！叶哥罗夫同志說，“虽然我們大家是以个人为單位組成統一的政党，但是党終究是由許多組織組成的，这种組織应当受到尊重，因为它們是有历史性的单位…… 如果这样的組織对党沒有什么害处，那就不必解散它。”

这样就完全肯定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則問題，当时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由于他們自己的小組利益还没有提到眼前，都坚决反对那些不坚定的分子（这时崩得分子以及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已經退出了代表大会；不然他們一定会拚命主張必須“尊重有历史性的单位”的）。表決結果是 31 票贊成，5 票反对，5 票棄权（其中

4票是“南方工人社”分子，还有1票大概是别洛夫，这一点可以从他早先的声明中推测出来，第308頁）。这个拥有10票，激烈地反对“火星报”的彻底的組織計劃、捍卫小組习气而反对党性的集团，在这里已經表现得十分明确了。在討論中，火星派分子正是从原則上提出了这个問題（請看朗格的演說，第315頁），发言反对手工业方式和涣散状态，并不认为必須考虑个别組織的“同情”，而直截了当地說，“如果‘南方工人社’的同志們早在一两年以前就抱着較有原則的态度，那末党的統一事业和我們在这里所批准的綱領的原則的胜利早就达到了”。奥尔洛夫、古謝夫、利亚多夫、穆拉維約夫、魯索夫、巴甫洛維奇、格列博夫和哥林等人，都本着这个精神发了言。“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不但沒有表示反对这些屢次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肯定指明“南方工人社”、馬霍夫等人缺乏原則性政策和“路綫”的意見，不但沒有对这一点提出什么附带声明，反而以捷依奇为代表坚决贊同这些意見，斥責“混乱状态”，欢迎魯索夫同志“直接提出問題”（第315頁），但是这个魯索夫同志在同一次會議上又居然——真不得了！——敢于从純粹党的立場“直接提出”旧編輯部問題（第325頁）。

解散“南方工人社”的問題引起了該社的无比憤怒，这个迹象在記錄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要忘記，記錄只能約略地反映出討論情况，因为記錄沒有記下演說的全文，面只記下最簡略的概要和要点）。叶哥罗夫同志甚至一听到有人把“工人思想社”⁶的名字和“南方工人社”相提并論，就說这是“造謠”，——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代表大会上一般人对于彻底的經濟主义所持的态度了。叶哥罗夫甚至在很晚的时候，即在第37次會議上，还十分憤慨地提起解散“南方工人社”的問題（第356頁），并請求在記錄上写明：在討論“南方工人社”問題时，既沒有向該社社員征求过关于出版經費的

意見，也沒有征求過關於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的監督的意見。波波夫同志在討論“南方工人社”問題時暗示說，有一個緊密結合的多數派似乎已經預先決定了關於該社的命運問題。他說，“現在，在古謝夫同志和奧爾洛夫同志發言以後，一切都看得很清楚。”（第 316 頁）這些話的意思當然是說：現在，在火星派分子已經發了言，並且提出了決議案以後，一切都看得很清楚，換句話說，“南方工人社”將不是出自本意的被解散。“南方工人社”的代表自己在这里把火星派分子（並且是象古謝夫和奧爾洛夫这样的人）和自己的同道者分開，作為兩種不同的組織政策“路線”的代表。所以現在的“火星報”把南方工人派（大概也把馬霍夫？）形容成“道地的火星派分子”，只是清楚地表明，新編輯部忘記了代表大會上的最大的（從這個團體的觀點來看）事件，却想把那些足以說明所謂“少數派”究竟是由哪些分子組成的痕迹抹杀掉。

可惜，代表大會上沒有提到關於出版通俗機關報的問題。所有的火星派分子，無論在代表大會以前或者在代表大會期間都在會議以外非常熱烈地討論了這個問題，一致認為在目前黨內生活的情况下創辦這樣一個機關報或者把現有的某一個刊物改成這樣的機關報，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反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會上發表了相反的意見，南方工人派也在自己的報告中發表過這樣的意見，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或者由於不願意提出“沒有希望的”問題，才沒有提出由 10 個人署名的相當的決議案。

（五）使用語言平等問題引起的事件

我們仍然按照代表大會開會的順序往下談吧。

現在我們深信，還在代表大會沒有切實地討論各項問題以前，

就不仅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完全确定的反火星派集团（8票），而且清楚地暴露了一个决心支持这8个人而给它凌大到大约16—18票的中间的不坚定的集团。

代表大会对于崩得在党内的地位问题进行的非常详细而且过分详细的讨论，只是解决了原则性的提纲，实际的解决却一直拖延到讨论组织关系问题的时候。由于相当多的问题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在刊物上很详细地解释过了，所以代表大会上的讨论所提供的新东西也就比较少了。不过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工人事业派（马尔丁诺夫、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虽然表示同意马尔托夫提出的决议案，却又声明说，他们认为这个决议案不够充分，不同意从这个决议案得出的结论（第69、73、88、86页）。

崩得的地位问题讨论以后，代表大会接着就讨论纲领问题。这次讨论大部分是一些意义不大的局部修正。在原则上，反火星派的反对态度只表现为马尔丁诺夫同志激烈地反对所谓自发性和觉悟性问题的提法。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当然是一致拥护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顺便说一下，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也曾经指责过马尔丁诺夫的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可笑的是，现在“火星报”编辑部（大概是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已经转到马尔丁诺夫方面而且说出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相反的话来了！大概这是要符合于所谓“继承性”原则吧……我们只好静候编辑部把问题完全弄清楚时再向我们说明一下，究竟它是在什么程度上同意马尔丁诺夫的意见的，究竟是在哪一点以及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意的。在等待这个答案时，我们只想问一下，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党的机关报的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后竟说出恰恰同它在代表大会上说过的相反的话来呢？

现在我们不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问题的争论（前面

我們已經提到過了)，也不談党章問題辯論的开端(关于这些辯論，最好以后在分析党章問題的全部討論情况时再来談)，而談一下在討論綱領时暴露出来的那些原則性的色彩。我們首先指出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細节，即关于按比例分配代表名額問題的討論。“南方工人社”的叶哥罗夫同志主張把这一点写在綱領里面，于是波薩多夫斯基(少数派方面的火星派分子)公正地指出这里有“严重的意見分歧”。波薩多夫斯基同志說，“毫無疑問，我們在以下这个基本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是要使我們将来的政策服从某些基本民主原則而承认这些原則有绝对价值呢，还是使所有的民主原則都应当專門服从我們党的利益？我是坚决拥护后一种意見的”。普列汉諾夫“完全贊同”波薩多夫斯基的意見，并且用更肯定、更坚决的話反对那种认为“民主原則有绝对价值”的說法，反对“抽象地”看待这些原則。他說：“我們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定場合也許会反对普遍选举制。意大利共和国的资产階級曾經一度剝夺了貴族的政治权利。革命无产阶级也許会限制上层階級的政治权利，正如上层階級曾經限制过无产階級的政治权利一样。”对普列汉諾夫的发言有人鼓掌也有人嘘斥，当普列汉諾夫对 Zwischenruf^① (“你們不应当嘘斥”)提出抗議，并說同志們不要拘謹时，叶哥罗夫同志馬上站起来說：“既然这个发言有人鼓掌，那我一定要嘘斥。”叶哥罗夫同志和哥里德勃拉特同志(崩得代表)一同发言反对波薩多夫斯基和普列汉諾夫的看法。可惜辯論被中断了，所以辯論过程中产生的問題也就立即銷声匿迹了。但是馬尔托夫同志現在徒然企图减弱甚至完全抹杀这个問題的意义，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說：“这些話(指普列汉諾夫的話)激怒了一部分代表，假使普列汉諾夫同志

① 会場上的喊声。——編者注

当时补充說，自然很难設想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而必須踐踏象出版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的悲剧，那末这种憤怒是不难避免的……(普列汉諾夫說：《merci》^①)”(同盟記錄第 58 頁)。这种解釋根本同波薩多夫斯基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說法相矛盾，他当时完全肯定地认为在“基本問題”上是有“严重的意見分歧”和不同的意見的。关于这个基本問題，所有火星派分子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右派”反火星派分子(哥里德勃拉特)以及代表大会上的“中派”分子(叶哥罗夫)。这是事实，并且我們可以大胆地保証：假如“中派”(我想，这个字眼該比任何別的字眼都更少使“正式的”温情主义者感到难堪……)，假如“中派”(以叶哥罗夫同志或馬霍夫为代表)当时“随意”发表自己对于諸如此类問題的意見，那末严重的意見分歧是会立刻暴第出来的。

这种意見分歧在討論“使用語言平等”問題时就暴露得更明显了(記錄第 171 頁以及以下各頁)。关于这一点，表決情况要比討論情况表現得更明显，把表決的次數統計一下，可以看到一个不可思議的数目——16 次！导火綫是什么呢？导火綫就是：究竟是在党綱中只要指明全体公民不分性別等等以及語言一律平等就够了呢，还是必須指出“使用語言自由”或“使用語言平等”？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相当正确地估計了这一事件，他說：“关于党綱一項条文措詞的小小爭論，竟有了原則的意義，因为在代表大会上半數代表都决心推翻党綱起草委員會。”正是如此^②。引起冲

① 謝謝。——譯者注

② 馬尔托夫补充說：“在这里，普列汉諾夫关于驴子的挖苦話給我們带来很大的害处”(当談到使用語言自由时，仿佛有一个崩得分子列举各种机关而提到了养馬場，当时普列汉諾夫就自語自語地說：“馬是不会講話的，而驴子有时却会講話”)。我当然不认为这种挖苦話特別溫和、特別謙让、特別慎重和特別靈活。

突的导火綫确实很小，但是冲突毕竟具有真正的原則的性质，因而也就具有非常殘酷的形式，直到有人企图“推翻”党綱起草委员会，直到猜疑有人想要“欺騙代表大会”（叶哥罗夫就是这样猜疑过馬尔托夫的），直到彼此……破口大罵，反唇相譏（第 178 頁）。甚至波波夫同志也曾經“表示遺憾，认为一点小事竟造成这样紧张的气氛”（着重号是我加的，第 182 頁），一連三次（第 16、17、18 次）會議都充滿了这种气氛。

所有这些话都非常肯定、明确地指出一件最重要的事实：充滿“猜疑”和最殘酷的斗争形式（“推翻”）的那种气氛（即后来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有人硬說是由火星报多数派造成的气氛），其实远在我们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以前早就形成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这是一件基本事实，許多人往往由于不了解这件事而产生一种极輕率的想法，认为在代表大会快結束时形成的多数派是人为的。从現在硬說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中十分之九都是火星派分子的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由于一点“小事”，由于“小小的”导火綫就会爆发具有“原則性质”并且几乎弄到推翻代表大会党綱起草委员会地步的冲突，这是絕對解釋不通和絕對荒誕的。对“有过害处的”挖苦話用埋怨和表示遺憾的口吻来搪塞这件事，是令人可笑的。冲突是不会由于任何尖刻的挖苦話就有了原則意义的，只有代表大会上政治派别的性质才能决定

但我終於覺得奇怪的是，馬尔托夫既然承认爭論具有原則的意义，为什么完全不來分析这方面的原則性究竟表現在哪里以及暴露出怎样的色彩，却只限于指出挖苦話的“害处”呢。这才真是官僚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觀點呢！尖刻的挖苦話确实“在代表大会上有过很大的害处”，其中不仅对崩得分子說了挖苦話，还对那些有时受到崩得分子支持甚至由他們从失敗危險中救出来的人說了挖苦話。但是，既然已經承认这一事件有原則的意义，那就不能用指出某些挖苦話“不可容許”（同盟記錄第 58 頁）的說法来搪塞。

这样的意义。不是什么尖刻話或挖苦話引起了冲突，——这些話只是表明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別有“矛盾”，有引起冲突的一切前提，有一种依仗它的潜力，順着每一个甚至小小的导火綫爆发起来的内在分歧。

相反地，从我用来观察代表大会的观点——我认为我应该坚持把这种观点作为观察事件的某种政治見解，尽管有人觉得这种見解是一种侮辱的說法，——看来，由于“小小的”导火綫爆发出十分剧烈的原則性的冲突，是完全可以理解和不可避免的。既然在我們的代表大会上，时刻都有火星派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斗争，既然在他們之間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既然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共占三分之一的票数（8票+10票=18票中的18票，这当然是根据我的粗略計算），那末，火星派分子方面有一些人，哪怕是很小一部分人分离出去，就势必使反火星派的方針有可能取得胜利，因而引起“疯狂的”斗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十分自然的。这并不是由什么过分尖刻的胡言乱語或者攻击引起的，而是由政治的分化引起的。并不是什么尖刻話造成了政治冲突，而是代表大会上的派別本身存在的政治冲突造成了尖刻話和攻击，——这种截然相反的解釋，也就是我們和馬尔托夫在估計代表大会的政治意义及其成果方面的基本的原則性意見分歧的地方。

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間，使极少数火星派分子脱离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重大事件共有三次，即使用語言平等、党章第1条和选举問題，这三次事件都造成了終于引起現在的党内严重危机的残酷斗争。为了在政治上了解这个危机和这次斗争，不应该只限于空談什么有人讲过不可容許的挖苦話，而应该考察一下在代表大会上彼此发生冲突的各种色彩的政治派別。所以，“使用語言平等”事件对于說明分歧的原因是有双重作用的，因为馬尔托夫当时还

是(还是!)一个火星派分子,并且几乎比任何一个人更起勁地攻击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

战争是由馬尔托夫同志和崩得首領李伯尔同志的爭論开始的(第171—172頁)。馬尔托夫証明只要提出“公民平等”的要求就够了。“使用語言自由”的要求被否決了,但是立刻有人提出“使用語言平等”的要求,于是叶哥罗夫同志就同李伯尔一起加入了战斗。馬尔托夫說这是拜物教,“因为发言人坚决主張民族平等,而把不平等現象轉移到語言問題方面。其实,問題正应当从另一方面来考察:民族不平等現象是存在的,其表現之一就是屬於某一民族的人失去使用本族語言的权利”(第172頁)。馬尔托夫当时說得完全对。的确,李伯尔和叶哥罗夫毫无理由地妄想为他們自己的說法作辯护,并且企图証明我們不願意或者不善于实行民族平等原則,这真正是一种拜物教的态度。其实,他們正象“拜物教徒”一样坚持詞句而不坚持原則,他們作事不是怕犯什么原則錯誤,而是怕別人議論。这种动摇心理(如果“別人”因这一点而責备我們,那怎么办呢?),即我們在分析組織委员会事件时已經指出的心理,也就是我們的整个“中派”在这里表現得十分明显的心理。另一个中派分子,即与“南方工人社”密切接近的矿区代表李沃夫“认为边区提出的关于压制語言平等的問題是个很严重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在我們党綱中必須規定关于語言的条文,以便完全消除别人对社会民主党人可能主張俄罗斯化的猜疑”。請看这是多么美妙的說明問題“严重”的理由。問題所以很严重,是因为必須消除边区可能表示的猜疑!这个发言人根本没有談什么涉及到問題本质的話,根本没有回答別人提出的拜物教的指責,反而完全証实了这个指責,暴露出他們完全缺乏自己的論据,只是用边区說了什么来做借口。当时有人对他說:可能他們說的一切話都是不对的。而他

并不去分析这句话究竟说得对不对，却回答说：“别人可能猜疑。”

这样一种装模作样地硬说问题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提法，却真正有了原则性质，不过这完全不是李伯尔之流、叶哥罗夫之流、李沃夫之流想找到的那种原则性质。当时成了原则性问题的就是，究竟我们应该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运用党纲上规定的一般的原理，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条件上去并按照这个方向加以发展呢，还是因为害怕别人猜疑就应该用一些枝节的条文、局部的指示、翻来复去的语句和诡辩来充斥党纲的篇幅。当时成了原则性问题的就是，社会民主党人怎能把反对诡辩的斗争看成（“猜疑”）想缩小起碼的民主权利和自由的企图。我们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丢掉这种迷信诡辩的拜物教心理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由于“语言”问题引起斗争时产生的感想。

由于进行过好多次记名投票，所以在这个斗争中代表的派别划分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样的表决一共有三次。始终拚命反对火星派核心的，有所有反火星派分子（8票）以及只有一些很小变动的整个中派（馬霍夫、李沃夫、叶哥罗夫、波波夫、梅德維捷夫、伊万諾夫、蔡辽夫和别洛夫，——只有后面两个人起初表示动摇，时而棄权，时而投票贊成我們，直到第三次表决时才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态度）。火星派方面有一部分人，主要是高加索人（3个人共有6票）脱离出去了，于是“拜物教派”终于占了优势。在进行第三次表决时，当两种不同倾向的人们都已经十分确切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时，脱离火星报多数派而轉到敌对方面去的是一共拥有6票的3个高加索人，而脱离火星报少数派的是一共拥有两票的波薩多夫斯基和科斯提奇；在头两次表决中轉到敌人方面或棄权的，在火星报多数派方面有連斯基、斯切潘諾夫和哥尔斯基，在火星报少数派方面则有捷依奇。火星派方面有8票（从33票总数里）脱离出去，

結果就使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堅定分子的聯盟占了優勢。這就是代表大會派別劃分的基本事實，這一事實在表決黨章第1條以及在进行選舉時也是再次出現的（不過當時脫離出去的是別的火星派分子而已）。怪不得那些在選舉時遭到失敗的人現在竭力想抹殺他們失敗的政治原因，竭力想抹殺各種色彩之間鬥爭的出發點，而這個鬥爭却在全黨面前更厲害地暴露了和更無情地揭露了那些不堅定的、政治上沒有氣節的分子。使用語言平等事件所以特別明顯地向我們說明了這個鬥爭，是因為當時連馬爾托夫同志也沒有博得阿基莫夫和馬霍夫兩人的夸奖和贊許。

(六)土地綱領

反火星派和“中派”的不堅持原則，在討論土地綱領時也表現得很明顯，這次討論占了代表大會不少時間（見記錄第190—226頁），並且提出了不少很有趣的問題。果然不出所料，馬爾丁諾夫同志（在李伯爾和葉哥羅夫兩位同志發表了小小的責難意見以後）就對綱領發動了進攻。他提出一個舊論據，硬說我們要求修改“歷史上的這種不公平現象”就是間接地“尊崇歷史上的另一些不公平現象”等。葉哥羅夫同志也擁護他的意見，說他甚至“不了解這個綱領有什麼意義。提出這個綱領是為了我們自己遵循，即確定我們所要提出的那些要求呢，還是我們想使它成為大家歡迎的東西”（!?!?）。李伯爾同志“也想提出葉哥羅夫同志所提的意見”。馬霍夫同志本着他所固有的堅決精神發言說，“大多數(?)發言人都根本不了解這個綱領是個什麼東西，其目的何在。”據他說，這個綱領“很難認為是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這個綱領……“有一種把修改歷史上的不公平現象當兒戲的味道”，有“一種蠱惑人心和冒

險主义的色彩”。而他用来証实这个深奥思想的理論根据，就是庸俗馬克思主义者所慣用的誇張其詞和簡單化的手法，硬說火星派似乎“想把农民看作是成分一样的；既然农民早已(?)分化为几个階級，所以提出单一的綱領，势必使整个綱領成为蠱惑人心的东西，一旦实行起来就会成为冒險行为”(第202頁)。馬霍夫同志在这里“說穿了”許多社会民主党人对我們的土地綱領持否定态度的真正原因，他們虽然决心“承认”“火星报”(正如馬霍夫本人也承认它一样)，但是根本没有想过它的方針、理論立場和策略立場。正因为他们們在运用馬克思主义观察現代俄国农民經濟結構这样一种錯綜复杂的現象时把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所以他們始終不了解这个綱領，而决不是因为个别細节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于是，反火星派首領(李伯尔和馬尔丁諾夫)和“中派”首領(叶哥罗夫和馬霍夫)，很快就在这个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观点上趋于一致了。叶哥罗夫同志又直爽地表现了“南方工人社”以及所有傾向于它的团体和小組的一个特点，即他們不了解农民运动的意义，不了解我們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一批有名的农民起义时期表现的弱点，不是过高估計了这个运动的意义，而多半是过低估計了它的意义(而且是由于沒有充分的力量来利用这个运动)。叶哥罗夫同志說，“我絲毫不象編輯部那样迷恋农民运动，在农民騷动以后有許多社会民主党人都迷恋过。”只是可惜叶哥罗夫同志絲毫沒有向代表大会确切地指明編輯部的这种傾向究竟表现在哪里，也絲毫沒有具体地指出“火星报”所发表的文章。此外，他还忘記了，我們土地綱領的一切基本条文都是在“火星报”第3号^①上，即在农民騷动很久以前就已經發揮了的。誰如果不只是口头上“承认”“火星报”，那他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376—383頁。——編者注

不妨稍微多注意一下“火星报”的理論原則和策略原則！

叶哥罗夫同志感叹地說：“我們在农民中間絕不会有多大作为！”随后他又說明这种感叹不是表示反对某一个別“傾向”，而是否认我們的整个立場，“这也就是說，我們的口号不能同冒險主义口号相竞争。”这真是把一切都归结为各政党口号“竞争”的非原則态度的最典型的說法！并且这还是在他自称已經对理論解釋“表示滿意”以后說出来的，在这种理論解釋中指出：我們力求在鼓动工作中取得牢靠的成績而不怕暫时的失利，但是要取得牢靠的成績（不管那些“竞争者”……片刻的“竞争者”如何叫嚷），就非得有綱領的巩固的理論基础不可（第 196 頁）。既然自称对这种解釋已經“表示滿意”，又立刻重复从旧經濟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庸俗論点，认为“口号竞争”不仅可以解决土地綱領的一切問題，而且可以解决全部綱領以及整个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策略的一切問題，这是多么糊涂的观点。叶哥罗夫同志說：“你們决不能强迫雇农同富农一道为已經有不小一部分落到这些富农手里的割地而斗争。”

又是那一套显然同我們的机会主义經濟派有血統关系的簡單化的論調，經濟派硬說，不能“强迫”无产者去为現在有不小一部分已落到資產階級手里而将来还会有更大一部分落到資產階級手里的东西而斗争。又是那一套庸俗化的論調，忘記了俄国雇农和富农之間的一般資本主义关系的特点。現在，事实上受到割地重压的也有雇农，他們为摆脱奴役地位而斗争是根本不必“强迫”的。要“强迫”的只是某些知識分子。要强迫他們更广泛地看到他們担负的任务，强迫他們在討論具体問題时丢掉那一套死板公式，强迫他們考慮到使我們的目的复杂化并改变形态的历史情况。正因为有一种认为农民是傻子的偏見，即如馬尔托夫同志（第 202 頁）公正指出的，在馬霍夫同志以及其他反对土地綱領的人們的发言中流露出

来的偏見，所以这些反对者也就忘記了我国雇农生活的现实条件。

我們的“中派”分子把問題簡單化到只认为工人和資本家是对立的，因而力图把自己的狹隘观点强加在农民身上。馬霍夫同志說：“正因为我认为农民就其狹隘的階級观点的限度來說是聰明的，所以我以为他們会拥护夺取土地和分割土地的小資产階級理想。”这里显然是把两件事情混为一談；一件事情是把农民的階級观点估計为小資产者的階級观点，另一件事情是縮小了这个观点，把它歸結为“狹隘度量”。叶哥罗夫之流和馬霍夫之流的錯誤正在于做了这种歸結（也如馬尔丁諾夫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的錯誤在于把无产者的观点歸結为“狹隘度量”一样）。其实，邏輯或历史都教导我們，正是因为小資产者的地位有两重性，所以小資产者的階級观点可能是相当狹隘的，或者是相当进步的。所以，我們决不能因为农民眼光狹隘（“愚昧”）或者充滿“偏見”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們的任务是要始終不倦地扩大农民的观点，促使他們用理智战胜偏見。

对于俄国土地問題的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說在“火星报”旧編輯部的忠实卫士馬霍夫同志那篇原則性演說的結論中集中地表現出来了。怪不得这些話博得了掌声……虽然是諷刺性的掌声。普列汉諾夫曾說，我們絲毫不怕土地平分运动，我們不会阻碍这个进步（資产階級的进步）的运动。馬霍夫同志听了普列汉諾夫这些話以后憤慨地說：“我真不知道要把什么东西叫作不幸，但是，这个革命即便可以称为革命，也会是一个不革命的革命。更正确些說，不是革命而是反动（笑声），类似騷动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將使我們倒退，并且要經過相当時間才可以使我們重新回到我們现在的状况。而我們现在却有比法国革命时期更多得多的东西（諷刺的掌声），我們有社会民主党（笑声）……” 是的，如果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按照馬霍夫的观点看問題的，或者是由受到馬霍夫之流支持的中央机关来主持的党，那倒真好笑呢……

可見，就是在討論土地綱領所引起的一些純粹原則性的問題時，也立即表現了我們已經熟悉的派別划分。反火星派分子（8票）为拥护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而出馬上陣；尾隨在他們后面的“中派”首領們叶哥罗夫之流和馬霍夫之流，总是陷在那个狹隘的观点里面出不来。所以很自然的，在表决土地綱領的某些条文时，贊成的有80票和85票（第225頁和第226頁），就是說，恰巧是我們爭論崩得問題討論的次序时、在組委会事件时以及在討論“南方工人报”停刊問題时所看到的那个大概数目。每当問題稍微超出陈規，稍微要求把馬克思的理論独立地运用于新的（对德国人說来是新的）特殊的社会經濟关系时，真正胜任的火星派分子立刻就只占五分之三的票数了，而整个“中派”就立刻轉到李伯尔之流和馬尔丁諾夫之流方面去了。馬尔托夫同志却拚命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胆怯地迴避那些显然暴露出各种色彩的表决情况；

从土地綱領問題的討論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火星派分子同在代表大会上足足占有五分之二的人进行斗争的情况。高加索的代表在这里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場，——这也許多半是因为他們熟悉当地无数农奴制的殘余的各种表現，所以他們不贊成馬霍夫之流觉得滿意的那套抽象而幼稚的簡單对立法。当时发言反对馬尔丁諾夫和李伯尔，反对馬霍夫和叶哥罗夫的，有普列汉諾夫，古謝夫（他証实說，“对我們的农村工作所持的这种悲观看法”……即叶哥罗夫同志的那种看法……他“常常在俄国境内工作的同志中间听到过”），柯斯特罗夫⁷，卡尔斯基，还有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土地綱領的批評者的“各种忠告”“是十分庸俗的”。不过我們在談到研究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派別問題时必须指出，他的演

說(第 208 頁)把朗格同志同叶哥罗夫和馬霍夫兩人相提并論却不一定正確。誰如果仔細地讀一讀記錄就能夠看出，朗格和哥林兩人所站的立場跟叶哥罗夫和馬霍夫兩人的立場完全不同。朗格和哥林兩人不喜歡關於割地一條的提法，但是他們完全領會我們土地綱領的思想，不過他們企圖用另一種方式體現這個思想，積極努力找尋在他們看來更為完善的提法，提出自己的決議草案來說服土地綱領的起草人，或是站在土地綱領起草人方面反對所有的非火星派分子。例如，只要把馬霍夫關於否決全部土地綱領的提議(第 212 頁，9 票贊成，38 票反對)以及關於否決這個綱領的個別條文(第 216 頁等)的提議，拿來和朗格所提的關於割地兩題的條文(第 225 頁)的那種立場對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兩種立場是截然不同的^①。

托洛茨基同志在繼續談論那些有“庸俗氣味”的理由時指出，“在即將來臨的革命時期，我們應當同農民聯繫起來”……“在這個任務面前，馬霍夫和叶哥罗夫的懷疑態度和政治‘遠見’比任何一種近視要更有害”。另一個火星報少數派分子科斯塔奇同志，很準確地指出了馬霍夫同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堅持原則的態度”，——這個估計真是一針見血地打中了我們的“中派”的要害。科斯塔奇同志繼續說，“馬霍夫同志的悲觀態度是跟叶哥罗夫同志一致的，雖然他們各有不同的色彩。馬霍夫同志忘記了，社會民主黨人現時已在農民中間進行工作，已在可能範圍內領導農民運動。而他們卻用這種悲觀態度來縮小我們工作的規模。”(第 210 頁)

在快要談完代表大會討論綱領問題的情形時，還應該指出關於支持反政府派問題的簡短辯論。我們的綱領說得很清楚，社會

^① 見哥林的演說，第 213 頁。

民主党支持“任何反对俄国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⁸。看来，这后一个附带条件，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我們支持的究竟是哪些反政府派別。然而我們党内早已形成的各种不同色彩在这里也立即暴露出来了，本来很难設想在这样一个已經再三說明过的問題上还会发生“疑問和誤解”！显然，并不是由于什么誤解，而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色彩。馬霍夫、李伯尔以及馬尔丁諾夫立刻就惊惶不安了，結果又落到了“緊密結合的”少数的地位，馬尔托夫同志大概认为这也是由于有人进行陰謀、傾軋、玩弄权术以及其他种种卑鄙手腕（見他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而那些不善于思考形成“緊密結合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的政治原因的人就慣于訴諸这些东西。

馬霍夫又是从庸俗地把馬克思主义簡單化开始。他說“我国唯一革命的階級是无产階級”，接着他从这个正确的論点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結論：“其余的階級都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全場大笑）…… 是的，它們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想來利用一下机会而已。我反对那种主張支持它們的意見。”（第 226 頁）馬霍夫同志对自己立場作的这种絕妙的敘述，使許多人（他的許多同道者）都感到难为情，但是實質上，李伯尔和馬尔丁諾夫两个人和他的意見是一致的，都提議刪掉“反政府派的”字樣，或者只是添上“民主的反政府派”字樣。普列汉諾夫对馬尔丁諾夫的这个修正作了公正的反駁。他說，“我們应当批判自由派，揭露他們的不彻底性。这是对的…… 但是我們在揭露一切非社会民主运动的狹隘性和局限性时，必須向无产階級說明，同专制制度比較起来，就連不保証普遍选举制的那种宪法也是一种进步，所以无产階級不应当保留現存制度而舍棄这种宪法。”馬尔丁諾夫、李伯尔和馬霍夫三位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見，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当时发言攻击这个立場

的有阿克雪里罗得、斯塔罗維尔、托洛茨基等人，还有普列汉諾夫的第二大发言。馬霍夫同志在这里又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起初他說，其余的阶级（除了无产阶级以外）都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說，他“反对那种主張支持它們的意見”。后来，他又发慈悲心承认說，“资产阶级实质上虽然是反动的，但往往又是革命的，例如，在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的时候”。他又愈改愈糟地說，“可是，有些集团始終（？）是反动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的。”請看，后来拚命拥护旧編輯部的那些“中派”首領竟在原則方面发表了怎样的妙論！正是手工业者，甚至在行会制度十分盛行的西欧，也如同城市中其他小資产者一样，在专制制度崩潰时代起过特殊的革命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加思考地重复面談同志关于距专制制度崩潰时代 100 年和 50 年之久的現代手工业者所讲的那些話，是特別荒謬的。在俄国，硬說手工业者在政治問題上比资产阶级反动，只不过是背誦一些陈詞濫調而已。

可惜，記錄完全沒有写明馬尔丁諾夫、馬霍夫和李伯尔对这个問題提出的已被否決的修正案所得到的票数。我們能指出的只是，反火星派分子的各个首領和“中派”的一个首領^①在这里也結成了我們已經熟悉的反火星派分子的派別。在总结对于綱領問題的全部討論經過时，不能不做出这样的結論：沒有哪一次比較热烈和引起普遍兴趣的辯論不是暴露出馬尔托夫同志和“火星报”新

① 該派即“中派”的另一个首領叶哥罗夫同志，在另一个地方討論到阿克雪里罗得所提的关于社会革命党的决議案时，发表了他对于支持反政府派問題的意見（第 359 頁）。叶哥罗夫同志认为：在綱領上既要求支持任何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要对社会革命党人以及自由派持否定态度，这是个“矛盾”。叶哥罗夫同志在这里虽然是用另一种形式，稍微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問題的，但同样暴露出他也象馬霍夫、李伯尔和馬尔丁諾夫三位同志那样狹隘地理解馬克思主义，对他“所承认的”“火星报”的立場采取了不稳定的、半敌視的态度。

編輯部現在力圖掩飾的那些色彩的區別。

(七) 黨章。馬爾托夫同志的草案

代表大會在討論了綱領問題以後，接着就討論黨章問題（我們把前面提到的中央機關報問題以及各地代表所作的報告撇開不談，可惜大多數代表的報告都作得不能令人滿意）。不用說，黨章問題對於我們大家都有重大的意義。要知道，“火星報”從創辦時起就不僅以一個報刊機關，而且以一個組織細胞進行活動的。“火星報”在第4號專論（“從何着手？”）中提出了一個完備的組織計劃^①，並且三年來始終一貫地執行了這個計劃。當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時，說明這個決議的三條理由中（第147頁）有兩條正是談到“火星報”的這個組織計劃和組織思想；“火星報”在領導黨的實際工作方面的作用和它在統一工作中的領導作用。所以很自然，如果得不到全黨承認，如果不正式規定出明確的組織思想，“火星報”的工作和黨組織的整個事業，即事實上恢復我們黨的全部事業，就不能算是完成了。而黨的組織章程就應當完成這個任務。

“火星報”所力求奠定的作為黨組織的基礎的基本思想，實際上可以歸結為以下兩點。第一個思想，即集中制思想，是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的組織問題的方法。第二個思

^① 波波夫同志在關於承認“火星報”為中央機關報的演說中還說過：“我現在回想起‘火星報’第3號或第4號上所發表的‘從何着手？’一文。許多在俄國工作的同志都認為它是不妥當的，另一些人覺得這個計劃是個幻想，而大多數人（大概是波波夫同志周圍的大多數人）則說這不過是好大喜功而已。”（第140頁）讀者可以看出，這種把我的政治觀點解釋成好大喜功的說法，這種現在又被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同志煽起的說法，我早已厭倦了。

想——即承认进行思想领导的机关报的特殊作用——正是估計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在政治奴役的环境下暂时的和特殊的需要，即必須把最初的革命进攻的根据地建立在外国。第一个思想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貫穿在整个党章中；第二个思想是由活动地点和活动方式的暂时情况产生的局部性思想，即表面上离开集中制，而成立两个中央机关（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火星报”的这两个建党的基本思想，我在“火星报”（第4号）专論“从何着手？”^①一文以及“怎么办？”^②一书中已經發揮过了，后来我在“給一位同志的信”^③中几乎又是用党章形式詳細解釋过了。其实，只要做一些修訂工作就可以規定党章的条文，因为，如果承认“火星报”不是一紙空文，不只是一句应酬話，那末党章正应当把这些思想体现出来。我在“給一位同志的信”一书再版的序言中已經指出：只要把党章和本书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和那思談的組織思想是完全一致的^④。

讲到党章上“火星报”的組織思想的条文的修訂工作时，我要提到馬尔托夫同志所掀起的一次事件。馬尔托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說，“……你們考証事实时，就知道我的这一条（即第1条）条文陷入机会主义立場是如何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我曾經把我的草案給列宁看过，那里把第1条叙述得同我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一模一样。当时列宁表示反对我的草案，說这个草案写得太詳細了，并且說，他只喜欢第1条的思想，即关于党员的定义，他說要把这个思想用另一种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10頁。——編者注

② 同上，第313—500頁。——編者注

③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04—221頁。——編者注

④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117—118頁。——編者注

形式吸收到自己的党章中，因为他觉得我的条文不妥当。可见，列宁早就知道我的条文，知道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你们可以看出，我丝毫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而是不带遮眼罩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我曾经预先声明，我要反对相互补选，反对在补选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委员时采取一致同意的原则，等等。”（第58页）

关于预先声明反对相互补选一事，我们在一定的地方就会知道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马尔托夫的党章中的这种“不带遮眼罩”。马尔托夫在同盟里靠记忆叙述他那个不妥当的草案的插曲时（马尔托夫本人在代表大会上曾把这个草案当作不妥当的草案收回了，而在代表大会以后，又本着他所特有的一贯精神把它重新拖了出来），又是照例忘记了许多事情，因而又把问题弄模糊了。看来，已经有很多事实足以告诫大家不要引用私人谈话和凭靠本人记忆（有人总是不由得只记起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来说明问题，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终于因为没有别的好材料就利用了恶劣的材料。现在甚至普列汉诺夫同志也学起他的样子——大概是近墨者黑吧。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的“思想”是不能使我“中意”的，因为他的草案中根本没有后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那种思想。是他记错了。我侥幸在纸堆中找到了马尔托夫的草案，那里“第1条叙述得恰巧跟他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条文不一样”！请看这是什么“不带遮眼罩”呵！

马尔托夫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并且在党的机关（sic）^①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都可以成

① 原来如此 —— 编者注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我的草案第1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

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提出并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第1条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两相对比一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尔托夫的草案根本没有思想，而只是泛泛空谈。至于说党员应当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只能是这样的，只有爱说空话，爱在“章程”中堆砌大量空洞的词句和官僚主义的（就是说，对事业不需要，只有在装饰门面时才似乎需要的）公式的人，才会这样说。第1条的思想只有在这样提出问题时才会产生：党的机关实际上能不能对那些不加入党的任何一个组织的党员进行领导呢。这种思想在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中连一点影子也没有。所以我也就无法知道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对于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提出什么看法。可见，马尔托夫同志所作的事实考证竟是一笔糊涂账。

相反地，对马尔托夫同志正应该说，他从我的草案中“知道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且他无论在编辑委员会里——虽然我的草案在代表大会以前两三个星期就给大家看过了——无论在那些仅仅看过我的草案的代表面前，都没有抗议和反驳过我的这种看法。不但如此。甚至在代表大会上，当我提出自己的党章草案①

① 顺便说一下。记录委员会在第11号附录上刊载了“由列宁提交代表大会的党章草案(第393页)。记录委员会在这里也搞错了一些事情。它把我交给全体代表(并且在代表大会开会以前给很多代表)的最初的草案(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31—432页。——编者注)和我后来提交代表大会的草案混为一谈，并把第一个草案当作第二个草案刊载出来了。

并在选举党章起草委员会以前为这个草案辩护时，——馬尔托夫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声明：“我贊同列宁同志的結論。只是在两个問題上我和他有意見分歧”（着重号是我加的）——即关于总委员会組成的方法和一致同意补选的問題（第 157 頁）。这里对党章第 1 条条文問題上的不同意見，却只字未提。

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关于戒严状况的小册子里，居然又把自己的党章草案再一次并且特別詳細地重提了一下。他在这本小册子里硬說，他的党章草案，——对于这个草案，除了某些次要的細節以外，他現在（1904 年 2 月，——不知道过两三个月以后又会怎样）还是完全同意的，——“充分表明了他对于过分集中制的否定态度”（序言第 4 頁）。这个草案之所以沒有提交代表大会討論，据馬尔托夫同志現在解釋是因为：第一、“‘火星报’的教育启示了他对章程持藐視态度”（当馬尔托夫同志喜欢这样做时，他就不把“火星报”字样看作狹隘的小組习气，而看作最坚定的方針了！可惜三年来的“火星报”的教育沒有启示馬尔托夫同志对那些不坚定的知識分子在为自己違背共同通过的党章的行为辯护时慣用的那种无政府主义詞句持藐視态度）。第二、原来是因为他馬尔托夫同志，力求避免“在‘火星报’这样一个基本組織核心的策略中加进任何杂音”。說得多么头头是道呵！在关于党章第 1 条机会主义条文或关于过分集中制的原則問題上，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害怕杂音（只有从最狹隘的小組观点来看才是可怕的杂音），甚至在編輯部

我当然絲毫不反对別人把我的草案，哪怕是所有各个准备阶段的杂文一概公布出来，但是制造混乱毕竟是不應該的。而混乱終于造成了，因为波波夫和馬尔托夫（第 154 頁和第 157 頁）批評我实际提交代表大会討論的草案中的那些提法，原来是記錄委员会刊載出来的草案中所沒有的（參看第 394 頁第 7 条和第 11 条）。如果对待問題比較仔細，那只要把我剛才指出的一些頁数对照一下，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錯誤了。

这样一个核心面前都没有提出自己的分歧意见！在谈到关于中央机关成员的实际问题时，马尔托夫同志却逃避“火星报”组织（这个真正的基本组织核心）大多数人的意见而去向崩得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求救。马尔托夫同志暗中用小组习气替 quasi 编辑部辩护，责备最了解情况的人在估计问题时似乎表现了“小组习气”，他的这种言论分明带有一种“杂音”，但是马尔托夫同志竟看不见这一点。为了惩戒他，我们现在把他那个党章草案全部引证出来，并指出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观点和什么样的过分地方^①；

“党章草案。——（一）党员。（1）凡是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都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2）党员如果违反党的利益，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其党籍。（说明开除理由的决定书，应保存在党的档案库，并须根据每个党委员会的要求而通知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议，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委员会要求时，可以提交代表大会申诉）”……我打算用方括弧来表明马尔托夫草案中那些显然没有什么意思的议论，这些议论不仅没有什么“思想”，而且也没有什么肯定的条件或要求，——例如在“党章”中绝妙地指明决定书究竟要保存在什么地方，或者说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党籍的决议（而不是它的一切决议和任何决议吗？）可以提交代表大会申诉。这正是过分玩弄词藻或十足的官僚形式主义，专门杜撰一些多余的、显然没有益处或显然只能耽擱问题的条款。“……（二）地方委员会。（3）党委员会是党在地方工作中的代表……”（真是新颖而又聪明呵！）“……（4）[凡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存在的并派有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委员会，都可以认为是党的委员会]。（5）除了第4条指出的委员会以外，新的党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会或者承认该地方组织的现有成员为委员会，或者用改组该地方组织的办法来组成地方委员会〕。（6）委员会用补选的办法补充自己的名额。（7）中央委员会有权用相当数量的同志（它所了解的同志）补充地方委员会的名额，人数不得超过该委员会原有名额总数的三分之一……”好一

^① 我要指出，可惜我找不到马尔托夫草案的第一种稿本，这种稿本共有48条，其中有几条有更“过分的”毫无意义的形式主义。

个典型的官样文章，为什么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呢？有什么意思呢？这种根本起不了限制作用的限制——因为补充是可以重复许多次的——究竟有什么意思呢？“……（8）〔如果地方委员会自行瓦解或者遭到破坏〕（就是说不是全体被捕吗？）“中央委员会应当把它恢复起来”〕……（已经不考虑第7条了吗？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觉得第8条和敕令平日工作而节日休息的俄罗斯品行法相类似呢？）“……（9）〔党的定期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中央委员会改组某个地方委员会，如果该地方委员会的活动被认为是违反党的利益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该委员会就可认为已被解散，而该委员会所属地区的同志可以不受其管辖^①”〕……本条所规定的规则，同迄今俄罗斯法律中规定的所谓“禁止人人酗酒”的条文一样，是大有好处的。“……（10）〔党的地方委员会领导该地党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尽力协助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实现它所担负的全党的任务。〕……”咳！试问这究竟有什么意思呢？（11）〔“地方组织的内部规则，委员会和它所属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听见了吗，听见了吗？）“各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该集团的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难道权限范围和自治范围不是一回事吗？）“由委员会自行规定并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这里有一个缺点，没有说明这种报告应当保存在哪里）……“（12）〔委员会所属的各集团和各个党员，都有权要求把他们对于任何问题的意见和愿望报告给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13）党的地方委员会必须从自己的收入中按中央委员会分配的款数缴给中央会计处。（三）建立用其他语言（除了俄语以外）进行鼓动的组织——（14）（为了用某种非俄罗斯语言进行鼓动并把有关的工人组织起来，可以在特别需要把鼓动工作专门化并把这种组织划分出来的地方成立单独组织）。（15）至于是不是真有这种需要，这个问题由党中央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争论，则提交党代表大会解决……”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个章程后面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这一条的第一部分是多余的，而关于发生争论情况的第二部分，简直是滑稽可笑的……“（16）〔第14条所规定的地方组织在其特殊事务方面是自治的，但是它们在地方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工作并受其管辖，这种监督的形式以及该委员会和该特殊组织之间的组织关系的标准，由地方委员会规定……”（谢天谢地！现在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大堆话都是十分无聊的废话。）“……在党的

① 我们请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注意这个字眼。这还了得！你看这就是甚至……甚至竟敢更换编辑部成员的那种“雅各宾主义”的根源……

一般事务方面，这种組織应当作为委员会組織中的一个部分来进行工作。〕

(17)〔第 14 条所規定的地方組織，可以成立自治联盟，以便順利地执行它的特殊任务。这种联盟可以有自己專門的报刊机关和领导机关，但这种报刊机关和领导机关都应当受党中央委员会的直接监督。这个联盟的章程可以自行規定，但是必須經过党中央委员会批准。〕(18)〔如果党的地方委员会根据地方条件多半是用当地語言进行鼓动工作时，也可以加入第 17 条所規定的自治联盟。附注：这种委员会虽然是自治联盟的一部分，但并不因此不成其为党委员会了”〕……（整个一条都是非常有益处和非常聪明的，附注更是有过之无不及）……“(19)〔凡是加入自治联盟的地方組織同該联盟中央机关之間的一切联系，都应当受地方委员会的监督。〕(20)〔各自治联盟的中央报刊机关和领导机关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也和党的地方委员会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一样。〕(四)党中央委员会和报刊机关。(21)〔党中央委员会和报刊机关——政治的报刊机关和科学的报刊机关——是全党的代表。〕(22)中央委员会負責对党的全部实际活动实行总的领导，关心正确使用和正确配备全党的一切力量，监督全党各部分的活动，把报刊发给各地方組織，建立党的技术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23)党的报刊机关負責对党内生活进行思想领导，宣傳党綱，用科学的和辯論的方法闡明社会民主党的世界观。(24)所有党的地方委员会和自治联盟都同党中央委员会和党机关报編輯部发生直接联系，并定期报告本地的运动和組織工作情况。(25)党的机关报編輯部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26)〔編輯部在其内部事务方面是独立自主的〕，并且能在两届代表大会期間补充和更換自己的成員，但每次都必須通知中央委员会。(27)所有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声明或者經过它批准的声明，都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的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刊載。(28)党中央委员会經党机关报編輯部同意后，可以成立專門从事某种文字工作的作家团体。(29)中央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指定，一直工作到下一届代表大会时止。中央委员会可以用补选办法（人数不限）补充自己的名額，但每次都必須通知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五)国外的党組織。(30)国外的党組織主管党在国外侨民中的宣傳工作并組織其中的社会主义分子。国外的党組織由它們选出的领导机关领导。(31)加入党的各自治联盟可以在国外設立自己的支部，以便协助执行联盟的專門任务。这些支部以自治团体的資格加入总的国外組織。(六)党代表大会。(32)党代表大会是全党的最高机关。(33)〔党代表大会規定党綱、党章以及全党活动的指导原則，监督各級党

机关的工作并处理它們之間发生的冲突。) (34)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列組織和机关选派。(甲) 党的各地方委员会；(乙) 所有加入党的自治联盟的中央领导机关；(丙) 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編輯部；(丁) 国外的党組織。(35) 代表委托书可以轉托，但是每一个代表至多只能拥有三張代表委托书。两个代表可以拥有一張代表委托书。不准使用限权代表委托书。(36) 中央委员会如果认为吸收某同志参加代表大会有益处时，可以邀請該同志参加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37) 凡是有关修改党綱或党章的問題，須經出席代表总人数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时才能解决；其他問題則按普通多数表决来解决。(38) 代表大会只有在出席的代表能代表半数以上的現有的党委员会时，才可以认为有效。(39) 代表大会应当尽可能每两年召开一次。(凡因某种不以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为轉移的障碍不能如期召开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可以自行决定延期举行。)"

讀者如果能用极大的耐性讀完这个所謂党章，大概就不会要求我們专门分析以下几个結論吧。第一个結論：这个章程染上了难以医治的水肿病。第二个結論：这个章程根本没有什么对过分集中制持否定态度的特別色彩的組織观点。第三个結論：馬尔托夫同志把自己章程中的三十九分之三十八以上的东西都瞞过世人的耳目(并且不許在代表大会上討論)是作得很巧妙的。令人奇怪的只是，他为什么居然把这种隱瞞行为称为“不帶遮眼罩”。

(八) 火星派內部分裂以前关于 集中制問題的討論

在沒有談党章第 1 条这个确实有趣并且显然表明各种色彩的观点存在的問題以前，我們还要稍微談一下关于党章問題的簡短的一般討論，这次討論占去了代表大会第 14 次會議的全部時間和第 15 次會議的部分時間。这次討論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它是在“火星报”組織还没有因中央机关人选問題而完全分离以前进行

的。相反地，后来那些一般关于党章問題的討論，特别是关于补选問題的討論，都是我們已經在“火星报”組織內部发生分离以后进行的。自然，在尚未发生分离以前，我們还能比較不偏不倚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說，能比較不計較我們大家所关心的中央委员会人选問題而发表自己的意見。前面我已經指出，馬尔托夫同志当时贊成（第157頁）我的組織观点，只不过声明在细节上有两个分歧意見。相反地，不論是反火星派或“中派”，都群起攻击“火星报”的整个組織計劃（也就是整个党章）中的两个基本思想：既反对集中制，也反对“两个中央机关制”。李伯尔同志把我的党章称为“有組織的不信任”，把两个中央机关制看作分权制（同波波夫和叶哥罗夫两位同志一样）。阿基莫夫同志主張扩大地方委员会的权限，尤其是要給以自行“改变自己成員的权利”。“必須給以更大的活动自由……地方委员会应当由当地积极的工作人員选出，正如中央委员会是由俄国所有积极組織的代表选出一样。如果这也不許可的話，那末就要把中央委员会指派到地方委员会的委員名額限制一下……”（第158頁）。可見，阿基莫夫同志在那里提出了反对“过分集中制”的理由，但是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没有因在中央机关人选問題上遭到失敗而跟着阿基莫夫跑，所以他对这些权威性的指示还是充耳不聞的，甚至当阿基莫夫同志把馬尔托夫同志自己那个章程的“思想”（第7条——限制中央委员会指派委員加入地方委员会的权利）讲給他听时，他还是置若罔聞的！馬尔托夫同志当时还不願意唱出同我們意見不一致的“杂音”，所以他也就忍耐了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他本人意見不一致的杂音……当时发言攻击“可怕的集中制”的只有那些觉得“火星报”主張的集中制对他們显然不利的人，即阿基莫夫、李伯尔和哥里德勃拉特，小心翼翼地（所以如此，是为了随时可以向后轉）跟着他們走的有叶

哥罗夫(見第 156 頁和第 276 頁)等等。当时党内絕大多数人都明白，崩得、“南方工人社”等等正是根据那种狭隘的小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順便說一下，現在党内大多数人也看得很清楚，“火星报”旧編輯部正是根据那种小組利益反对集中制的……

例如拿哥里德勃拉特同志(第 160—161 頁)的演說來說吧。他拚命攻击我所主張的“可怕的”集中制，說这种集中制是要导致下級組織的“消灭”，“完全是想使中央机关有无限大权来随意干預一切”，而各級組織“只有权馴順地服从上級的命令”等等。“按照这个草案組織起来的中央机关将是孤独的，它周圍不会有任何外圍，只有一些无定形的散漫人群，而它那些唯命是听的代办員就会在这个散漫人群中进行活动。”这也就是馬尔托夫之流和阿克雪里罗得之流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敗以后用来款待我們的那套虛伪空話。人們會譏笑崩得，因为它一方面反对我們的集中制，同时又使自己那里的中央机关拥有更明确規定的无限权利(例如，任意吸收黨員和开除黨員，甚至不許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人們了解了問題真相以后，也会嘲笑少数派的嚎叫，因为他們自己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大声疾呼地反对集中制和党章，而現在当他們占了多数时，立刻就又按党章办事了。

在两个中央机关制的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了派別划分：反对所有火星派的有李伯尔，有阿基莫夫(他首先唱出了現在阿克雪里罗得和馬尔托夫愛唱的調子，說总委员会內中央机关报压倒了中央委员会)，有波波夫，还有叶哥罗夫。根据旧“火星报”一向發揮的(而且是波波夫之流和叶哥罗夫之流的而志們在口头上贊成过的)那些組織思想，自然要产生两个中央机关并存的計劃。旧“火星报”的政策，是同“南方工人社”主張創辦一个平行的通俗机关报并把它变成事实上占主要地位的机关报的計劃截然相反的。这就

是当时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泥潭派主張一个中央机关，即主張似乎更厉害的集中制的那种初看起来很奇怪的矛盾現象的根源。当然也有（特别是泥潭派中間）一些代表，未必清楚地了解“南方工人社”的組織計劃将会引起，并且由于客观进程一定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是他們那种优柔寡断和毫无自信的天性，把他們推到反火星派方面去了。

在火星派分子当时（在火星派尙未分裂以前）参加党章問題爭論的发言中，馬尔托夫（“贊成”我的組織思想）和托洛茨基两位同志的发言特別值得注意。托洛茨基当时回答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时說的每一句話，都彻底揭露了“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行为和理論的全部虛伪实质。“他（阿基莫夫同志）說党章規定的中央委员会的权限不够确切。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見。恰恰相反，党章对这一点規定得很确切，既然党是一个整体，那就必須保証它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李伯尔同志用我所用过的字眼說，党章表明‘有組織的不信任’。这是对的。但是，我用这个字眼是指崩得代表所提出的那个章程，因为他們的章程是意味着党内一部分人对全党表示有組織的不信任。而我們的党章”（在中央机关人選問題上还没有遭到失败时，这个章程还是“我們的”！）“則意味着党要对它的各个部分都表示有組織的不信任，就是說，要对各地方組織、各区組織、各民族組織以及其他組織实行监督”（第158頁）。是的，我們的党章在这里被估計得很正确，我們奉劝現在那些公然說“有組織的不信任”制度或所謂“戒严状况”制度是由阴險毒辣的多数派发明和实行的人多回忆一下这种估計吧。只要把上面引用的演說和他們在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演說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政治上毫无气节的典型事实，即馬尔托夫这伙人怎样从有关他們自己的下級团体还是有关別人的下級团体出发而改变自己的观点。

(九) 党章第 1 条

上面我們已經引用了在代表大会上引起热烈的有趣的爭論的不同条文。这种爭論几乎占了两次會議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記名投票結束的（我記得，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間，似乎只举行过八次記名投票，由于这种記名投票花費時間太多，所以只在特別重要的情況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問題无疑是帶原則性的。代表大会对于爭論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們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現象，这也証明，所有参加爭論的人都很关心這個問題。

試問，爭論問題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經說过，后来又不断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們的意見分歧（关于党章第 1 条的分歧）有决定全党生死存亡的严重意义。我們决不会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 250 頁）^① 这种意見分歧，虽然揭露出各种原則上不同的色彩，但是它本身無論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說，这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見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竭力寻求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末就会变成大的意見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見分歧，如果成为轉向某种錯誤見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錯誤見解又由于新增加的意見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結合起来，那末这种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 1 条問題引起的比較不太大的意見分歧，現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見分歧成了少数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55頁。——編者注

派(特别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轉折点。正是这种意見分歧奠定了火星报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結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直到选举时已經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入选問題上发生的根本的主要分歧。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問題上所犯的小錯誤,原是我們器皿上的一个小裂縫(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說的那樣)。这个器皿本来可以用繩子把它捆紧(而不是用絞索弄裂,就象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間几乎陷于瘋狂状态的馬尔托夫所听錯的那樣)。但是也可以想方设法使这个裂縫扩大,以至弄裂这个器皿。由于热心的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結局就是后一种情况。对党章第1条的意見分歧在中央机关入选問題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馬尔托夫在这个問題上遭到失敗,也就使他走向用非常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鬧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則斗争”。

現在,經過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問題已經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們应当确切地認識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的派别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應該确切地認識到早在討論党章第1条时就已經暴露或者开始暴露出来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真实性。現在,在讀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問題的提法已經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馬尔托夫的条文,像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說的那樣(第833頁),表明他的(或者他們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者像普列汉諾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樣(同盟記錄第102頁以及其他各頁),表明他(或者他們)傾向于饒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諾夫拥护的我的条文,表明我在集中制問題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

主义的、昏聩刚愎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就是这样。在切实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件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夸大一点的话）是历史行程决定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哥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non liquet，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难以认清一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根本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拿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学教授”的例子作开场白就是很恰当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說，党应当是组织^①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

① “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一些细胞。广义的是指这种细胞团形成一个整体的总和。例如，海軍、陆軍和国家，既是許多组织（从該詞的狭义來說）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該詞的广义來說）。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該詞的广义來說），同时它又是由許多组织（从該詞的狭义來說）组成的。同样的，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該詞的广义來說）；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許多不同的组织（从該詞的狭义來說）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談論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为一谈了。

一个整体)，那末，这是不是說我把党和組織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願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階級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組織的，使党只容納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組織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論敌却把有組織的分子和无組織的分子，接受領導的分子和不接受領導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組織的——混淆不清地搞到党内。这样的混淆不清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組織”（“土地与自由党”和“民意党”）为例，說这些組織周圍“聚集了許多虽然没有加入組織，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自认为是黨員的人…… 这个原則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組織內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們就談到一个关键問題：“这个原則”，即許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組織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党”的人自称为黨員的原則，真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則嗎？普列汉諾夫对这个問題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說：“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組織严密、紀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圍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組織，而在这些組織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黨員，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損失。我們不應該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原則的“这个原則”，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則。誰要想推翻这个結論，必須証明在組織以外有可能实现監督、領導和紀律，就必须証明有必要使“混乱状态中的分子”得到黨員的称号。拥护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証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証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为了把这个例子所

包含的思想彻底引伸出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应当更进一步地说：有組織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承认这个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沒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問題，那他就是中途拋棄了自己的論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組織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末他們为什么又不把这位教授編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組織里面呢？只有把他編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适应，才不致成为空話（而大学教授們的声明往往就是这样的空話）。或者是没有組織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末給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的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了。所以，归結起来說，問題正在于究竟是彻底实行組織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們究竟是应当以已經形成的、已經团結起来的 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譬如說，已經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应当扩大和增加各种党組織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設党呢，还是可以滿足于所謂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的 空話？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繼續說，“我們采納列宁的条文，就会把一部分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組織中，但終究还是些党员的人抛到大門以外”。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錯誤，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 都是 党员这种說法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个問題引起了爭論，而我的論敌还应当来 証明 这种解釋是必要的和有益处的。所謂“抛到大門以外”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字样，究竟有什么內容呢？如果只有已被承认为党組織的那些組織中的成員才能称为党员，那末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組織的人，也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組織中工作。如果所謂抛到大門以外，是指沒有工作机会，沒有参加运动的机会，那就根本

談不上什麼拋到大門以外。相反地，我們容納真正的社會民主黨的黨組織愈堅強，黨內的動搖性和不堅定性愈少，則黨對於在它周圍的、受它領導的工人羣眾的影響，也就會愈加廣泛、全面、巨大和有效。顯然絕對不能把作為工人階級先進部队的黨和整個階級混為一談。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既然說，“當然我們要建立的首先是黨的最積極的分子的組織，即革命家的組織，但是我們既然是階級的黨，就應當想法不把那些雖然不十分積極可是自覺地靠近這個黨的人拋在黨外”，其實他的說法正是犯了混為一談的錯誤（這種錯誤根本就是我們的機會主義經濟派的特点）。第一、列為社會民主工黨積極部分的，決不是只有革命家組織，還有許多被承認為黨組織的工人組織。第二、究竟有什麼理由，按照什麼邏輯，可以根據我們是階級的黨這一事實，就做出結論說不必把加入黨的人和靠近黨的人區分開來呢？恰恰相反，正因為人們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有所不同，所以必須區別他靠近黨的程度。我們是階級的黨，因此，幾乎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期，在國內戰爭年代，甚至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的領導下行動，都應當盡量緊密地靠近我們黨；但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在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者整個階級都能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部隊即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洛夫精神和“尾巴主義”。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懷疑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連工會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為落後階層的覺悟程度接受的組織）也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者整個工人階級。忘記先進部隊和傾向於它的所有羣眾之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的經常責任是把愈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這個先進的水平，那只是欺騙自己，漠視我們的巨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抹殺靠近黨的分子和加入黨的分子之間的區別，抹殺

自覺的積極分子和幫助黨的分子之間的區別，其實就是漠視和遺忘的表現。

拿我們是階級的黨做借口來為組織的渙散狀態辯護，為把有組織和無組織現象混為一談的觀點辯護，就是重復納杰日丁的錯誤，因為他“把運動要在‘深處’‘扎根’這一哲學的和社會歷史的問題同組織技術問題混淆起來了”（“怎麼辦？”一書第91頁）^①。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首倡出來的這種混淆，後來被擁護馬爾托夫同志條文的那些發言人重復過幾十次了。“黨員稱號散布得愈廣泛愈好”，——馬爾托夫這樣說，但是他沒有說明這種名不副實的稱號散布得廣泛究竟有什麼好處。對不加入黨組織的人實行監督，這不是一句空話嗎？空話如果廣泛散布，那是有害而無益的。“如果每一個罷工者，每一個示威者，都能夠自作主張地宣布自己是黨員，那我們只會對此表示高興。”（第289頁）真的嗎？每一個罷工者都應當有權宣布自己是黨員嗎？馬爾托夫同志的這個論點一下子就使他的錯誤變得更加荒謬，把社會民主主義降低為罷工主義，重蹈阿基莫夫之流的覆轍。如果社會民主黨能夠領導每一次罷工，我們當然是對此表示高興的，因為社會民主黨的直接的和責無旁貸的義務就是領導無產階級的各种表現形式的階級鬥爭，而罷工就是這個鬥爭最深刻最強有力的表現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初步的 *ipso facto*^② 不過是工聯主義的鬥爭形式同全面的自覺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鬥爭等量齊觀，那末我們就會是尾巴主義者了。如果我們給每一個罷工者以“宣布自己是黨員”的權利，那末我們就是以機會主義態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實的事情合法化，因為這樣的“宣布”在大多數場合都是不真實的。如果我們想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431頁。——編者注

② 按實質來說。——編者注

自欺欺人，以为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熟练的极广大工人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倍受压迫、愚昧无知的时候，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那末我们就是安子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把每一个罢工者宣布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是或者真正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之流才能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在口头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量齐观。

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篇演说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大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前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可置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硬说列宁想以“密谋者的总和来限制全体党员的总和”。当时做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薩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馬尔丁諾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各色

各样、或大或小的各种不同的組織——从极狭小而秘密的組織起，一直到极广大而自由的 lose Organisationen^① 止。”（第 240 頁）这本来是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了。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們往后拉，这就有必要“重提旧事”了。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給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話：

……“阿列克謝也夫、梅什金、哈尔士林和热里雅鮑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們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們的热烈的宣傳始終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反应，因为他們的不屈不撓的毅力始終能够得到革命階級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②。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階級的支持。不是象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應該去圍繞密謀組織，而是革命階級即无产階級應該圍繞既包括密謀組織又包括非密謀組織的党。

……“为进行經濟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組織应当是职业的組織。每个社会民主党工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組織并在这种組織內积极工作…… 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會員，那就完全不符合我們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縮小我們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到必須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有这种初步了解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組織，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組織愈广泛，我們对于它們的影响也会愈广泛，而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經濟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并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主义者对他們的同志給以直接的

① 广泛的、自由的組織。——譯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417頁。——編者注

和自覺的推動。”(第 86 頁)^①順便說一下,為了估計關於黨章第 1 條的爭論,工會的例子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至於說工會應當在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監督和領導下”進行工作,這對於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根據這一點就給工會全體會員以“宣布自己”為社會民主黨黨員的權利,那就是十分荒謬的了,而且勢必有兩個害處:一方面是縮小了工會運動的範圍並且削弱工人在工會運動基礎上的團結,另一方面是使渙散和動搖分子自由地湧進社會民主黨內。在漢堡做包工的石匠掀起有名的事件⁹時,德國社會民主黨曾具體解決過這種問題。當時社會民主黨毫不遲疑地認為工賊行為是社會民主黨人所不齒的無恥行為,即認為領導罷工和支援罷工是自己的切身事業,但是同時它又十分堅決地否決了把黨的利益和行業工會的利益混為一談的要求,把對個別工會的個別步驟的責任加在黨的身上的要求。黨應當並且一定力求用自己的思想影響行業工會,使工會服從自己的影響,但是,正是為了這種影響,黨應當把這些工會中完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加入社會民主黨的)人和那些不完全自覺和政治上不完全積極的人區別開來,而不是象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樣,把他們混為一談。

……“革命家組織把最秘密的職能集中起來,這決不會削弱,而只會擴大其他許許多多組織的活動範圍和內容,這些組織既然要把廣大群眾包括在內,就應當是一些形式盡量不固定、秘密性盡量少的組織,如工會、工人自學小組、秘密書報閱讀小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階層中的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小組等等。這樣的小組、工會和團體,必須在各地很普遍地組織起來,使它們擔負各種不同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424頁。——編者注

的任务；但是如果把这些組織同革命家的組織混为一談，抹杀这两者之間的界限，那就是非常荒唐和有害的了……”（第 96 頁）^①从这种考証中可以看出，馬尔托夫同志提醒我說革命家組織应当由广大工人組織圍繞起来这一說法是很不恰当的。我在“怎么办？”一书中已經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給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發揮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組“对我们特別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組織性，因为大工厂中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階級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上、发展上和斗争能力上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們的堡垒…… 工厂分委员会应当通过各种小組（或者代办員）力求掌握整个工厂，掌握尽量多的工人…… 所有的小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屬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可以直接申請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經委员会批准就可以加入，在委员会的委托或者同意下担負一定的工作，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黨員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的直接的候补委員，等等。另一些不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应该是由黨員建立的各种小組的成員，或者是屬於某一个党小組的小組成員，等等。”（第 17—18 頁）^②从我加重号的地方可以特別明显地看出，我的第 1 条条文的思想在“給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經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組織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往下的一頁，我又大致指出是什么样的团体和組織，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員小組成員必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黨員，应该熟悉一定数量的黨員和党的負責人員。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提出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組成員不一定是俄国社会民

① 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5 卷第 436 頁。——編者注

② 見“列宁全集”195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 卷第 213、215、216 頁。——編者注

主工党的党员。应当有一两个党员参加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有时完全不应该让人知道他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①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不带遮眼罩”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说过，一部分组织应该加入党，另一部分组织不应该加入党。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些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各组织的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它们的秘密程度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也认为其他阶级中某些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会参加这些工人组织的）。这两种组织就构成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在我看来，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地，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界限不清有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使“称号”广泛散布而已。它的害处却能够造成一种把党和阶级混为一谈的涣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大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后来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勃鲁克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勃

^①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16页。——编者注

魯克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全部精神”（第 239 頁），但是他拥护我所提出的条文，认为这是工人事业派分子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勃魯克尔同志当时还不知道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采用害处比較少的做法；勃魯克尔同志沒有觉察到，在我們代表大会这样的会议上为民主制辯护，是白费力气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問題，认为“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爭論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們的共同目的”（第 252 頁）。他繼續說，“我和勃魯克尔，想挑选一个不大能达到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釋說，他认为“他們的目的”（即普列汉諾夫、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即建立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組織）“是实现不了而且是有害的”；所以他象馬尔丁諾夫同志^①一样，拥护經濟派所謂不必有“革命家組織”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終究会闖进我們黨組織中来，不管你們是用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擋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們沒有在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話。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 245 頁）一般讲来是很有趣的，所以值得詳細分析一番。

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說：黨組織对于不加入組織的

① 不过，馬尔丁諾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証明，“密謀”似乎不等于“秘密”，这两个名詞有概念上的差別。究竟是什么差別，無論馬尔丁諾夫同志或者現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沒有給我們說明。馬尔丁諾夫同志“裝模作樣地”說，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一书中，沒有坚决（如在“任务”一书中那样〔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279—302頁。——編者注〕）反对“把政治斗争縮小成密謀”。馬尔丁諾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記一事实，就是我当时所攻击的那些人 不认为需要革命家組織，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現在不认为需要这种組織一样。

黨員的監督是“可以實現的，因為委員會既然委託某人担負某種職務，就有可能考察它。”（第 245 頁）這個論點非常值得注意，因為它可以說是“道破了”馬爾托夫的條文究竟是誰需要的，事實上是為誰效勞的，是為知識分子個人效勞呢，還是為工人團體和工人群眾效勞。原來，馬爾托夫的條文可能有兩種解釋：（1）凡是在黨的某一個組織的領導之下經常親自援助黨的人，都有權“宣布自己”（這是馬爾托夫同志本人的話）是黨員；（2）每一個黨組織都有權承認凡是在它領導之下經常親自援助黨的人是黨員。只有第一種解釋才真正有可能使“每個罷工者”自稱為黨員，所以也只有這種解釋才立刻博得了李伯爾之流、阿基莫夫之流以及馬爾丁諾夫之流的衷心同情。但是，這種解釋顯然是一句空話，因為這樣就會把整個工人階級都包括進去，而抹殺黨和階級之間的區別；所謂監督和領導“每個罷工者”只能是“象徵性地”談一談。正因為如此，馬爾托夫同志的第二次發言立刻就滾到第二種解釋（不過，順便說一下，這種解釋被代表大會直接否決了，因為代表大會否決了科斯塔奇的決議案，第 255 頁），即認為委員會將委託人們担負各種職務并考察其執行情況。這種專門職務當然從來不會委託給工人群眾，不會委託給成千的無產者（即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和馬爾丁諾夫同志所說的那些無產者），而恰恰是常常委託給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提到的大學教授，委託給李伯爾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關心的中學學生（第 241 頁），委託給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第二次發言中所指出的革命青年（第 242 頁）。總之，馬爾托夫同志的條文要麼是一種死板的字句和空洞的詞藻，要麼就多半是而且幾乎完全是只有利於那些“滲透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而不願意加入組織的“知識分子”。馬爾托夫的條文在口頭上是擁護無產階級廣大階級的利益的，但是事實上却是為那些害怕無產階級紀律性和組織性

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利益效勞。誰也不敢否認：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殊階層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点，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性和組織性（參看考茨基論知識分子的著名論文）；這也就是這個社會階層不如無產階級的地方；這就是知識分子由於意志萎靡、動搖不定而使無產階級常常身受其害的一個原因；知識分子的這種特性是同他們通常的生活條件，同他們在很多方面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生存條件的謀生條件（單獨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體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聯系的。最後，擁護馬爾托夫同志條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須拿大學教授和中學學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爭論黨章第 1 條問題時，並不象馬爾丁諾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位同志所想的那樣，是堅決主張廣泛進行無產階級鬥爭的人反對堅決主張搞激進密謀組織的人，而是擁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個人主義的人與擁護無產階級組織性和紀律性的人發生衝突。

波波夫同志說：“在彼得堡各地，也如在尼古拉也夫或敖德薩一樣，據當地的代表說，有几十个散發書刊和進行口頭鼓動的工人都不能成為組織中的成員。可以把它們編到組織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組織中的成員。”（第 241 頁）為什麼他們不能成為組織中的成員呢？這始終是波波夫同志沒有說明的一个謎。上面我引証了“給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話，正是說明把所有這些工人編到（是數以百計，而不是數以十計）組織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許許多多這樣的組織能夠而且應當加入黨。

馬爾托夫同志的第二個理由是說：“列寧認為黨內除了黨組織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麼組織”……完全對啊！……“反之，我却認為這樣的組織應當存在。實際生活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這些組織，以致我們來不及把它們一一納入我們職業革命家的戰鬥

組織體系中”…… 这个說法在兩方面都是不正確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組織，要比我們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們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組織而且包括許許多多工人組織在內的體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則方面完全可靠的組織为党的組織。可是，勃魯克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sic!）一定会如願以償，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許多組織留在党外，就会不管它們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勃魯克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見”…… 請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呢！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毫无主見而专以別人的議論为轉移的人（參看組委會事件）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如願以償”的，就是說，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优势（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馬尔托夫同志援引“繁殖”不可靠的分子的“实际生活”，正是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組織計劃的机会主义性质！…… 他繼續說，“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組織（不完全可靠的組織）同意接受党綱，接受党的监督，我們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不一定使它变成党的組織。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綱，并加入党，那我就认为这是我們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說，我們就把这个协会列入党組織中了”…… 請看，馬尔托夫的条文竟糊塗到什么程度：接收入党的非党組織！請看一看他的方案吧，党=（1）革命家組織，+（2）承认是党組織的工人組織，+（3）沒有承认是党組織的工人組織（多半是“独立派”組織），+（4）执行各种职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学生等等，+（5）“每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計劃相

嬌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話：“我們的任务不只是一要組成一个組織(11)，我們能够并且應該組成一个党。”(第 241 頁)是的，当然我們能够并且應該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組成一些組織”的廢話，而是向党員直接提出要求，要他們切实地組織起来。既說“組成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字眼掩盖的一切无組織性和一切涣散状态，結果不过是一句空話。

馬尔托夫同志說，“我們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組織和群众之間有許多組織的意图”。恰恰相反。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进大家組織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組織起来，不是把有組織的东西和无組織的东西区分开来，而只是給大家一个称号^①。說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阿

- ① 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論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辯护。他說，“我們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員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員并不組成一个組織。”(第 59 頁)这个論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員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組織”才能够解决。但是問題不在这里。問題在于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 1 条的意恩，表明那种純粹咬文嚼字的批評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員組織”，起草一个把这个組織編到党内来的決議，那末馬尔托夫同志大伤胸筋的“困难”就会立刻烟消云散了。而我提出的党章第 1 条条文的意恩是要推动大家“組織起来”，是要保証实在的监督和領導。从事实上看，中央代办員应不应该加入党根本是个可笑的問題，因为对于他們的实在的監督，由于他們被任命为代办員，由于他們被留在代办員的职位上，已經是完全的和絕對的保証了。所以，这里根本談不上把有組織的东西和无組織的东西混为一談（而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中錯誤的根源就在于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談了）。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容許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談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学生”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員。这就是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先天弱點，而馬尔托夫同志却枉費心机地企图用一些根本談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員、自行宣布为党員的例子掩飾这个弱點。

克雪里罗得同志說过的一段話：“無論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們（革命青年小組等等）以及个別人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十足的真理！），“甚至自命为党的一部分”……这就根本錯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沒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眼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組織关系。当个别小組和个別人危害党的事业，敗坏和瓦解党組織时，禁止这些小組和个人“自命为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應該的。如果党竟不能“下一道命令禁止”小組“自命为”整体的“一部分”，那末說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規定开除党籍的手續和条文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經把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錯誤弄得更荒謬了；他甚至把这个錯誤發揮成机会主义理論，因为他补充說：“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根本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11）及其任务背道而馳的。”（第243頁）这恰恰等于說：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根本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背道而馳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拚命拥护这个理論。

必須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現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傾向的錯誤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在代表大会上反而表示願意“討价还价”，他說：“但是我发现，我原来敲的是敲开的大門”……（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既然承认外圍小組是党組織的一部分，也就是迎合了我的要求”……（不仅承认外圍小組，而且还承认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參看記錄第242頁所載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給一位同志的信”里引証的一些話）……“剩下的还有个別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討价还价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說，一般說来，我并不反对討价还价，但是我現在应当解釋一

下，這句話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等等，我是决不会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組織問題，那末我会同意（虽然上而我已經証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沒有根据的）給我的第 1 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承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綱和党章的工人組織，应当尽量吸收到党組織中来。”当然，严格說来，党章应当以法律上的定义为限，这种願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規定，而只适于在解釋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說明（我已經指出，还在制定党章很久以前，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这样解釋过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絲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組織的錯誤思想，絲毫不会有什么机会主义的論断^①和“无政府主义的观念”，但是在馬尔托夫同志的条

- ① 在企图論証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現出来的論断中，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話（第 248 頁和第 346 頁），他說：“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說：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无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的相当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問題不在于党章条文能否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鍛炼出比較銳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的根源愈深，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銳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根源”作理由来为开門接納机会主义的条文辯护，未免是十足的尾巴主义了。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組織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已經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記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晨水平”等等，为我們用来表示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表示不信任）的組織形式尙嫌薄弱、松懈的情形辯护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論据是說：“已有某种組織的青年知識分子，是能够更容易地自行列入（着重号是我加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識分子懷稜两可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許无組織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許人們“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說，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組織，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末他們就沒有什麼危險，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們驅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須把某人驅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并且在这种情

文中这一切显然都是俱全的。

我在引号内最后引用的那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说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負責任的和自行列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張看作无政府主义思想。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譯成普通話”，——这个条文就是說：“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不只是抽象地承认組織关系。”这种“翻譯”虽然很简单，但是它（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不仅对于那些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并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事情……同时，巴甫洛维奇同志很公正地指出，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馬尔托夫同志引証得很不恰当的那个不容爭辯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們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現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所以力求使“每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的这一倾向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現，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現，那末……那末，总罢工就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話，那末我們的党就会立刻一

况下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有組織的党不是用抵制手段而是用表决方法实行驅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驅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組織在一定条件下編到党内来，以便考驗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倾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許“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末这样的容納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負責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討論）其錯誤观点和錯誤策略，这样的容納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說法律上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末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說，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說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蓬勃发展的。法律上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环定义的話）“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馬尔托夫同志所主張的“情况”。

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一贯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首先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了党也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原来不是多余的事，这在同一个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①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公然要求（第254—255页）只要（为了取得“党员资格”）抽象地承认党纲，只要承认党纲的“基本原理”就够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说，“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7票（5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正因为这7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结合的多数派”

① 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8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7个人赞成马尔托夫的主张，有1个人赞成我的主张。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颠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情，不知为什么只招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即勃鲁克尔同志曾对我表示同意——时，才回想起这些人）。

(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馬尔托夫分子)結果变成了緊密結合的少数派！正因为这7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主張批准旧編輯部的提議才遭到了失敗，才使得“火星报”編輯工作上的“继承性”似乎受到惊人的破坏！而这奇怪的7个人却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护符，这7个人就是崩得分子以及阿基莫夫和勃魯克尔，即那些曾投票反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的代表，而他們的机会主义立場曾經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馬尔托夫和普列汉諾夫两人在討論緩和党章第1条关于党綱的条文問題时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所捍卫的“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演出的一幕悲喜劇的伏綫。



表決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別，也跟使用語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报多数派方而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人脱离出去，結果就使“中派”所支持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被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象我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規模的會議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或者来到这方或者轉到那方，尤其是在討論党章第1条这样的問題时，因为在这个問題上发生意見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許多人簡直还来不及把問題弄清楚(因为这个问题預先沒有在报刊上研究过)。从火星报多数派方面跑出去5票(各有两票表決权的魯索夫和卡爾斯基以及有一票表決权的連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勃魯克尔)和3个中派分子(梅德維捷夫、叶哥罗夫和察辽夫) 归附到火星报多数派方面；結果多数派共有28票(24 - 5 + 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終形成的派別少一票。反火

星派分子使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7个人贊成馬尔托夫的主張，有一个人贊成我的主張（“中派”方面也有7个人贊成馬尔托夫的主張，3个人贊成我的主張）。火星报少数派和反火星派分子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結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組成的紧密結合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辯护时所犯的无疑是走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步骤的政治錯誤，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別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現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則的分子馬上发动了他們的全部力量来扩大革命的社会民主派观点中出現的裂縫或漏洞。在組織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見阿基莫夫的演說）的人們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則上反对我們的組織计划和反对我們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錯誤。在这个問題上仍然忠实于革命的社会民主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誰如果沒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誰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爭論党章的枝节問題面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爭論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問題面发生的斗争。

(十) 无辜被加上莫須有的 机会主义罪名的人

在談党章問題繼續討論的情况以前，必須讲一下“火星报”組織在代表大会期間举行的几次非正式會議，以便說明我們在中央机关人选問題上发生的分歧。这四次會議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正是在表決了党章第1条以后举行的，所以，“火星报”組

織在这次會議上發生的分裂，無論在時間上或者在邏輯上都是以後鬥爭的先聲。

“火星報”組織的非正式會議^①是在組委會事件以後不久召開的，因為這一事件成了討論中央委員會的可能候選人問題的導火綫。由於限權代表委託書被取消，所以這幾次會議當然只是協商性質、對任何人都沒有約束作用，但是這幾次會議的意義畢竟是很大的。中央委員會人選問題在許多代表看來是個很大的難題，因為他們既不知道秘密名字，也不知道“火星報”組織的內部工作情況，雖然這個組織造成了黨在事實上的統一，並且實現了對實際運動的領導（這個領導作用成為正式承認“火星報”的理由之一）。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當火星派分子團結一致的時候，他們完全有保證在代表大會上取得五分之三的大多數，全體代表都很了解這一點。所有的火星派分子正是期望“火星報”組織提出一個關於中央委員會一定人選的名單，並且“火星報”組織中沒有一個人有一句話表示反對預先在這個組織中討論中央委員會人選問題，沒有一個人提到要批准組委會全體委員，即把它變成中央委員會，甚至沒有提到要同組委會全體委員協商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問題。這個情況也是非常重要而且值得十分注意的，因為現在馬爾托夫分子事後熱心擁護組委會，其實不過是三番五次地證明自己在政治上沒有氣節而已^②。當中央機關人選問題引起的分裂還沒有使馬爾托夫和

① 為了避免那些無法解決的爭論，我已經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對於非正式會議上的各種事實力求盡量縮小說明範圍。基本的事實已經在我的“給‘火星報’編輯部的信”（第4頁）中敘述過了。馬爾托夫同志在他的“答復”中並沒有對這些基本事實表示異議。

② 請仔細想像一下這幅“風俗圖”吧：“火星報”組織的一個代表在代表大會上只同“火星報”組織協商過，並且甚至連提也沒有提到要同組委會協商。而當他

阿基莫夫團結起來的時候，代表大會上所有的人明白每一個公正的人可以從代表大會的記錄和“火星報”全部歷史中看出的事實，即組委會主要是一個負責召集代表大會的委員會，是有意讓各種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為止）組成的委員會；而實際建立黨在組織上的統一工作，則完全由“火星報”組織來擔負（同時必須指出，有幾個火星派的組委會委員沒有列席代表大會，完全是偶然的，有的是由於被捕，有的是由於其他種種“客觀”情況）。列席代表大會的“火星報”組織成員已由巴甫洛維奇同志在他的小冊子中列舉過了（見他的“關於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信”，第13頁）¹⁰。

“火星報”組織內部激烈辯論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在“給編輯部的信”中引証過的兩次表決。第一次表決是“以9票對4票並在3票棄權的情況下否決了馬爾托夫所支持的一個候選人”。看來，“火星報”組織所有出席代表大會的16個成員一致同意討論關於可能的候選人問題，以及由大多數否決了馬爾托夫同志所提出的候選人之一（這個候選人就是現在馬爾托夫同志自己也忍不住將其洩漏出來的什特伊恩同志，“戒嚴狀況”第69頁）——這不是最簡單和最自然的事情嗎？要知道，我們聚集起來舉行黨代表大會，正是為了討論和解決究竟把“指揮棒”交給誰掌握的問題，而我們全體黨員的義務就是要認真對待議事日程上的這一項，解決這個問題要從事業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庸人的溫情”出發——正如魯索夫同志後來十分公正指出的那樣。當然，在代表大會上討論候選人問題時，特別是在非正式的和小型的會議上，不能不涉及到

自己在这个組織內以及在代表大會上遭到了失敗，他卻對組委會沒有被批准一事表示惋惜，事後贊揚組委會，並傲慢地漠視給他代表委託書的那個組織！我敢說，這樣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真正的社會民主黨和真正的工人政黨的歷史中都是找不出來的。

某些个人品质，不能不表示自己是贊成还是不贊成^①。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就已經警告过，把不贊成候选人的态度看作一种“侮辱”（同盟記錄第 49 頁）是很荒謬的；由于人家直接履行黨員的义务——即自覺地慎重地選擇負責人員——而“发脾气”和乱吵乱鬧，是很荒謬的。我們的少数派也就因为这件事情大发雷霆，他們在代表大会以后开始叫嚷什么“破坏名誉”（同盟記錄第 70 頁），并在报刊上向广大讀者說什特伊恩同志是旧組委会的“主要人物”，說他无辜被人指責有“什么万恶的計劃”（“戒严状况”第 69 頁）。你看，在是否贊成候选人的問題上叫嚷什么“破坏名誉”——这难道不是歇斯底里嗎？有人当自己在“火星报”組織的非正式會議上以及在正式的最高的黨員會議即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敗，就向街头公众去訴苦，并把落选的候选人当作“主要人物”推荐给可尊敬的公众，这难道不是无謂爭吵嗎？有人后来竟用鬧分裂和要求补选的办法来要挾党接受他們的候选人，这难道不是无謂爭吵嗎？我們侨居国外，在这个沉悶的气氛中，政治概念已經十分混淆了，以致馬尔托夫同志分辨不清什么是黨員义务，什么是小組习气和私人关系了！有人竟以为主張候选人問題只适合在

① 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感伤地訴苦，說我表示不贊成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但是他沒有觉察到，从他的訴苦里得出了对他自己不利的結論。列宁当时的举动——又用他自己所使用的字眼来表达——狂暴（同盟記錄第 63 頁）。真的，他使劲把門关了一下。不錯，他的行为（在“火星报”組織的第二次或第三次會議上）激怒了当时在場的人。这是实情。但是由此应当得出什么結論呢？結論只是我的論据在各个爭論問題的实质上是具有說服力的，而且这已經为代表大会的进程証实了。真的，如果“火星报”組織的 16 个組員中竟有 9 个組員贊成我的立場，那末，显而易见，虽然态度激烈，害怕态度激烈，人們还是贊成我的。可見，如果不是“态度激烈”，当时站到我这方面的人也許比 9 个还要多呢。可見，当时論据和事实感是胜过“火气”，这些論据和事实也就显得更有說服力。

代表大会上討論和解决是一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虽然誰都知道代表們在此聚会首先要討論重要的原則問題，誰也知道在此聚会的是搞运动的代表，他們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人选問題，能够（而且应当）为了投票表决而要求和收集有关候选人的一切材料；誰也知道在这里为指揮棒問題而发生的一定的爭論本来是自然的和必要的。可是現在我們这里，代替这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观点而形成了另外一种風气，我們将在代表大会閉幕以后信口开河說，某某人在政治上被埋葬了，某某人的声誉被破坏了等等；候选人由一些文人在小册子里大加渲染，而且这些文人还装出一副伪善面孔，指手画脚地硬說这不是小組而是党……那些喜欢吵架的讀者就会如获至宝地欢迎这种聳人听闻的消息，說什么据馬尔托夫揚言，某某人曾是組委会的主要人物^①。那些讀者要比机械地根据多数通过決議的代表大会这类形式主义的机关有更大的本事去討論問題和解决問題……是的，在国外还有許多充滿了无謂爭吵的骯髒的馬厩需要我們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員去打扫！

“火星报”組織举行的另一次表决，是“以 10 票对 2 票并在 4 票棄权的情况下通过 5 人名单（即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由我提議列入这个名单的有一个非火星派首領和一个火星报少数派首領”^②。这次表决非常重要，因为它明显而不容爭辯地証明，后来在

① 我也在“火星报”組織里提出过一个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而且也像馬尔托夫一样没有能使这个候选人当选，对于这个候选人，我本来也能說一下他在代表大会以前和在代表大会初期有过什么杰出事迹証明他的良好的声誉。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这位同志很有自尊心，决不会讓任何人在代表大会以后在报刊上提出他的候选资格或者訴說什么政治上被埋葬，声誉被破坏等等。

②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105頁。——編者注

无謂爭吵的气氛中产生的那些謠言，說什么我們想从党内驅逐或者丢开非火星派，說什么多数派只以代表大会半数来选举这个半数里的代表等等謠言，是毫无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謊言。我所引証的这次表决情况表明，我們不但沒有想把非火星派从党内丢开，甚至沒有想把他們从中央委员会内丢开，而是让我们的对方占很大的少数。全部問題就在于他們想占多数，当这种奢望实现不了时，他們就大吵大鬧，根本拒絕参加中央机关。事实真相就是如此，同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上所說的截然相反，从下面一封信里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封信是我們“火星报”組織中的多数派（在7个人退出代表大会以后，就成了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在代表大会通过党章第1条以后不久从“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那里收到的（必須指出，我所說的那次“火星报”組織的會議是最后一次會議，在这次會議以后，“火星报”組織事实上已經瓦解了，于是双方都力图說服代表大会的其余代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我們听了索罗金和薩勃利娜¹¹两位代表关于編輯部和‘劳动解放社’的多数願意参加會議（某一天）^①問題的解釋，同时我們又在这两位代表的帮助下查明，在上一次會議上宣讀过一个似乎是由我們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被人用来对我们的整个政治立場作了不正确的估計；同时我們注意到，第一、人們絲毫沒有试图查一查来源就认定这个名单是我們

① 据我計算，这封信指的日期是星期二。會議是在星期二晚上，即在代表大会第28次會議以后举行的。这种時間上的考証很重要。它証据确凿地駁斥了馬尔托夫同志的說法，即所謂我們的分离是由于中央机关的組成問題而不是由于中央机关的人选問題引起的。它証据确凿地証明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和“給編輯部的信”里的說明是正确的。在代表大会第28次會議以后，馬尔托夫和斯塔罗維爾两同志大談什么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却只字不提在总委员会人选或中央机关补选問題上的分歧（关于這個問題，我們在第25、26和27次會議上曾經爭論过）。

提出的；第二、这种情况和公开加在‘火星报’編輯部以及‘劳动解放社’多数身上的机会主义罪名无疑是有联系的；第三、我們十分了解这个罪名是同改变‘火星报’編輯部成員的完全确定的計划有联系的，——因此，我們认为，对我們作的关于不让参加會議的原因的解釋是不能使我們滿意的，同时我們认为，不願意讓我們参加會議就是証明不願意讓我們有可能消除上述莫須有的罪名。

至于我們彼此能不能协商提出一个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問題，我們声明，我們可以当作协商基础接受的唯一名单就是波波夫、托洛茨基、格列博夫三个人，同时我們着重指出这个名单是一个妥协性的名单，因为我們把格列博夫同志列入这个名单只是为了向多数方面的願望表示让步，因为我們在代表大会上认清格列博夫同志的作用以后，我們并不认为格列博夫同志能满足中央委员会候选人所应当滿足的要求了。

同时，我們要着重指出的一点就是，我們进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問題的談判时，并没有把这件事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成員的問題联系起来，因为我們决不同意对这个問題(編輯部成員問題)进行任何談判。

代表各同志署名的，

馬尔托夫和斯塔罗維爾”

从这一封确切反映出爭論双方的情緒和爭論情况的信中，可以明白看出当时发生分裂的“中心”及其真实原因。“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虽然不願同意多数派的意見，而宁願在代表大会上自由地进行鼓动(他們当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但是他們終究想要使多数派的“代表”允許他們参加自己的非正式會議！当然，这种可笑的要求在我們的會議上(这封信当然是在會議上宣讀过的)只是使人好笑和感到詫異，至于他們因“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鬧，簡直只好令人付之一笑。但是，我們首先还是逐条剖析一下馬尔托夫和斯塔罗維爾那些伤感的怨言吧。

他們說，有人不正确地认为名单是他們提出的；有人不正确地估計了他們的政治立場。但是，馬尔托夫自己也承认(同盟記錄第

64 頁)，我並不懷疑他說這個名單不是他提出的一語的真實性。一般說來，名單究竟是誰提出的，這個問題在這裡並沒有多大關係，因為名單究竟是由火星派分子中某個人或者是由“中派”代表中某個人擬訂的等等，那是無關緊要的。重要的是，完全由現在少數派分子構成的這個名單曾在代表大會上傳閱過，儘管只是作為一種推測或假設而傳閱的。最後，更重要的是，馬爾托夫同志當時在代表大會上只好拚命表示拒絕他現在不免要表示歡迎的這個名單。請看，在兩個月以內他就由高喊“可恥的謠言”一變而為要挾黨把這個似乎可恥的名單^①中開列的候選人接納到中央機關去了，——這種變化最明顯不過地證明他對於人物和對於色彩的估計是多麼不堅定啊！

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說，這個名單，“在政治上意味着我們以及‘南方工人社’同崩得實行直接協定的聯盟”（第 64 頁）。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第一、崩得始終不會同意實行沒有一個崩得分子在內的名單的“協定”；第二、當時不僅同崩得，而且同“南方工人社”，也沒有而且不可能談到什麼直接的（在馬爾托夫看來是可恥的）協定。當時實行的恰恰不是協定，而是聯盟，當時的問題不是說馬爾托夫同志締結過什麼協定，而是說那些在代表大會前半期曾遭到馬爾托夫同志反對，後來却拚命抓住馬爾托夫同志在黨章第 1 條問題上的錯誤加以利用的反火星派分子和勁接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支持馬爾托夫同志。我上面引用的信就確凿地證明，他們“生氣”的根本原因正在於人家公開地給他們加上的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這些曾經使人大發雷霆而現在馬爾托

① 當我們所聞關於古謝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發生衝突的消息時，本書已經付排了。關於這次事件，我們將在本書附錄中專門加以分析（見本書第 212—221 頁。——編者注）。

夫同志不管我在“給編輯部的信”中如何提醒仍然竭力迴避的“罪名”，可歸結為以下兩點：第一、在討論黨章第1條時，普列漢諾夫直截了當地說，黨章第1條的問題是把“各種機會主義分子”和我們“分開”的問題，我提出的草案是防止這些人鑽進黨內的壁壘，“單是這一個理由就應該使所有反對機會主義的人投票擁護”這個草案（代表大會記錄第246頁）。這些強有力的話儘管由我把語氣緩和了一些（第250頁）^①，在魯索夫（第247頁）、托洛茨基（第248頁）和阿基莫夫（第253頁）等同志發言中還是明顯地表現出強烈的反應。在我們“議會”的“走廊”里，大家都在黨章第1條問題的無數爭論過程中熱烈地評論普列漢諾夫的這一論點，並解釋得莫衷一是。但是我們那些親愛的同志不但不從實質上來辯護，反而充滿了可笑的怨氣，直到用書面訴說什麼“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

那種充滿小組習氣和非常缺乏党性而經不起當眾公開爭論的新鮮空氣的心理，在這裡表現得很明顯。這正是俄羅斯人所熟悉的心理，這種心理用一句古諺來說就是：“不是咬牙切齒，就是握手言歡！”人們已經習慣於在一小群親密伙伴的小圈子裡生活，一看見有人在自由的公開的舞台上由自己負責地發表言論，就手足失措了。這又怪誰呢？怪“勞動解放社”，還是怪該社的多數派，說他們是機會主義者，——怎麼能設想這樣的怪事？或者是為了這個洗不掉的侮辱而製造黨內分裂，或者是用恢復小圈子的“繼承性”來消弭這種“家丑”——這就是上面那封信裡已經相當明確地提出的兩個辦法。知識分子個人主義和小組習氣的心理同必須在黨面前公开发表意見的要求發生了衝突。你能設想在德國黨內會有像訴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55—456頁。——編者注

說所謂“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样一种荒謬現象，这样一种无謂爭吵嗎！在那里，无产阶级的組織和紀律早已使人拋棄了这种知識分子的軟弱性。例如，李卜克内西是任何人都对他十分表示尊敬的，但是，如果李卜克内西在 1895 年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問題落到露骨的机会主义者福尔馬尔一流的恶劣伙伴中間的时候，因被“公开指出犯了机会主义的錯誤”（和倍倍尔一起）而掀起苦來，人們該会怎样地嗤笑他啊！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所以同德国工人运动史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不是因为李卜克内西在这样一个比較小的局部問題上犯了机会主义的錯誤，哪怕他犯了这样的錯誤，这种联系还是存在的。同样，不管斗争如何使人气愤，可是，例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名字現在而且将来永远会受到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尊敬，这并不是因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我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拥护过机会主义的所謂思想，也不是因为他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旧的无政府主义的謬論，哪怕他拥护过这种思想，哪怕他提出过这种謬論，他的名字还是受人尊敬的。只有那些迷恋最頑固的小組习气而且抱定“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握手言欢”的邏輯的人，才会因“‘劳动解放社’多数派被加上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而大叫大鬧，掀起无謂爭吵和制造党内分裂。

这种可怕的罪名的另一个根据同前一个根据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第 68 頁）力图迴避和抹杀这个事件的一方面）。这个根据就是反火星派分子和勁搖分子同馬尔托夫同志在討論党章第 1 条时已經表现出来的联盟。自然，当时馬尔托夫同志和反火星派分子之間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締結什么直接协定或間接协定，而且誰也沒有怀疑他締結过什么协定，这不过是他自己由于害怕而产生的想法罢了。但是，那些显然有机会

主义倾向的人在他周圍組成一个愈加緊密“結合的”多数(現在只是由于有7个代表“偶然地”退出代表大会才变成了少数),这一事实正暴露了他所犯的錯誤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联盟”,我們在討論党章第1条以后当然也立刻公开地在代表大会上(參看上面引用的巴甫洛維奇同志的評語,代表大会記錄第255頁)以及在“火星报”組織中指出过(我記得,普列汉諾夫曾特別指出过这一点)。这正象蔡特金在1896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两人提出的意見和嘲笑一样,《Es tut mir in der Seele weh, dass ich dich in der Gesellschaft seh'》(我看見你[即倍倍尔]落在这样一伙人中間[即与福尔馬尔及其伙伴在一起],是多么痛心呀)。說也奇怪,当时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两人並沒有歇斯底里地向考茨基和蔡特金写过什么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的信……

关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的問題,我們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中說他們当时还没有最后表示拒絕同我們協商等話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們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在政治斗争中企图依靠记忆来重述各种被話而不根据文件来考証事实,这是多么不妥当。其实,“少数派”当时是絲毫不客气的,公然向“多数派”提出最后通牒,让“少数派”提出两个候选人而“多数派”提出一个候选人(作为妥协办法,并且只是为了表示让步!)。这真是怪事,但这是事实。从这件事可以具体地看出,現在散布謠言,說什么“多数派”想由代表大会半数只选出这个半数里的代表等語,是多么荒唐。恰恰相反,馬尔托夫分子只是为了表示让步才主張讓我們在三个席位中占一个席位,因而也就是打算在我們不同意这个奇特的“让步”时完全选出他們自己的人!我們在自己的非正式會議上嘲笑过馬尔托夫分子的这种謙遜态度,并給自己拟訂了一个名单,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員

会)以及波波夫。我們随后(也是在24人的非正式會議上)用瓦西里也夫同志(他后来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代替波波夫同志,只是因为波波夫同志拒絕列入我們提出的名单,起初他在私人談話中表示拒絕,后来又在代表大会上公开表示拒絕(第338頁)。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

謙遜的“少数派”本来有一种想占多数席位的謙遜的願望。当这种謙遜的願望得不到滿足时,“少数派”就公然完全表示拒絕,而且无理取鬧。但是現在竟有人煞有介事地大談什么“多数派”“不肯让步”!

“少数派”出馬上陣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自由鼓勁的时候,曾向“多数派”提出可笑的最后通牒。当我們的英雄遭到失敗的时候,就嚎啕大哭,叫喊起戒严状况来了。Voilà tout^①。

給我們加上蓄意改变編輯部成員这一可怕的罪名,我們(即24人举行的非正式會議)也是一笑置之,因为大家从代表大会剛一开始,甚至早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很清楚地知道以选举原先預定的三人小組来改組編輯部的計劃(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到代表大会选举編輯部的情况时还要詳細說明)。至于“少数派”看到它同反火星派联盟就是明显地証明这个計劃的正确性以后,就被这个計劃吓得目瞪口呆了,我們絲毫不覺得奇怪,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們当然不能把那种要我們在代表大会上尙未进行斗争以前自願变成少数的提議看得很严重,我們当然不能把那封信看得很严重,因为那封信的作者气憤到不可思議的地步,以致說起什么“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来了。我們深信黨員的職責是很快就会战胜那种想要“泄憤出气”的自然願望的。

^① 这就是全部情况。——編者注

(十一)繼續討論黨章。總委員會的成員

黨章以後各條所引起的爭論多半是關於細節問題的，很少涉及到組織原則。代表大會第24次會議完全是討論選派代表出席黨代表大會的問題，當時堅決肯定地進行鬥爭來反對全體火星派共同計劃的又只有崩得分子（哥里德勃拉特和李伯爾，第258—259頁）以及阿基莫夫同志，後者以值得稱贊的坦率精神承認他在代表大會上起的作用，他說：“我每次說話都完全意識到，我所提出的論據不會影響同志，反而會危害我所擁護的那個條文。”（第261頁）這一段中肯的意見緊接在討論黨章第1條以後來講是特別恰當的；只是“反而”一詞在這裡用得不完全正確，因為阿基莫夫同志不僅善於危害一定的條文，而且還善於“影響同志”……即影響某些傾向於機會主義詞句的很不徹底的火星派分子。

總之，黨章第3條——規定選派代表出席代表大會的條件——是在7票棄權的情況下由大多數通過的（第268頁），棄權的顯然都是一些反火星派分子。

關於總委員會成員問題的爭論占了代表大會第26次會議的大部分時間，這次爭論暴露了在許多不同的草案周圍形成的非常零散的派別劃分。阿勃拉姆桑和察遼夫根本反對成立總委員會的計劃。帕寧硬想使總委員會變成一個純粹的仲裁法庭，因此他完全一貫地提議把那些認為總委員會是最高機關以及總委員會可以由其中任何兩個委員召集會議等詞句刪掉^①。格爾茨¹²和魯索夫

^① 斯塔羅維爾同志顯然也傾向於帕寧同志的觀點，不同的只是後者知道他想達到的目的是什麼，所以他完全一貫地提出把總委員會變成一個純粹仲裁性的調解機關的決議案；斯塔羅維爾同志雖然說總委員會按草案規定“只應當根據

坚持各种組成总委员会的方法，他們认为党章起草委员会五个委員所提出的三种方法不很恰当。

爭論的問題首先归結为确定总委员会的任务：是仲裁法庭呢还是全党最高机关？我已經說过，一貫贊成前一种意見的有帕宁同志。但是他只是一个人。馬尔托夫同志坚决反对这个意見，他說：“我提議否決那种主張把‘总委员会是最高机关’一語刪掉的建議，因为我們的条文”（即我們在党章起草委员会內一致同意的关于总委员会任务的条文）“正是想使总委员会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党最高机关。我认为，总委员会不只是一个調解机关。”但是按照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來說，总委员会的成員完全而且仅仅适合“調解机关”或仲裁法庭的性质，两个中央机关各选派两个委員，第五个委員由这四个人来聘請。別說这样的总委员会成員，就是按照魯索夫同志和格尔茨同志提議的由代表大会通过的总委员会成員（第五个委員由代表大会任命），也只适合調解或仲裁的目的。总委员会的这种人选是根本和它应该成为全党最高机关的使命相矛盾的。全党最高机关在成員方面应该固定不变，而不应当受中央机关成員中偶然（有时是由于被捕）变动的影響。最高机关应当同党代表大会有直接的联系，从代表大会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而不是从其他两个服从于代表大会的党机关方面取得自己的全权。最高机关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組成。最后，最高机关組成的方式决不应该使它本身的存在受到偶然情况的影響；在两个委员会对于选举第五个委員的問題相持不下时，党就会处于沒有最高机关的境地！反駁这个意見的人說：（1）当五个委員中有一个委員棄权，而其余四个委員又相持不下时，結果也是沒有出路的

双方的願望”（第288頁）召集，但是他并不知道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他这种說法是完全不正确的。

(叶哥罗夫語)。这种反駁意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法通过決議有时是任何一个委员会都免不了的，但是这完全不是說委员会就无法組成。第二种反駁意見說：“如果象总委员会这样的机关都不能选出第五个委員，这就說明这个机关根本不中用”（查苏利奇語）。然而，这里的問題不在于中用不中用，而在于最高机关存在不存在，沒有第五个委員就不会有什么总委员会，就不会有任何“机关”，于是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中用不中用。最后，如果說无法組成的只是某一个服从于另一个委员会——上級委员会——的党委员会，那还是可以想办法糾正的弊病，因为这个上級委员会在非常情况下随时可以用某种方法来弥补这个缺陷。但是，在总委员会上面，除了代表大会以外，沒有任何委员会了，如果在党章內留下一种使总委员会甚至无法組成的可能性，那就显然不合乎邏輯了。

我在代表大会上对于這個問題发表的两次簡短的演說，只是为了剖析(第 267 頁和第 269 頁)馬尔托夫本人以及其他同志用来替馬尔托夫草案辯护的这两个不正确的反駁意見。至于总委员会中究竟是中央机关报占优势，还是中央委员会占优势的問題，我甚至沒有提到过。最先提到這個問題而說中央机关报有占优势危險的是阿基莫夫同志，他还在代表大会第 14 次會議上发言时就提到这一点(第 157 頁)，至于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以及其他同志在代表大会以后制造盡感人心的荒謬言論，說什么“多数派”想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編輯部的工具等，只不过是走阿基莫夫的老路而已。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一文中提起這個問題时，竟把真正首先提出這個問題的人輕輕地閃过去了！

誰要了解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占优势这一問題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全部提法，而不只是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詞句，他就会很容易地發現馬尔托夫同志歪曲了事实真相。还在第 14 次會議

上，不是別人，正是波波夫同志一開始發言就表示反對阿基莫夫同志的觀點，說他想“在黨的高峯上擁護‘最嚴格的集中制’，以便削弱中央機關報的影響”（第154頁，着重號是我加的），“這樣的（阿基莫夫式的）體系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此”。波波夫同志補充說：“對於這樣的集中制，我不僅不擁護，並且要大力反對，因為它是機會主義的旗幟”。這就是中央機關報對中央委員會占優勢這一所謂問題的根源，怪不得馬爾托夫同志現在只好對這個問題的真實起源避而不談。甚至波波夫同志也不能不發現阿基莫夫這些所謂中央機關報占優勢的論調中包含的機會主義性質^①，所以波波夫同志為了把自己和阿基莫夫同志好好地區分開來，便堅決聲明：“讓這個中央機關（總委員會）由編輯部提出三個人而由中央委員會提出兩個人來組成吧。這是個次要的問題（着重號是我加的），重要的是要黨的最高領導出自一個來源。”（第155頁）阿基莫夫同志反駁說：“按照草案，單是從編輯部的成員固定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經常變化這一點來看，也就保障了中央機關報在總委員會內的優勢”（第157頁）——這一論據所說的只是原則領導的“固定性”（這是正常的、合乎願望的現象），決不是有干涉或侵犯獨立性意義的“優勢”。於是波波夫同志（他當時還不屬於以所謂中

^① 無論波波夫同志或馬爾托夫同志都沒有害怕把阿基莫夫同志稱為機會主義者，只是當人們對他們這些人使用了這個稱呼，當人們由於“使用語言平等”問題或黨章第1條問題而公正地使用了這個稱呼時，他們才生了氣並且發起火來。然而阿基莫夫同志（步其後坐的是馬爾托夫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的行動要比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在聯盟代表大會上的行動更莊重而有勇氣些。阿基莫夫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說：“在這裡，人們把我稱為機會主義者；我个人認為這是一個賤人的侮辱性的字眼，並且我認為人家這樣稱呼我是完全不應該的；但是我並不抗議這一點。”（第296頁）也許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同志曾向阿基莫夫同志建議在他們為反對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而提出的抗議書上簽名，但是被阿基莫夫同志拒絕了吧。

中央委员会沒有独立性的謊言掩盖其不滿意中央机关成員的心理的“少数派”完全正当地回答阿基莫夫同志說：“我提議把它(总委员会)当作全党的領導中心，那时总委员会里面究竟是中央机关报的代表占多数还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占多数，就完全是次要問題了。”(第 157—158 頁。着重号是我加的)

在第 25 次會議重新討論总委员会成員問題时，巴甫洛維奇同志繼續原先的辯論，表示拥护中央机关报对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因为前者具有坚定性”(第 264 頁)，而他所指的正是原則的坚定性，正如在巴甫洛維奇同志以后跟着上台发言的馬尔托夫同志所理解的那样，馬尔托夫同志在发言中认为不必“規定一个机关对另一个机关的优势”，并指出可以使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員留在国外，“这样就能使中央委员会的原則坚定性在一定程度內保持下去。”(第 264 頁)这里絲毫沒有用蠱惑人心的口吻把关于原則坚定性以及保持这种坚定性的問題和关于保持中央委员会独立自主性的問題混淆起来。在代表大会以后几乎成为馬尔托夫同志的主要法宝的这种混淆手法，在代表大会上只有阿基莫夫同志一人頑強地施用过，阿基莫夫同志当时已經說到“党章的阿拉克切也夫精神”(第 268 頁)，說“如果党总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員是中央机关报提出的，那末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只是編輯部意志的執行者了”(着重号是我加的)。三个住在国外的人就会取得漫无限制地(II)处理全(II)党工作的权利。他們在安全方面是有保証的，因此他們的权力就会是終身的。”(第 268 頁)正是为了反駁这些十分荒謬的蠱惑人心的詞句，为了反駁这些把思想領導曲解为干涉全党工作的詞句(这种詞句在代表大会以后供給了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一个廉价的口号来大談所謂“神权政治”)，于是巴甫洛維奇同志又起来发言，着重声明他“拥护‘火星报’所代表的那些原則的坚定性和

純潔性。我主張使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占優勢，就是為了鞏固這些原則”。

所謂中央機關報對中央委員會占優勢這一問題的真相就是如此。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托夫兩位同志指出這一有名的“原則性的意見分歧”，無非是重復阿基莫夫同志所說的那些機會主義的和蠱惑人心的詞句而已，而這些詞句的本質，波波夫同志也是看得很清楚的，當然只是在他還沒有在中央機關成員問題上遭到失敗以前才看得很清楚！

• •

•

關於總委員會成員問題的總結就是：不管馬爾托夫同志在“戒嚴狀況”中怎樣企圖證明我在“給編輯部的信”中有矛盾和不正確的說法，代表大會的記錄清楚地表明，這個問題和黨章第1條比較起來確實只是細節問題，而“我們的代表大會”一文（“火星報”第58號）說當時我們爭論的“幾乎只是”關於黨中央機關的組成方法問題，這完全是歪曲事實的說法。這種歪曲所以更加令人氣憤，是因為該文作者完全迴避黨章第1條的爭論。其次，火星派分子在總委員會人選問題上並沒有什麼確定的派別，這一點也可以拿代表大會的記錄來証實：沒有舉行過記名投票，馬爾托夫和帕寧的意見不一致，我和波波夫的意見相同，叶哥羅夫和古謝夫兩人堅持自己的立場，等等。最後，我最近（在俄國革命社會民主黨人的國外同盟代表大會上）認為馬爾托夫分子和反火星派分子的聯盟已經鞏固起來，這一論斷也可以由現在大家都看得清楚的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位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轉到阿基莫夫同志方面去的事實來証實。

(十二) 党章問題討論的結束。中央机关补选問題。

“工人事业社”代表退出代表大会

談到党章問題繼續討論的經過（代表大会第 26 次會議）時值得指出的只有關於限制中央委員會的權力的問題，從這個問題可以看出馬爾托夫分子現在攻擊過分集中制的用意。叶哥羅夫同志和波波夫同志企圖限制集中制的立場的信心是比較堅強的；是不以他們自己的候選資格或他們所擁護的候選入為轉移的。他們早在党章起草委員會里就已經提議要限制中央委員會解散地方委員會的權力，限制的条件就是必須得到總委員會的同意以及特別列舉的一些情況（第 272 頁，注釋 1）。党章起草委員會中有三個委員（格列博夫、馬爾托夫和我）反對這種限制，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也曾擁護我們的意見（第 273 頁），並反駁叶哥羅夫和波波夫，他說：“即使沒有這些限制，中央委員會在決定像解散組織這樣的重大步驟時也會預先討論的。”可見，當時馬爾托夫同志對於一切反集中制的企圖還是充耳不聞的，結果代表大會否決了叶哥羅夫和波波夫的提議，——只是可惜我們不能從記錄上查明究竟是多少票否決的。

在黨代表大會上，馬爾托夫同志也曾“反對以‘批准’一詞來代替‘組織’一詞（党章第 6 條說：中央委員會負責組織各委員會等等）。必須也給以組織的權利”，——馬爾托夫同志當時這樣說，但是他還沒有想到只是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才發現的絕妙的明顯的思想，即認為“批准”不包括在“組織”概念以內。

除了這兩點以外，其餘一切關於党章第 5 條至第 11 條的討論完全是細節的辯論（記錄第 273—276 頁），都沒有多大趣味。第 13

条是一般关于一切党委员会补选，特别是中央机关补选的问题。党章起草委员会提議把补选所必要的法定多数从 $\frac{2}{3}$ 提到 $\frac{4}{5}$ 。报告人(格列博夫)提議，补选中央委员会需要一致通过。叶哥罗夫同志认为留下一些疙瘩是不恰当的，主張在没有什么人提出理由充分的 veto^① 意見时只要普通多数通过就可以了。波波夫同志既不同意党章起草委员会的意見，也不同意叶哥罗夫同志的意見，而要求要么是普通多数通过(沒有 veto 权)，要么是一致通过。馬尔托夫同志既不同意党章起草委员会的意見，也不同意格列博夫、叶哥罗夫以及波波夫的意見，表示反对一致通过，反对 $\frac{4}{5}$ (贊成 $\frac{2}{3}$)，反对“相互补选”，即反对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有权对中央委员会的补选表示抗議，反之亦然(即反对“相互监督补选制”)。

讀者可以看出，这里派別划分是很复杂的，意見分歧几乎表现在每一个代表的看法都“一致”有自己的特点！

馬尔托夫同志說：“我认为，要同你所憎厌的人一起工作，在心理上是很难堪的。但是重要的是使我們的組織有生命力和活动能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在补选方面的互相监督制是不需要的。我所以反对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它們要各行其是。决不是！例如，在是否应当把納杰日丁先生接收到中央委员会里的問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是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忠告的。我所以表示反对，是因为我不願意造成一种互相激怒的拖延。”

我反駁他說：“这里有两个問題。第一个是关于法定多数的問題，我反对从 $\frac{4}{5}$ 减为 $\frac{2}{3}$ 。說明理由的抗議制不应当采用，所以我反对这一点。第二个問題，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相互监督补选制問題，是比較重要的。两个中央机关的相互一致，是

① 否決，異議。——編者注

保証協調的必要条件。这里談到的是两个中央机关决裂的問題。誰不願意分裂，誰就應該关心維持協調。大家从党内生活中知道有过一些制造分裂的人。这是个原則問題，是个重要問題，是同党的整个未来命运有关的問題。”（第 276—277 頁）这就是在党代表大会記錄中所載的我那次发言內容概要的全文。馬尔托夫同志对于这次发言特別重視。可惜他虽然重視这次发言，但是他在提到这次发言时絲毫不联系作这次发言时的全部討論情况和代表大会上的整个政治形势。

首先是这样一个問題：为什么我在自己最初的草案中（第 394 頁第 11 条）^① 仅以 $\frac{2}{3}$ 的票数为限，而没有要求中央机关在补选問題上相互实行监督呢？继我以后发言的托洛茨基同志（第 277 頁）也立刻提出了这个問題。

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巴甫洛維奇同志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一封信，都对这个问题作了答复。党章第 1 条“把器皿打破了”，我們必須用“双結”把它捆好，——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这样說过。这就是說：第一、馬尔托夫在純理論問題上暴露出自己是机会主义者，而李伯尔和阿基莫夫又坚持了他所犯的錯誤；第二、馬尔托夫分子（即火星派中的区区少数）和反火星派分子联盟的事实使他們有可能在选举中央机关成員时成为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我強調說必須維持協調并告誡必須防各“制造分裂的人”时指的正是中央机关人选問題。当时这种告誡确实有重要的原則意义，因为“火星报”組織（当然，它在中央机关人选問題上是更有权威的組織，因为它录熟悉实际工作中的一切事务和所有候选人）已經表示了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見，已經通过了关于它所願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32頁。——編者注

慮的那些候選人的相當的決議。無論在道義上或者在問題實質上（即按照提出決議者的權威程度），“火星報”組織在這個微妙的問題上都應當起決定作用。但是，馬爾托夫同志在形式上當然有充分的權利請求李伯爾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幫忙反對“火星報”組織的多數派。阿基莫夫同志在關於黨章第 1 條的出色的發言中非常明白而聰明地說，當他看到火星派分子中間在達到他們共同的火星派目的的方法上發生意見分歧時，他就自覺地、有意地投票贊成比較壞的方法，因為他阿基莫夫的目的是同火星派的目的針鋒相對的。所以，毫無疑義，甚至不管馬爾托夫同志的意志和意識如何，正是較壞的中央機關人選將會得到李伯爾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的支持。他們能夠投票，他們一定會投票（不是根據他們的言論，而是根據他們的行為，根據他們對於黨章第 1 條的投票情況來判斷）贊成包括“製造分裂的人”在內的名單，並且他們投票的目的正是為了“製造分裂”。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說這個問題是關係着黨的整個未來命運的重要原則問題（兩個中央機關的協調），又有什麼奇怪呢？

凡是稍微了解火星派的思想、計劃以及運動史，稍微有誠意贊成這些思想的社会民主黨人，一分鐘也不會遲疑地認為，由李伯爾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解決“火星報”組織內部對於中央機關成員問題的爭論雖然在形式上是正確的，但是一定會造成最壞的結果。我們一定要同這種最壞的結果進行鬥爭。

試問：怎樣進行鬥爭呢？我們進行鬥爭時既不用歇斯底里的手段，也不用無理取鬧的辦法，而是用完全老老實實和完全正當的辦法；當我們感覺到我們處在少數地位時（正如討論黨章第 1 條時那樣），我們就請求代表大會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在接受委員時採取更嚴格的絕對多數表決制（以 $\frac{1}{2}$ 代替 $\frac{2}{3}$ ），在補選時採取一致

同意和中央机关相互监督补选制，——所有这些办法，当我们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处于少数地位时都是坚持了的。有些人总是忽视这一事实，他们喜欢在一两次朋友谈话之后就凭空评论代表大会，却不肯认真研究一下全部记录 and 所有当事人的“口供”。凡是愿意诚实地把这些记录和这些口供拿来进行研究的人，必然会看到我所指出的这一事实：在代表大会当时形势下，争论的根源正是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我们所以力求规定更严格的监督条件，也就是因为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想用“双结捆好”马尔托夫在李伯尔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欣赏和欣然参加之下打破了的那个“器皿”。

巴甫洛维奇同志讲到代表大会的当时形势时说，“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就只好认为，我们主张在补选时需要一致同意，就等于替敌人操心，因为，对于在某个机关中占多数的党，一致同意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不利的。”（“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第14页）可是，现在有人总是忘记事件发生的顺序，忘记现在的少数派在代表大会整个时期内都曾经是多数（由于李伯尔之流和阿基莫夫之流的参加），忘记关于中央机关补选问题的争论正是发生在那个时期，并且这次争论的内在原因就是“火星报”组织内部因中央机关人选问题而发生意见分歧。谁认清了这个情况，谁也就会懂得我们争论为什么这样激烈，谁也就不会对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表示惊奇：为什么一些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居然引起真正重要的原则性问题。

捷依奇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第277页）说得很对，他说：“毫无疑问，这个建议是针对目前形势提出来的。”的确，只有了解当时形势的全部复杂性以后，才能了解争论的真正意义。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当我们处于少数地位时，我们总是用任何一个欧洲

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合情合理的方法来维护少数的权利的，即向代表大会请求对于中央机关人选进行更严格的监督。叶哥罗夫同志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不过是在另一次会议上——说得也很对，他说：“使我非常惊奇的是，我在辩论中又听到有人拿原则作借口”……（这是在代表大会第 81 次会议上谈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时说的，就是说，据我所知，是在星期四早晨说的，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第 26 次会议则是在星期一晚上举行的）……“看来，大家都应该明白，在最后几天内，所有的争论都不是围绕在某个原则问题上，而只是围绕在怎样保证或者阻止某人加入中央机关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原则早就丧失净尽了，我们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全场大笑。穆拉维约夫说，“请写在记录上，马尔托夫同志笑了。”）”（第 337 页）怪不得马尔托夫同志和我们大家一听见叶哥罗夫同志这些确实可笑的怨言时都大笑起来了。是的，“在最后几天内”，许许多多争论都围绕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这是事实。这在代表大会上确实是大家都清楚的（现在只有少数派才力图抹杀这一明显的事实）。最后，应该如实地说出事实真相，这也是对的。可是，上帝呵，这究竟跟“原则丧失净尽”有什么相干呢？要知道我们所以聚集在一起举行代表大会，是为了（见第 10 页，代表大会议事日程）在最初几天谈一谈纲领、策略、章程并解决有关的问题，在最后几天内（议事日程第 18、19 项）谈一谈中央机关人选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有人把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天用来为指挥棒而进行斗争，这本来是自然而然的、完全正当的现象。（至于在代表大会以后为指挥棒而吵架，那就是无谓争吵了）。谁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遭到失败（如叶哥罗夫同志那样）以后竟说什么“原则丧失净尽”，简直是令人可笑的。难怪大家都嘲笑叶哥罗夫同志。同样也难怪穆拉维约夫

同志請求把馬尔托夫同志也对他嘲笑这一事实写到记录上，馬尔托夫同志嘲笑叶哥罗夫同志，就是自己嘲笑自己……

为了补充穆拉維約夫同志的諷刺，也許可以举出这样一件事實。大家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馬尔托夫同志到处揚言，說我們意見分歧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央机关补选問題；說“旧編輯部中的多数”曾經激烈反对两个中央机关在补选方面相互监督的办法。在代表大会以前，馬尔托夫同志在接受我提出的选举两个三人小組以及按²⁾的多数实行相互补选的草案时，曾把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見写給我，他說：“在接受这样的相互补选形式时，应当着重指出，在代表大会以后，每个委员会人員的补充都将按照稍微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来实行（我的意見是，每个委员会在补选新委員时都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訴給另一个委员会，后者可以提出抗議，那时爭論就由总委员会来解决。为了避免拖延，这种手續应当用于那些已經預先确定的候补人（至少对中央委员会來說應該这样做），拿这些候补人来补充，会更簡便一些）。为了着重指出将来的补选应当按照党章規定的手續办事，必須在第 22 条^①补充一句：‘……所有已經成立的決定都應該按照手續批准’。”（着重号是我加的）

这是用不着說明的。

在說明了中央机关补选問題进行爭論的当时形势的意义以后，我們应当稍微談一下这个问题的表决情况；至于討論情况就不必談了，因为我上面引用的两个发言（馬尔托夫同志的和我的发

^① 这是指全体代表都知道的我最初提出的那个大会 Tagesordnung（議事日程。——編者注）草案以及草案說明。这个草案第 22 条說的正是关于选举两个三人小組为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和中央委员会，由这 6 人按²⁾的多数实行“相互补选”，由代表大会批准这个相互补选以及关于以后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和中央委员会自行补选的問題。

言)发表以后,只有很少几个代表提出过一些简短的质問(记录第277—280頁)。說到表决情况,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硬說我在自己的說明里作了“最大的歪曲”(同盟记录第60頁),“因为他把当时圍繞党章进行的斗争”……(馬尔托夫同志无意中說出了一个很大的真理:在党章第1条問題以后,激烈的爭論正是圍繞党章进行的)……“描写成‘火星报’对那些同崩得結成联盟的馬尔托夫分子的斗争”。

讓我們仔細看一看这个“最大的歪曲”的有趣的問題吧。馬尔托夫同志把关于总委员会成員問題的表决同关于补选問題的表决联系起来,并且举出8次表决:(1)由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各选出两人加入总委员会——贊成的有27票(馬),反对的有16票(列),棄权的有7票^①。(順便說一下,在记录第270頁上写的是,棄权的有8票,但这是件小事情);(2)由代表大会选出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員——贊成的有28票(列),反对的有18票(馬),棄权的有7票;(3)由总委员会自行补选新委員来代替总委员会的离职委員——反对的有28票(馬),贊成的有16票(列),棄权的有12票;(4)在补选中央委员会委員时要取得一致同意——贊成的有25票(列),反对的有19票(馬),棄权的有7票;(5)只要有一个能說明理由的抗議就不能接受委員——贊成的有21票(列),反对的有19票(馬),棄权的有11票;(6)在补选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委員时要一致同意——贊成的有28票(列),反对的有21票(馬),棄权的有7票;(7)允許对总委员会有权取消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关于不接受新委員的決議的問題进行表决——贊成的有25票(馬),反对的有19票(列),棄权的有7票;(8)对于这个提議本

^① 括弧中“馬”字和“列”字,是表示我(列)和馬尔托夫(馬)当时站在哪一方面。

身——贊成的有 24 票(馬), 反对的有 23 票(列), 棄权的有 4 票。馬尔托夫同志最后說, “这里, 显然有一位崩得代表投票拥护过这个提議, 其余的崩得代表都表示棄权。”(着重号是我加的)(同盟記录第 61 頁)

試問, 当时沒有实行記名投票, 馬尔托夫同志怎么会认为显然有一位崩得分子投票拥护过他馬尔托夫的主張呢?

原来是他注意到了表决人数, 当表决人数表明崩得参加了投票时, 他馬尔托夫同志就深信这种参加是有利于他馬尔托夫的。

試問我哪里有什么“最大的歪曲”呢?

总票数是 51 票, 除去崩得分子只有 46 票, 再除去工人事业派分子則只有 48 票。馬尔托夫同志列举的 8 次表决中有 7 次是 43、41、39、44、40、44 和 44 个代表参加表决, 有一次是 47 个代表(确切些說, 是 47 票)参加表决, 馬尔托夫同志本人在这里也承认有一个崩得分子支持他的主張。可見, 馬尔托夫所描繪的(而且描繪得很不全面, 这一点我們以后就可以看出来)情景原来只是証实和加重我所描写的斗争情况! 原来在很多場合棄权的票数是很大的, 这恰恰表明整个代表大会对于某些细节问题的兴趣是比较小的, 火星派分子在这些問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派別分化。馬尔托夫所說的崩得分子“棄权显然是帮助了列宁”一語(同盟記录第 62 頁), 恰恰是針對馬尔托夫本人的, 这就是說, 只有在崩得分子缺席或者棄权时, 我才有时有过胜利的机会。但是每当崩得分子认为值得对斗争干預一下时, 他們总是支持馬尔托夫同志的, 而他們这种干預又不只表现在上述有 47 个代表参加的那次表决中。誰願意查一查代表大会的記录, 誰就能看出馬尔托夫同志所描繪的情景是十分奇怪的不完备。馬尔托夫同志干脆把崩

得参加过整整三次表决都漏掉了，而这三三次表决结果当然都是使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这三次就是：（1）通过佛敏同志提出的把法定多数从 $\frac{1}{3}$ 减为 $\frac{2}{3}$ 的修正案。赞成的有 27 票，反对的有 21 票（第 278 页），就是说，有 48 票参加了表决。（2）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关于取消相互补选制的提議。赞成的有 26 票，反对的有 24 票（第 279 页），就是说，有 50 票参加了表决。最后，（3）否决我所提的只有取得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同意才能补选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提議（第 280 页）。反对的有 27 票，赞成的有 22 票（甚至是記名投票，可惜这次投票沒有写在记录上），就是说，有 49 票参加了表决。

总结：对于中央机关补选问题，崩得分子只参加四次表决（有三次是我刚才列举过的，有 48、50 和 49 票参加，还有一次是马尔托夫同志列举过的，有 47 票参加）。所有这四次表决的结果，都是马尔托夫同志取得了胜利。我的叙述原来在各方面都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指出马尔托夫分子和崩得的联盟方面，无论是在指出问题的比较细节的性质（在许多场合都有许多人弃权）方面，也无无论是在指出火星派分子沒有明显的派别分化（沒有举行記名投票；参加讨论的人数很少）方面。

马尔托夫同志想在我的叙述中找矛盾，只是想施展一下不高明的手法，因为马尔托夫同志断章取义地抓住了只言片语，却没有花点气力把全部情景重述出来。

党章中最后关于国外组织问题的一条，又引起了充分表明代表大会上派别划分情况的讨论和表决。当时谈的是承认同盟是我们党的国外组织的問題。阿基莫夫同志当然馬上表示反对，他提醒大家回忆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国外联合会，并指出这个問

題的原則意義。他說，“我首先應當聲明，我並不認為對這個問題的某種解決辦法有什麼特別重大的實際意義。直到現在我們黨內進行的思想鬥爭顯然還沒有完結，但是它會在另一個方面和另一種力量配置下繼續下去…… 黨章第 13 條是想把我們代表大會由黨的大會變為派別大會這一傾向再一次而且特別鮮明地表現出來。人們不是要強使俄國所有社會民主黨人為了黨的統一而服從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把所有的黨組織統一起來，而是要代表大會消滅少數派的組織，強使少數派消失不見。”（第 281 頁）讀者可以看出，馬爾托夫同志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遭到失敗以後，竟和阿基莫夫同志一樣十分珍愛起“繼承性”了。但是，在代表大會上，那些對自己用一個尺度面對別人用另一個尺度的人却起來猛烈地反對阿基莫夫同志。雖然黨綱已被通過，“火星報”已被承認，黨章幾乎全部被通過了，但是恰恰在這時出現了一個“在原則上”把同盟和聯合會分開的“原則”。馬爾托夫同志高聲喊道，“如果阿基莫夫同志想把問題提到原則的基礎上，那我們是一點也不反對的；特別是因為阿基莫夫同志說到在同兩個派別鬥爭時的各種可能的勾結。我們所以要批准一種方針的勝利（請注意，這是在代表大會第 27 次會議上說的！）並不是要向‘火星報’再一次恭維，而是說要最終告別阿基莫夫同志提到的一切可能的勾結。”（第 282 頁，着重號是我加的）

當時的情況是：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一切關於綱領問題的爭論已經完結以後，還在繼續最終告別一切可能的勾結……直到他還沒有在中央機關人選問題上遭到失敗時為止！馬爾托夫同志在代表大會上“最終告別”他在代表大會以後第二天就順利實現的那種可能的“勾結”。但是，阿基莫夫同志在當時就已經比馬爾托夫同志有遠見得多；阿基莫夫同志援引了“根據第一次代表

大會的意志帶着委員會名稱的一個老的黨組織”五年來的工作，並以非常毒辣的有先見之明的警句作結語說：“至於說馬爾托夫同志認為我希望我們黨內產生另外一種派別是白費心思，那我應當說，連他自己我都抱着希望呢。”（第 283 頁）

是的，應該承認，馬爾托夫同志確實沒有辜負阿基莫夫同志的希望！

當一個可以算是做過三年工作的老的黨委員會的“繼承性”遭到破壞時，馬爾托夫同志就深信阿基莫夫同志的話是正確的而跟着他走了。可見，阿基莫夫同志取得的勝利是沒有花多大代價的。

但是，在代表大會上擁護過——而且一貫擁護過——阿基莫夫同志的只有馬爾丁諾夫同志、勃魯克爾同志和崩得分子（8 票）。作為“中派”真正領袖的葉哥羅夫同志採取了中庸之道：請着，他贊成火星派分子的意見，對他們表示“同情”（第 282 頁），並且為了證明這種同情而建議（第 288 頁）要完全迴避當時已經提出的原則問題，避而不談同盟和聯合會。他的提議由 27 票對 15 票被否決了。顯然，除了反火星派分子（8 票）以外，幾乎所有的“中派”分子（10 票）都同葉哥羅夫同志一起投票擁護這個提議（投票總數是 42 票，可見有許多人是棄權的，或者是缺席的，象進行既沒有興趣而結果又是毫無疑義的表決時常常發生的那種情況）。每當要切实地實行“火星報”的原則時，立刻就暴露出“中派”的所謂“同情”原來只是口頭上的同情，而擁護我們的原來只有 30 票或者稍微多幾票。對魯索夫的提議（承認同盟為唯一的國外組織）舉行的辯論和表決情況，更明顯地證明了這一點。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已經直接採取了原則的立場，發言擁護這一立場的有李伯爾和葉哥羅夫兩位同志，他們說魯索夫同志的提議是不可能進行表決的，是不合理的，因為“這個提議是要殺害其餘一切國外組織”（葉哥羅夫

語)。他不願意參加“杀害某个組織”，所以他不仅拒絕表決，并且退出了會場。但是我們要替“中派”首領說一句公道話，他表現了比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們要大十倍的堅定信心（堅信自己的錯誤原則）和政治勇氣，他并不只是在事關自己那個已在公開鬥爭中遭到失敗的小組時才擁護“被杀害的”組織。

魯索夫同志的提議以 27 票對 15 票認為可以進行表決，然後又以 25 票對 17 票通過了。如果我們把缺席的葉哥羅夫同志加到這 17 票中，結果就會看到反火星派分子和“中派”的全班人馬（總共 18 票）。

黨章第 18 條關於國外組織的全文，是以 31 票對 12 票並在 6 票棄權的情況下通過的。31 票這個數目表明，代表大會上大約有多少火星派分子，就是說大約有多少人一貫堅持並且切實執行“火星報”的觀點，——這個數目，我們在分析代表大會的表決情況時已經碰到過不下 6 次（崩得問題在議事日程上的地位，組委會事件，解散“南方工人社”問題，關於土地綱領的兩次表決）。而馬爾托夫同志却硬要我們相信把這樣一個“狹隘的”火星派集團劃分出來是毫無根據的！

同時還要指出，在黨章第 18 條通過以後，立刻就因阿基莫夫和馬爾丁諾夫兩位同志聲明“拒絕參加表決”而引起了非常值得注意的討論（第 288 頁）。當時大會主席團討論了這個聲明，並且完全合理地認為，即便把聯合會干脆封閉也不能使聯合會的代表有任何理由拒絕參加代表大會的工作。拒絕參加表決是根本反常的和絕對不能容許的，——這就是當時整個代表大會同主席團一致的看法，其中也有火星報少數派分子，他們在第 28 次會議上還激烈地抨擊他們自己後來在第 31 次會議上所幹的事情！當馬爾丁諾夫同志為自己的聲明辯護時（第 291 頁），起來反對他的有巴甫洛維

奇，有托洛茨基，有卡爾斯基，也有馬爾托夫。馬爾托夫同志特別明顯地意識到心懷不滿的少數派的義務（是在他自己還沒有成為少數派以前呵！），並且在講台上特別有教益地訓了他們一通。他指着阿基莫夫和馬爾丁諾夫兩位同志高聲說，“或者你們是代表大會的成員，那末你們應該參加大會的一切工作，”（着重號是我加的；當時馬爾托夫同志還沒有覺察到少數服從多數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或者你們不是代表大會的成員，那末你們就不能留在會場上……聯合會的代表們的聲明使我不得不提出兩個問題，他們是不是黨員呢，是不是代表大會的成員呢？”（第292頁）

馬爾托夫同志那時還在教訓阿基莫夫同志了解黨員的義務呢！可是，阿基莫夫同志那時就說他對馬爾托夫同志寄托着某種希望，並不是徒然的……不過這種希望是馬爾托夫在選舉中遭到失敗以後才實現的。當問題還沒有涉及到他自己而只涉及到別人時，馬爾托夫同志甚至對第一次（我記得是這樣）由馬爾丁諾夫同志使用的所謂“非常法”這一嚇人的字眼，也是充耳不聞的。馬爾丁諾夫同志回答那些勸他收回本人聲明的人說，“我們聽到的解釋，並沒有解釋清楚，究竟這是個原則的決定呢，還是用來對付聯合會的一種非常辦法。如果是一種非常辦法，我們就認為這是對聯合會的一種侮辱。葉哥羅夫同志也同我們一樣認為這是用來對付聯合會的非常法（着重號是我加的），所以甚至退出了會場。”（第295頁）當時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兩位同志都同普列漢諾夫一起堅決反對把代表大會表決結果看作一種侮辱的荒謬思想，反對這種確實荒謬的思想；托洛茨基同志在擁護代表大會根據他的提議通過的決議（說阿基莫夫和馬爾丁諾夫兩位同志可以認為自己已經得到十分滿意的解釋）時說，“這個決議是有原則的而不是庸俗的性質，我們決不顧忌誰會因為通過了這個決議而感到委屈。”

(第 296 頁)但是,很快就証明,小組习气和庸俗观念在我們党内还是很厉害的,而我用着重号标出的那些豪言壮語只不过是一些响亮的空話而已。

阿基莫夫和馬尔丁諾夫两同志拒絕收回自己的声明,并在大会代表一致說他們“真是枉費心机!”的叹息声下退出了代表大会。

(十三)选举。代表大会的結束

代表大会在通过党章以后,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各区組織的決議以及好几个关于党内个别組織的決議,在进行了我在上面分析过的关于“南方工人社”的富有教益的討論以后,跟着就討論党中央机关的选举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整个代表大会都期待着“火星报”組織作一个权威性的介紹,但是“火星报”組織在这个問題上发生了分裂,因为“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竟想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公开的自由的斗争取得多数。同时我們还知道,早在召开代表大会很久以前以及在代表大会上,所有代表都知道选出两个三人小組为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和中央委员会来改組編輯部的計劃。为了闡明代表大会上的討論情况,讓我們把这个計劃比較詳細地分析一下。

我在代表大会 Tagesordnung 草案上加了一个附注來說明这个計劃,原文如下^①：“代表大会选出 3 人为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委員,选出 3 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員。必要时,这 6 个人在一起,經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补选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員,

^① 見我的“給‘火星报’編輯部的信”第 5 頁,并見同盟記錄第 53 頁。

并向代表大会作有关的报告。这个报告經大会批准以后，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和中央委员会就可以分別进行补选。”

从这个附注可以十分肯定而明确地了解到上述计划的内容就是：在最有威信的实际工作领导者的参加之下改組編輯部。这个计划所包括的两个特点，是每一个願意稍微留心閱讀上述原文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出的。可是，現在就連最粗淺的道理也必須加以解釋。这个计划的内容正是要改組編輯部，不一定是扩大，也不一定是縮減委員人数，而正是加以改組，因为可能扩大或可能縮小的問題还是一个悬案；补选只是預定在必要时才实行的。人們对改組問題提出种种設想，有人預計可能把編委人数縮小或者扩大到7个人（我本人从来就认为七人小組比六人小組更适当）甚至扩大到11个人（我认为如果同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組織，特别是同崩得以及波兰社会民主党实行和平联合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主張“三人小組”的人通常会忽略的最主要一点，就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員参加解决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将来的补选問題。“少数派”方面所有身为本組織成員并出席代表大会的同志，都知道而且拥护这个计划（有些人曾特別表示贊同，有些人則緘默地表示贊成），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費点气力說明一下这种要求的意义。第一、为什么正是把三人小組并且仅仅把三人小組作为改組編輯部的出发点呢？显然，如果提出这个计划的用意完全是或者主要是扩大委员会，如果大家认为这个委员会是个真正“协调的”集体，那末这个计划就根本没有什么意思了。在扩大一个“协调的”委员会时，不以这个委员会的全体人員为出发点，而只以其中一部分人为出发点，那就未免太奇怪了。显然，并不是委员会的全体委員都被认为完全适于討論和解决改組編委会的成員問題，即把旧的編輯小組变成党机关的問題。显然，甚至那些自

己想用扩大的办法进行改组的人也承认旧成员是不协调的，是不符合党机关的理想，否则就没有必要为了扩大六人小组而先把它缩减为三人小组了。我再重复一遍：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只是因为问题暂时被“个人意气”弄模糊了，人们才忘记这一点。

第二、从上面引用的那段原文可以看出，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3个委员一致同意，也还不能扩大三人小组。这一点也是常常被忽略的。为了实行补选，必须6个人中有三分之二的票数，即4票表示同意；就是说，只要中央委员会3个当选的委员说个《veto》时，编委三人小组就根本不能扩大了。反过来说，即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3个委员中有两个人反对实行补选，而补选还是能够在中央委员会所有3个委员同意之下实现的。所以很明显，当时的用意是，要让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那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者在把旧的小组变成党机关时有决定权。至于我们当时大致提出的是哪些同志，从以下事实便可以看出来：编辑部在代表大会以前曾一致选举巴甫洛维奇同志为编辑部中的第七个委员，使他在代表大会上必要时可以用编委名义表示意见；除了巴甫洛维奇同志以外，还有“火星报”组织中一个身为组委会委员的老组员被提为第七个委员，这个老组员后来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样，选出两个三人小组的计划显然是打算：（1）改组编辑部，（2）消除编辑部中某些与党机关不相适应的旧的小组习气的特点（假如没有什么可消除的，那就根本不必想出最初的三人小组了），最后，（3）消除这个作家集团的“神权”特点（消除的办法就是吸收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解决扩大三人小组的问题）。这个由全体编委看过的计划，显然是根据三年来的工作经验，并完全符合我们一贯奉行的革命组织原则的；在“火星报”问世的那

个涣散时代，各个团体經常偶然地自发地形成起来，必然带有一些有害的小組习气的色彩。建立党就是要消除这种特点，而且也需要消除这种特点；吸收一些优秀的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是有必要的，因为有些編委一向負責組織方面的事务，編輯部加入党机关系統不应当只是一个著作家集团，而应当是一个政治領導者集团。至于让代表大会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組，这从“火星报”的一貫政策来看，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們十分慎重地筹备了代表大会，等待大家充分了解綱領、策略和組織方面发生爭論的原則問題；我們并不怀疑代表大会一定是火星主义的代表大会，即絕大多数代表在这些基本問題上一定是意見一致的（承认“火星报”为指导性机关报的決議也部分地証实了这一点）。因此我們应当让那些担負了傳播“火星报”思想并准备把“火星报”变成政党这一切工作的重担的同志自己去决定，究竟誰是最适合参加新的党机关的候选人。只是因为“面个三人小組”计划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计划，只是因为这个计划完全符合“火星报”的全部政策，完全符合比較了解問題的人关于“火星报”所知道的一切，所以这个计划才得到大家的贊同，而沒有任何一个计划可以同它抗衡。

所以，魯索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首先提議选出两个三人小組。虽然馬尔托夫曾用书面通知我們，說这个计划同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有联系，但是那些拥护馬尔托夫的人却連想也沒有想到要把六人小組和三人小組問題的爭論轉到这个罪名是否正确的問題上。他們中間誰也沒有提到这一点！他們中間誰也不敢說半句关于同六人小組和三人小組有关的各种色彩的原則区别。他們宁願采用更流行更廉价的手法——意气用事，說什么可能使人感到受侮辱，并装模作样地說，編輯部問題已經由于任命“火星报”为中

中央机关报而得到解决了。柯里佐夫同志为反对魯索夫同志而提出的后一个論据，簡直是瞎說。在代表大会議事日程上規定了——当然不是偶然規定的——两个单独項目（見記錄第 10 頁），第 4 項是“党中央机关报”，第 18 項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編輯部”。这是第一。第二、在任命“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时，全体代表都坚决声明說这不是批准編輯部而只是批准方針^①，誰也沒有抗議过这个声明。

因此，认为代表大会批准一定的机关报其实就是批准編輯部这一說法，即少数派方面重复过許多次（柯里佐夫，第 321 頁，波薩多夫斯基，同上頁，波波夫，第 322 頁，以及其他許多人）的說法，是根本不符合事实的。这是誰都看得清楚的手法，这种手法是要掩盖他們所背棄的在大家还能真正大公无私地看待中央机关人選問題时而采取过的那种立場的行为。这种背棄行为决不能用原則动机来辯护（因为少数派明知在代表大会上提起“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問題對他們自己是很不利的，所以也就沒有提起这一点），也不能拿六人小組或三人小組是不是真有工作能力的事实材料作借口（因为一涉及这些材料，就会有一大堆反对少数派的証

^① 見記錄第 140 頁，阿基莫夫发言說：“……据說我們將把中央机关报选举問題留到最后去談”；穆拉維約夫发言反駁阿基莫夫，說阿基莫夫“对于未来的中央机关报編輯部問題非常关心”（第 141 頁）；巴甫洛維奇发言說，我們任命了机关报，也就得到了“我們能够用来实行阿基莫夫同志所关心的那些手术的具體材料”，至于“火星报”應該“服从”“党的決議”，那是毫無疑問的（第 142 頁）；托洛茨基发言說，“既然我們不是批准編輯部，那末我們究竟是批准‘火星报’的什么东西呢？……我們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方針……不是批准名称而是批准旗帜”（第 142 頁）；馬尔丁諾夫发言說，“……我也同其他許多同志一样，认为我們現在討論承认代表一定方針的‘火星报’為我們中央机关报的問題时，不应当涉及到选举方法或批准其編輯部的問題，這個問題留待以后議事日程的适当場合再談……”（第 143 頁）

据)。所以他們只好用所謂“严密的整体”，“协调的集体”，“严密的如结晶般完整的整体”等空话来堵塞。难怪这些论据立刻就被人恰如其分地称为“无聊的话”（第 328 页）。三人小组计划本身就清楚地证明不够“协调”，而代表們在一个多月的共同工作中得到的印象，显然又給他們提供了大批可以独立判断问题的材料。当波薩多夫斯基同志暗示到这种材料时（在他看来这是說話不慎和考虑不周的结果，第 321 页和第 325 页，他說他是“有条件地”使用了“疙瘩”一詞），穆拉維約夫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說，“我认为現在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已經十分明白，这样的^①疙瘩无疑是存在的”（第 321 页）。当时少数派宁願把“疙瘩”一詞（第一次使用这个詞的不是穆拉維約夫而是波薩多夫斯基）了解为仅仅是涉及个人意气的东西，不敢接受穆拉維約夫同志的挑战，不敢根据问题实质提出任何一种论据为六人小组辯护。結果就产生了一场十分可笑的爭論：多数派（以穆拉維約夫同志为代言人）說他們十分了解六人小组和三人小组的真正意义，而少数派根本不听这一点，硬說“我們沒有可能进行分析”。多数派不仅认为可能进行分析，而且已經“进行分析了”，并且說这种分析的结果已使他們看得十分明白。少数派大概是害怕分析，所以就用一些“无聊的话”来掩飾自己。多数派劝人“注意到，我們的中央机关报編輯部不只是作家集团”，多数派“希望，当选来主持中央机关报的都是一些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即符合我所說的那些要求的人物”（即符合于不只是对作家提出的那些要求的人物，第 327 页，

① 波薩多夫斯基同志指的究竟是什么“疙瘩”，我們在代表大会上始終不知道。穆拉維約夫同志却在同一次會議上（第 322 页）提出抗議，說人家把他的思想轉說錯了，后来他在批准記察时又直截了当地声明，說他“所讲的是在代表大会討論各种問題时暴露出来的疙瘩，这是原則性的疙瘩，目前这些疙瘩的存在，可惜已經是誰也不会否认的事实。”（第 353 页）

朗格同志的发言)。少数派又不敢接受挑战，一字不提他们究竟认为谁适合参加不只是著作家集团的委员会，究竟谁是“完全确定的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少数派仍旧拿所谓“协调性”作护身符。不但如此，少数派甚至拿一些根本不符合原则的、理应受到公正抨击的理由做论据，说什么“代表大会既没有道义权利，也没有政治权利来改变编辑部”（托洛茨基语，第326页）；说什么“这是一个很棘手的(sic)问题”（也是他说的）；说什么“那些落选的编委应当怎样对待代表大会不愿意把他们留在编辑部的事实呢？”（察辽夫语，第324页）^①

这样的理由已经把问题完全转到埋怨和诉苦方面了，这就是公开承认他们在真正原则的论证上，在真正政治的论证上破了产。多数派立刻就用恰如其分的字眼——庸俗观念——来形容这种提问题的方法（鲁索夫同志语）。鲁索夫同志公正地指出，“一个革命家居然说出这样一些根本同党的工作概念相反，同党的道德概念相反的奇怪言论。反对选举三人小组的一些人所持的基本理由可归结为，以纯粹庸人的观点看待党的事业”（所有的着重号都是我加的）……“如果我们持着这种不是党性的而是庸人的观点，那末我们在每次选举时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选举甲而选举乙，甲会不会生气呢；如果我们不选举组委会某某委员而选举另一个人作为中央委员会委员，组委会某某委员他会不会生气呢。同志们，这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我们聚集在这里不是为了说些相互捧场的话，不是为了表示庸人的交情，而是为了建立党，那末我们根本拒绝这样的观点。我们既然必须选出负责人

^① 参看波萨多夫斯基同志的演说：“……如果你们从旧编辑部六个人当中选出三个人，那末你们就是认为其余三个人都是不必要的，是多余的。而你们这样做，既没有权利，也没有根据。”

員，这里也就談不上什麼對某個落選者是不是信任的問題，而只看對事業是不是有利和當選人是不是適合他當選後所擔任的職務的問題。”（第 325 頁）

我們建議每一個願意獨立研究黨內分裂的原因並在代表大會上探討這個分裂的根源的人，都把魯索夫同志的演說讀一遍或者讀幾遍，魯索夫同志提出的理由少數派不僅沒有推翻，而且也沒有抗議過。這樣一個起碼的基本真理本來是抗議不了的；魯索夫同志自己很公正地指出，人們忘記了這個真理只是由於“神經過敏”。這樣來說明少數派怎樣從党性觀點滾到庸俗觀念和小組習氣觀點，確實最不會使少數派感到不愉快①。

- ① 馬爾托夫同志在他的“戒嚴狀況”中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也同他對於所涉及的其他問題的態度一樣。他並沒有費點氣力說明一下這次爭論情況的全貌。他竟然迴避了這次爭論中提出來的唯一的真正原則的問題：是講庸人的交情呢，還是選舉負責人？是党性觀點呢，還是怕某某人生氣？馬爾托夫同志在這里也只限於從整個事件中斷章取義地引用了一些沒有聯繫的詞句，並且還加上許多謾罵我的話。馬爾托夫同志，這還少了一點呀！

馬爾托夫同志特別拿來同我搗亂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代表大會沒有選舉阿克雪里羅得、查茲利奇和斯塔羅維爾三位同志。他所持的那種庸俗觀念使他看不到這個問題不体面（為什麼他不去質問他們編輯部的同事普列漢諾夫同志呢？）。他硬說我的話自相矛盾，說我一面認為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上對待六人小組問題的行為“不恰當”，同時又要求全党公論。其實這里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馬爾托夫同志如果願意費點氣力把問題的全部事件作一個嚴實的敘述，而不只是斷章取義，那末他自己也不難了解到這一點。用庸俗觀念對待問題，意氣用事，這當然是不恰當的；為了全党公論，必須從實質上估計六人小組比三人小組究竟有什麼優越的地方，估計負責職務的候選人，估計各種色彩，但是少數派在代表大會上都連提也沒有提到這一點。

馬爾托夫同志只要仔細研究一下記錄，就會知道代表們在發言中提出一系列反對六人小組的理由。請看這些演說中的幾段話吧：第一、旧的六人小組中間顯然有原則性的疙瘩；第二、最好把編輯工作的技術手續簡化一下；第三、事業的利益要高于庸人的交情；只有實行選舉才可以保證當選人適合他們所擔任的職務；第四、決不能限制代表大會的選舉自由；第五、黨現在所需要的

可是，少数派根本无法找出一条合理的切实的理由来反对选举，所以他们除了把庸俗观念加进党的事业中去，还公然采取了一种简直是无理取闹的手段。例如，波波夫同志劝穆拉維約夫同志“不要接受为难的委托”（第 322 頁），他这种手段不是只能称为无理取闹嗎？这不就是如同索罗金同志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籠絡人心”嗎？（第 328 頁）这不正是在找不出政治理由时想利用“个人意气”嗎？索罗金同志所說“我們一向反对这种手段”一語，說得是不是正确呢？“难道捷依奇同志公然企图对那些不同意他的意見的同志給以当众侮辱的行为是可以容許的嗎？”^②（第 328 頁）

現在我們要把大会討論編輯部問題的情况作一个总结。少数派沒法駁倒（而且根本沒有駁倒过）多数派再三援引过的事实，即三人小組計劃是代表們在大会之初以及在大会以前已經知道了

中央机关报不应当只是著作家集团，中央机关报內不仅必須有著作家，而且要有管理人；第六、中央机关报內應該有完全确定并为代表大会所了解的人物；第七、六人委员会往往沒有工作能力；它的工作并不是靠一个不正常的章程实现的，而是不管有没有这个章程都能实现；第八、办报工作是党的（而不是小組的）事业等等。如果馬尔托夫同志对于六人小組沒有当选的原因很感兴趣，那末就請他細心考虑一下这些理由中的每一条理由，并把其中某一条——哪怕是一条——理由駁倒吧。

- ② 索罗金同志在同一次会议上 是把捷依奇同志的話了解成这样的（參看第 324 頁——“同奧尔洛夫的激烈對話”）。捷依奇同志解釋說（第 351 頁），他“根本沒有讲过类似的話”，但他自己又立刻承认他讲过非常“类似的話”。捷依奇同志解釋說，“我沒有說过看誰敢这样做，而只是說，我很想看一看究竟是哪些人敢（sic！捷依奇同志越說越糟了！）拥护象选举三人小組这样罪恶的（sic！）提議”（第 351 頁）。捷依奇同志不是駁倒而是証實了索罗金同志的話。捷依奇同志証實了索罗金同志的實難，他說“这里”（在少数派拥护六人小組的理由中）“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了”。捷依奇同志証實說，索罗金同志提醒大家要記住“我們既是黨員，就应当处处以政治上的理由为依据”这一 起碼 真理是完全恰当的。叫嚷实行选举是 罪恶行为，这不仅是墮落到庸俗观念，簡直是墮落到无理取闹的地步了！

的，因此这个計劃所根据的一些理由和材料是同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和爭論不相干的。少数派在拥护六人小組时采取了原則上錯誤的和不可容許的从庸人角度出发的立場。少数派暴露了自己完全忘記选举負責人員問題上的党性观点，甚至根本沒有估計每个重要职务的候选人以及这个候选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务。少数派始終迴避切实討論問題，却一味援引所謂協調性，“流眼泪”和“发脾气”（第 327 頁，朗格的发言），似乎“有人想要杀害”某某人。少数派甚至不惜采取“籠絡人心”，叫嚷选举是“罪恶”以及諸如此类不能容許的手段，而这都是“神經過敏”的結果（第 325 頁）。

庸俗观念同党性作斗争，最坏的“个人意气”同政治上的理由作斗争，无聊的話同起碼的革命责任感作斗争——这就是我們代表大会第 30 次會議上因六人小組和三人小組問題而发生的斗争的实质。

在第 31 次會議上，当代表大会已經以 19 票多数对 17 票并在 8 票棄权的情况下否决了关于批准旧編輯部全体人員的提議（見第 380 頁和勘誤表），而旧編委們也已經回到會場上时，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代表旧編輯部多数提出的声明”中（第 380—381 頁）更厉害地表现了他那种政治立場和政治观念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讓我們把这篇集体声明和我对该声明的答复（第 382—383 頁）逐条詳細地分析一下吧。

馬尔托夫同志在旧編輯部未被批准以后說，“从今天起，旧‘火星报’就停止存在了，所以把它的名称改一下，也許更前后一貫些。無論如何，我們认为代表大会新通过的決議大大縮小了它在头一次會議上对‘火星报’所表示的信任。”

馬尔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出了在許多方面确实值得注意和

值得玩味的政治一貫性問題。我已經援引過大家在批准“火星報”時說的那些話來回答這一點（記錄第349頁，參看上面第82頁）^①。毫無疑問，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把政治不一貫性表現得最明顯的一件事實；至於表現了這種不一貫性的究竟是代表大會的多數還是舊編輯部的多數，請讀者自己去判斷吧。同時，我們還要請讀者自己解決馬爾托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提得正是時候的另外兩個問題：（1）想把代表大會關於選舉負責人員參加中央機關報編輯部的決定看作“縮小對‘火星報’的信任”，——這是庸人觀點還是党性觀點？（2）舊“火星報”是從什麼時候起真正停止存在的呢？是從我和普列漢諾夫兩人開始編輯第46號的時候起呢，還是從舊編輯部多數開始編輯第58號時候起？如果說第一個問題是很值得注意的原則問題，那末第二個問題就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實問題。

馬爾托夫同志繼續說，“既然現在已經決定要選舉三個人組成編輯部，我就要用本人和其他三個同志的名義聲明，我們當中誰也不會參加這樣一個新編輯部。至於我個人，我要補充說：如果某些同志真想把我的名字當作一個候選人列入這個‘三人小組’，那我應當把這件事情看作我不應當受的侮辱（sic!）。我這樣說，是因為我注意到決定改變編輯部時所發生的情況。據說這樣決定是因為考慮到有什麼‘摩擦’^②，是因為舊編輯部沒有工作能力，可是代表

① 見本書第107—108頁。——編者注

② 馬爾托夫同志大概是指波薩多夫斯基同志用過的“挖苦”字眼而言。我再說一遍，波薩多夫斯基同志始終沒有向代表大會說明他想說些什麼，而同樣使用這個字眼的穆拉維約夫同志却說明，他指的是在代表大會討論中所表現出來的那些原則性的挖苦。讀者一定記得，有四個編委（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和我）參加過的唯一真正原則性的討論就是關於黨章第1條問題的討論，馬爾托夫和斯塔羅維爾兩位同志曾用書面訴苦說，人們把“莫須有

大会从一定意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向编辑部问过这种摩擦，甚至没有指定专门委员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能力问题”……（奇怪得很，少数派当中谁也没有想到向代表大会建议“质问编辑部”或指定专门委员会！是不是因为在“火星报”组织分裂以后以及在马尔托夫和斯塔罗维尔两位同志信中提到的那次谈判失败以后，这就没有益处了呢？）……“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能不把某些同志以为我会同意在这样改组后的编辑部中工作的推测，看作是对我本人政治名誉的中伤”……③

我故意把这段话全部引下来，是为了使读者知道在代表大会以后十分流行的一种行为的标本和开端，而这种行为只能叫作无谓争吵。我在我的“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已经使用过这个字眼，不管编辑部怎样感觉不满，我不得不反复使用它，因为它无疑

的机会主义罪名”当作“改变”编辑部的理由之一。马尔托夫同志在这封信中认为“机会主义”同改变编辑部的计划有明显的联系，而他在代表大会上却只隐晦地暗示“什么摩擦”了。至于“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他已经忘记了！

③ 马尔托夫同志还补充说：“这样的角色恐怕只有梁赞诺夫才会同意扮演，至于你们想必从他的工作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的那个马尔托夫，是决不会同意扮演这种角色的。”既然这是对梁赞诺夫的一种个人攻击，马尔托夫同志也就把这个声明收回了。可是，梁赞诺夫所以在代表大会上被当作一个普通名词来使用，决不是因为大家注意到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这些个人品质是不应该涉及的），而是因为大家注意到“斗争社”的政治面貌，注意到“斗争社”的政治错误。马尔托夫同志收回他所臆想的或者他确实给人硬加上的个人侮辱，这样做是很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忘记那些应当使党接受教训的政治错误。“斗争社”在我们代表大会上受到斥责，是因为它引起了“组织上的混乱”和“毫无原则理由造成的分散状态”（第88页，马尔托夫同志的演说）。这样的政治行为，不仅在党代表大会以前，在普通混乱时期，当它还是在一个小组中表现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应该受到斥责，而且在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混乱状态肃清时期，即使是由“‘火星报’编辑部多数和‘劳动解放社’多数”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完全应该受到斥责。

是个用得正确的字眼。有人以为无謂爭吵一定是出于“卑鄙的动机”（正如新“火星报”編輯部所推論的那样），这种想法是錯誤的。凡是稍微熟悉我們的流放生活和侨居生活的革命家，都一定看見过数十次无謂爭吵的現象，当时由于“神經過敏”以及由于不正常的沉悶的生活条件，人們往往提出并且嘟囔一些最荒謬的責难、猜疑、自咎、“个人意气”等等。不管这种无謂爭吵表现得多么卑鄙，但是沒有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一定要在这些无謂爭吵中寻找卑鄙的动机。只有用“神經過敏”一語才可以說明馬尔托夫同志演說中的上述言論，即把謬論、个人意气、幻想出来的恐怖、籠絡人心的行为、矯揉造作的侮辱和中伤等攙做一团的言論。沉悶的生活条件在我們这里产生数以百計的无謂爭吵，而一个政党假如不敢照实說出自己的病，不敢进行严格的診斷和找出治病的办法，那它就不配受人尊敬了。

如果从这一团糟的言論中可以分出什么原則性的东西，那末勢必得出一个結論：“实行选举是同破坏政治名誉毫不相干的”，“否认代表大会有权实行新的选举，有权随便变动負責人員，有权改选由它全权委任的委员会”，那末就会把問題弄得一場糊塗，而“馬尔托夫同志在是否可以由旧委员会中只选举一部分委員这个問題上的观点，表明他把政治概念混淆到极点了。”（这是我在代表大会上說的話，第 332 頁）^①

現在我不談馬尔托夫同志对于是誰提出三人小組計劃這一問題所作的“个人”評論，而只談一下他对于旧編輯部沒有被批准这一事实所作的“政治”估計：“……現在发生的事件是代表大会后半期进行的那个斗争的最后一幕”……（对呵！但这后半期是从馬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59頁。——編者注

尔托夫在党章第1条問題上落入阿基莫夫同志牢籠的时候开始的)……“誰都知道,实行这种改革时所注意的并不是‘工作能力’,而是爭取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影响”……(第一、誰都知道,当时既注意工作能力,又注意中央委员会成员問題所引起的意見分歧,因为提出“改革”計劃时还根本談不上后一种意見分歧,当时我們和馬尔托夫同志还一起选出巴甫洛維奇同志为編委会第七个委員呢!第二、我們已經根据文件材料指明,当时的問題关系到中央委员会的人选,当时的問題 *à la fin des fins*^① 归結为阿个不同的名单,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波波夫,另一个名单是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編輯部的多数已經表明他們不願意把中央委员会变成編輯部的工具”……(又唱起阿基莫夫式的調子来了,問題在于每一个党代表大会上的每一个多数派随时随地都要努力爭取影响,以便在中央机关中爭得多数而把这种影响巩固起来,但是人們把這個問題轉移到机会主义的誹謗方面去了,說什么編輯部的“工具”,說什么編輯部的“简单附屬品”,正像同一个馬尔托夫同志在比較晚的时候說的那樣,第334頁)……“所以必須縮減編輯部委員人数(11)。因此我也就不能加入这样一个編輯部”……(請仔細看一看这个“因此”二字:編輯部什么时候才能把中央委员会变成附屬品或工具呢?不是只有当編輯部在总委员会內拥有三票并且濫用这个优势的时候才会如此嗎?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嗎?同样,当选为第三个委員的馬尔托夫同志随时都能阻止任何濫用职权的现象,并以自己的一票来消灭編輯部在总委员会內的任何优势,——这难道不也是很明显的嗎?所以問題正是在于中央委员会的人选,而所謂工具和附屬品的說法只

① 归根結底。——編者注

不过是一种 餅磅 而已)……“我和旧編輯部的多数认为,代表大会将会結束党內的‘戒严状况’而奠定党內的正常秩序。誰知用非常法反对个别团体的戒严状况仍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了。只有在保存旧編輯部的全体成員时,我們才能担保編輯部根据党章享有那些权利不会使党受到危害”……

以上就是馬尔托夫同志 第一次提出所謂“戒严状况”口号的那段言論的全文。現在請看我对他的答复:

“……虽然我糾正了馬尔托夫所发表的两个三人小組的計劃是私人性质的这样一个声明,但是我并不想反对馬尔托夫所說的我們不批准旧編輯部是我們所实行的一个有‘政治意义’的步驟的断語。恰恰相反,我无保留地和无条件地同意馬尔托夫同志的意見,这个步驟是有巨大的政治意义的,——不过不是馬尔托夫所强加給它的那种政治意义罢了。他說,这是为爭取影响俄國境內的中央委员会而进行的斗争的一幕。我还比馬尔托夫更进一步。到現在为止,作为一个并非党的正式組織的‘火星报’的全部活动都是为爭取影响而进行的斗争,但現在問題已經进了一步,已經是要在組織上巩固这种影响,而不只是为爭取这种影响而斗争了。馬尔托夫同志认为这样希望影响中央委员会是我的罪过,而我却认为我过去和現在力求在組織上巩固这种影响正是我的功劳,由此可以看出,我和馬尔托夫同志在政治上分歧已經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我們甚至竟是用不同的語言讲话。如果我們的全部工作、我們的一切努力的結果仍然是照旧为爭取影响而斗争,而不是完全获得和巩固这种影响,那末这些工作、这些努力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的,馬尔托夫同志說得完全对,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无疑是有巨大政治意义的步驟,它証明我們选定了現在已經显露出来的方向之一作为我們党今后工作的方向。所謂‘党内戒严状况’、‘专为对付个别分子和个别团体而施行的非常法’等等吓唬人的字眼,是絕對吓不倒我的。对那些不坚定的和动摇的分子,我們不仅可以而且必須造成一种‘戒严状况’,而我們的整个党章、我們現在已由代表大会批准的整个集中制,正是为了克服許多政治态度模糊的根源而造成的‘戒严状况’。为了对付这种模糊态度,我們正需要有一个特别的、甚至是带有非常性质的法律,而代表大会所采取的步驟給这样的法律和这样的办法打下了牢固

的基础，也就是正确地规定了政治方向。”①

我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这次发言提要中用着重号指出的一句话，是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中（第16頁）故意删掉了的。他不喜欢这句话而且不愿意了解这句话的明显意义，那是毫不奇怪的。

馬尔托夫同志，“吓唬人的字眼”一語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意味着嘲笑，嘲笑那些小題大作的人，嘲笑那些用装腔作势的空話把简单問題复杂化了的人。

唯一能够引起而且确实已經引起馬尔托夫同志“神經過敏”的小小的简单事实就是，馬尔托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机关入选問題遭到了失败。这一简单事实的政治意义在于，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在取得胜利以后就着手巩固自己所爭得的影响，方法就是使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取得多数，建立起組織基础，以便根据党章克服多数派认为是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一切东西②。在这种情况下怀着一种目瞪口呆的恐怖神情說什么“爭取影响的斗争”，抱怨什么“戒严状况”，那只不过是装腔作势的空話，吓唬人的字眼罢了。

馬尔托夫同志不同意这一点嗎？那末我們要請問他，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次党代表大会，是不是一般可以設想出这样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竟会不去努力（1）使自己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461頁。——編者注

② 火星报少数派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态度模糊在代表大会上表现在哪里呢？第一、表现在他们在党章第1条問題上說出的一些机会主义詞句；第二、表现在他們和阿基莫夫同志以及李伯尔同志結成联盟，这种联盟在代表大会后半期成长得很快；第三、表现在他們竟把选举中央机关报負責人員的問題降低到一味表現庸俗观念、專說无聊話以至籠絡人心的地步。在代表大会以后，所有这些可爱的品质表現得更厉害了。

在中央机关內占多数，(2)使这个多数拥有克服动摇性、不坚定性和态度模糊的权力来巩固已經贏得的影响呢？

临到选举的时候，我們代表大会必須解决一个問題：把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內三分之一的票數給党的多数派呢，还是給党的少数派？保留六人小組和通过馬尔托夫同志所提的名单，就是給我們以三分之一的票數，而給馬尔托夫同志方面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选举三人小組为中央机关报委員和通过我們所提的名单，就是給我們以三分之二的票數，而給馬尔托夫同志方面以三分之一的票數。馬尔托夫同志拒絕同我們妥协或向我們让步，并在代表大会上用书面向我們提出挑战，而当他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败时，他就如泣如訴地說起“戒严状况”来了！难道这不是无謂爭吵嗎？难道这不又是知識分子軟弱性的表現嗎？

說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想起考茨基不久以前对于这种知識分子軟弱性所作的精辟的社会心理学的估計。現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往往患同样的毛病，我們向更有經驗的同志們学习正确的診斷和正确的疗法是很有好处的。因此，我們引証考茨基对于某些知識分子所作的估計，只不过是表面上离开本題罢了。

“……現在关于知識分子^①和无产阶级之間的对抗問題又使我們产生了很大兴趣。我的同事們”（考茨基本人是个知識分子、著作家和編輯）“一定会往往由于我承认有这种对抗而表示憤慨。但是这种对抗确实是存在的，企图（这里也像在其他場合一样）用否认事实的办法来掩飾这种对抗，那就未免是很不适当的策略了。这种对抗是表现在阶级上而不是表现在个别人物上的社会对抗。个别資本家以及个别知識分子是可能完全参加无产阶

① 我把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詞譯为知識分子或知識界，因为德文 Literat, Literatentum 一詞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般所謂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的腦力劳动者（即英国人所謂 brain worker）。

級的階級鬥爭的。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分子也就會改變自己的性質。我在以後的敘述中談的主要不是這種至今還是本階級中例外現象的知識分子。在以後的敘述中，如果不特別附帶說明，那我只是把知識分子一詞了解為一般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以資產階級社會為立足點的，是知識分子階級的典型代表。這個階級是同無產階級有某種對抗的。

這種對抗和勞資對抗不同。知識分子不是資本家。雖然他的生活水平是資產階級式的，並且他在沒有變成流民以前不得不維持這種水平，但是同時他又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產品，而且經常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往往受到資本家的剝削和一定程度的社會輕視。所以，知識分子和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是沒有什麼對抗的。但是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却是非無產階級的，因此在情緒上和思想上也就有某種對抗。

無產者在他還是孤零零的個體時是沒有什麼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進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願望，都是從組織中，從他和同志們的有計劃的共同活動中汲取來的。當他成為偉大而強有力的機體的一部分時，他就覺得自己是偉大而強有力的了。在他看來，這個機體就是一切，而單獨的個體同這個機體比較起來是沒有多大作為的。無產者以最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以無名群眾的一分子的資格——毫不計較個人利益，毫不考慮個人榮譽——進行着鬥爭，他在指定的任何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職責，自願地服從那貫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紀律。

知識分子卻完全不是這樣的。他並不是這樣或那樣運用實力來進行鬥爭，而是利用論據來進行鬥爭。他的武器就是他個人的知識，個人的能力，個人的信念。他只有憑靠自己個人的品性，才可以獲得一定的意義。因此，在他看來，發揮本人個性的完全自由是順利進行工作的首要條件。他作為某個整體的從屬部分而服從這個整體是很勉強的，是迫於必要而不是出於本人心意的。他認為紀律只有群眾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於他自己，當然是屬於上等人物之列的……

……尼采的哲學主張迷信超人，在這種超人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保證他自己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認為對任何偉大的社會目的的任何程度的服從都是卑鄙可恥的事情，這個哲學完全是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它使知識分子完全不能參加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除了尼采以外，易卜生也是適合知識分子情緒的知識分子人生觀的出色代表人物。易卜生的醫生斯多克芒（在“人民公敵”戲劇內）並不像許多人所

认为的那样是个社会主义者，而是个典型的知識分子，这种知識分子必然会同无产阶级运动以及一般人民运动发生冲突，如果他企图在这个运动中有所作为的话。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无产阶级运动也和任何民主^①运动一样是以尊重多数同志为基础的。斯多克芒 à la ^②典型的知識分子认为‘紧密结合的多数派’是应当被推翻的怪物。

……李卜克内西是社会主义运动所需要的理想的知識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緒，他虽然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但是他完全没有知識分子所特有的心理特点，他毫无怨言地在普通行列中行进，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們的偉大事业，并鄙視按照易卜生和尼采精神教育出来的知識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抱怨自己的个性受到压抑的那种頹丧的啜泣(weiches Gewinsel)。这里还可以举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風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紀律^③。

馬尔托夫及其同事們只是因为一个旧小組沒有被批准就拒絕担任工作，埋怨人家用戒严状况和非常法来“对付个别团体”，这不过是知識分子一处在少数地位就发出的頹丧的啜泣罢了，当“南方工人社”和“工人事业社”被解散的时候，馬尔托夫对这些个别团体还是不重視的，一旦他的团体被解散时却重視起来了。

馬尔托夫首先在我們党代表大会上^④（尤其是在代表大会以后）喋喋不休地对“紧密结合的多数派”发出的訴苦、非难、暗示、斥責、造謠和誹謗，也不过是知識分子处在少数地位时发出的頹丧的

① 最能表明我們那些馬尔托夫分子把一切組織問題都弄得一塌糊塗的事实，就是他們在轉到阿基莫夫和 不适当的 民主主义方面时，却又埋怨用民主手續选举編輯部成員的办法，即由大家預先擬訂而后在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的办法！先生們，也許这就是你們的原則吧？

② 一类的，之流的。——編者注

③ *Karl Kautsky*: «Franz Mehring», «Neue Zeit», XXII, I, S.101—103, 1903, №4 (考茨基“論弗蘭茨·梅林”，見“新时代”杂志第22年集第1卷第101—103頁，1903年第4期。——編者注)。

④ 見代表大会紀录第337、338、340、352頁以及其他各頁。

斃泣罢了。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緊密結合的多数派举行了自己的非正式會議，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对他们不愉快的事实，这件事就是那些被少数派邀請参加少数派非正式會議的代表竟拒絕出席这种會議，而那些乐意参加这种會議的代表（叶哥罗夫之流、馬霍夫之流、勃魯克尔之流），却又由于少数派同他们在代表大会上作过斗争而不能邀請。

少数派痛心疾首地埋怨人家提出了“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确实，少数派是需要用某种方法来掩盖一件不愉快的事实，这件事就是那些时常跟着反火星派分子跑的机会主义者連同一部分反火星派分子組成了一个緊密結合的少数派，拚命拥护机关方面的小組习气，拥护言論方面的机会主义，拥护党务方面的庸俗观念、知識分子的动摇性和軟弱性。

在下一节我們将要說明，在代表大会快結束时形成“緊密結合的多数派”这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事实的原因何在，以及少数派为什么不顧一切挑战而一味小心翼翼地对多数派形成的原因和經過的問題避而不談。但是，讓我們首先把我們对于代表大会討論情况的分析告一段落吧。

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馬尔托夫同志提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決議案（第 886 頁），我把这个決議案的三个基本特点称为“三着致命棋”。这三个特点就是：（1）按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而不是按照单个候选人来进行表决；（2）在宣讀名单以后，必須再放過面次會議（大概是为了討論）；（3）在沒有絕對多数时，第二次表决就算是最后的表决。这个決議案是考虑得非常周密战略（对于敌人也要說句公道話呀！），这个战略是叶哥罗夫同志所不同意的（第 887 頁），可是如果那 7 个人——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

子——沒有退出代表大會，那末這個戰略是一定會保證馬爾托夫取得完全勝利的。產生這個戰略，是因為火星報少數派方面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直接協定”（而火星報多數派內部則有這種協定），不僅是同崩得以及勃魯克爾，而且同叶哥羅夫以及馬霍夫一伙同志也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直接協定”的。

你們想必記得，馬爾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會上哭哭啼啼地說，似乎“莫須有的機會主義罪名”是以他和崩得訂立直接協定為前提的。我再說一遍，這是馬爾托夫同志因害怕面產生的想法，當時叶哥羅夫同志不同意按名單進行表決（叶哥羅夫同志“還沒有失去自己的原則”，大概就是那些使他在估計民主保證的絕對價值時同哥里德勃拉特打成一片的原則吧），這也就明顯地表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實，他當時甚至同叶哥羅夫也談不上什麼“直接協定”的。但是同叶哥羅夫以及同勃魯克爾的聯盟在當時是可能而且確實有過的，這裡所謂聯盟，就是說每當馬爾托夫分子同我們發生重大衝突時，每當阿基莫夫及其伙伴必須選擇害處較少的辦法時，馬爾托夫分子總是保證能得到叶哥羅夫和勃魯克爾兩個人的支持的。阿基莫夫和李伯爾兩位同志一定會把選舉六人小組為中央機關報編委，以及選舉馬爾托夫所提的中委委員會候選人名單當作害處較少的辦法，當作使“火星報”的目的最難達到的辦法（見阿基莫夫關於黨章第1條的發言以及他對馬爾托夫抱的“希望”），這是絲毫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麼疑問的。按照名單進行表決，放過兩次會議以及重新進行表決，所有這些辦法都是預定不用任何直接協定而又能以幾乎是機械的準確性達到這種結果的。

但是，我們的緊密結合的多數派仍然是緊密結合的多數派，所以馬爾托夫同志的迂迴辦法也就不過是一種拖延手段，我們不能不拒絕這種辦法。少數派曾用書面（在聲明書中，第841頁）埋怨

这一点，按照馬尔丁諾夫和阿基莫夫两个人的先例拒絕参加表决和选举中央委员会，理由是“由于已經有了进行选举的那些条件”。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埋怨选举条件不合常态的話（“戒严状况”第 31 頁）是在党内那些数以百計的搬弄是非的人面前滔滔不断地到处宣揚的。但是，这里有什么不合常态的地方呢？是不是秘密投票制，即事先由代表大会的章程規定出来（章程第 6 条，记录第 11 頁）而不能认为这里面有什么“虛伪”或“不公平”成分的秘密投票制呢？是不是被法儒的知識分子看作“怪物”的那个紧密結合的多数派的形成呢？或者是这班高貴的知識分子想違背他們自己在代表大会面前說的承认大会一切选举（第 380 頁，代表大会章程第 18 条）的諾言的不合常态的願望嗎？

波波夫同志巧妙地暗示了这种願望，他在进行选举的当天的代表大会上直截了当地問道：“既然有半数代表拒絕投票，請問主席团是不是确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有效的和合法的？”^①主席团当然回答說确信这一点，并提醒大家注意同阿基莫夫和馬尔丁諾夫面同志有关的事件。馬尔托夫同志贊成主席团的意見，并且直截了当地說波波夫同志弄錯了，說“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合法的”（第 343 頁）。請讀者自己判断一下，只要把这个在党面前作的声明同在代表大会以后干的事情以及在“戒严状况”中所說的“还在代表大会上就已开始的党内半数的暴动”（第 20 頁）一語对照一下，就会看出究竟是怎样一种正常的政治一貫性。阿基莫夫同志对馬尔托夫同志抱的希望超过了馬尔托夫本人的曇花一現的善良意图。

阿基莫夫同志，“你胜利了”！

^① 見第 342 頁。这是指选举总委员会的第五个委員而言。当时投了 24 張选票（总共有 44 票），其中兩張是空白票。

所謂“戒严状况”这几个字現在已經永远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意义了，至于它是怎样一个“吓唬人的字眼”，这可以从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即进行选举以后发生的表面上很小但是实质上很重要的几件事实来说明。馬尔托夫同志現在逢人便說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戒严状况”，煞有介事地硬要自己和讀者相信，似乎他所臆造的这个稻草人是意味着“多数派”对“少数派”施行过什么不正常的迫害、攻击和欺凌。往下你們就会看見代表大会以后的情况是怎样的。但是，单拿代表大会快结束时的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出，在选举以后，“紧密結合的多数派”不但沒有迫害过这些不幸的、被欺凌的、被侮辱的、被綁上刑場的馬尔托夫分子，反而自动提議（以利亚多夫为代言人）把记录委员会中的三个席位送給他們两个（第 354 頁）。你們看一看关于策略問題以及其他問題的決議（第 355 頁以及往下各頁），就可以看出当时完全切实地討論問題的情况，当时有許多決議案往往是由古怪的紧密結合的“多数派”和“被欺凌被侮辱的”“少数派”联合署名提出来的（记录第 356、357、363、365、367 等頁）。这不是很像“解除工作”以及其他什么“欺凌”嗎？

只有在討論斯塔罗維尔提出的关于自由派的決議案时才发生很有趣的、但可惜太簡短的切实的爭論。这个決議案所以被代表大会通过，按照这个決議案的署名情况来看（第 357 頁和第 358 頁），是因为有三个“多数派”分子（勃拉温、奥尔洛夫、奥西波夫¹³）既投票贊成斯塔罗維尔的決議案，又投票贊成普列汉諾夫的決議案，并不认为两者有什么不可調和的矛盾。初看起来，这两个決議案之間似乎沒有有什么不可調和的矛盾，因为普列汉諾夫的決議案是規定一般的原則，是表示在原則上和策略上对俄国资产

階級自由主義應採取的一定的態度，而斯塔羅維爾的決議案則是企圖規定容許同“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訂立“暫時協定”的具體條件。兩個決議案的主題是不同的。但是，斯塔羅維爾的決議案恰恰犯了政治態度模糊的毛病，是一個瑣碎的決議案。它沒有規定俄國自由主義的階級內容，沒有指出代表這個自由主義的具體的政治派別，沒有向無產階級說明他們對待這些具體派別的基本宣傳鼓動任務，竟把學生運動和“解放社”這兩個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是因為它患有態度模糊的毛病），竟過分瑣碎地詭辯地規定了容許訂立“暫時協定”的三個具體條件。政治態度模糊在這種情況下也如同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一樣，引起了詭辯的態度。沒有總的原則而想列舉“條件”，結果就把這種條件規定得很瑣碎，嚴格說來，甚至是規定錯了。的確，請你們看一看斯塔羅維爾提出的三個條件：（1）“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應當“明顯而肯定地聲明，說他們在同專制政府鬥爭時將堅決站在俄國社會民主黨方面”。自由派和自由民主派的區別在哪裡呢？決議案並沒有提供任何材料回答這個問題。區別不就在於自由派代表資產階級中政治進步性最小的階級的立場，而自由民主派則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中政治進步性最大的階級的立場嗎？如果是這樣，難道斯塔羅維爾同志認為資產階級中進步性最小的（但終究是有進步性的，否則就談不上什麼自由主義）階層“將堅決站在社會民主黨方面”嗎？這是謬論，即使這樣一個派別的代表人物“明顯而肯定地聲明這一點”（這種假定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我們無產階級政黨還是不應該相信他們的聲明。做一個自由主義者和堅決站在社會民主黨方面，這是水火不相容的兩件事情。

其次，我們假定“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真的會明顯而肯定地聲明，說他們在同專制制度鬥爭時將堅決站在社會革命黨人方

面。这种假定是远不如斯塔罗維尔同志所作的假定那样絕對不可思議的(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派別)。如果按照他那个意思模糊和內容瑣碎的決議案來說,在这种情形下是不允許同这类自由派締結暫時協定的。于是从斯塔罗維尔同志的決議案中必然得出的这个結論,就引伸出一个根本不正確的論点。其实,暫時的協定既可以同社会革命党人締結(見代表大会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問題的決議),因而也可以同一旦站到社会革命党人方面的自由派分子締結。

第二个条件,如果这些派別“在自己的綱領中不提出一种同工人階級利益以及一般民主派利益相抵触或者模糊他們的意識的要求”。这里又犯了同样的錯誤,从来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自由民主派在自己的綱領中不提出同工人階級利益相抵触的要求和不模糊他們的(即无產階級的)意識的。甚至我国自由民主派中最民主的派別,即社会革命党人,也像一切自由派一样,在自己的一塌糊塗的綱領中提出了同工人階級利益相抵触并且模糊他們的意識的要求。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的一个結論就是,必須“揭露資產階級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但決不是不許締結暫時的協定。

最后,斯塔罗維尔同志的第三个“条件”(自由民主派应当把普遍、平等、秘密和直接的选举制作为自己的斗争口号),就其一般提法來說,也是不正確的,如果宣布說無論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允許同那些以爭取有資格限制的宪法或一般“殘缺不全的”宪法作为口号的自由民主派締結暫時的局部的協定,那就不合理了。其实,“解放派”先生們这一“派別”可以說就是这样的派別,但是事先禁止同那些甚至是最怯懦的自由派締結“暫時的協定”,因而把自己的手脚束縛住,那就是患了同馬克思主义原則不相容的政治近視病了。

总之，斯塔罗維尔同志提出的而为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签名贊成的決議案，是一个錯誤的決議案，如果第三次代表大会撤銷这个決議案，那就做对了。这个決議，在理論立場和策略立場方面犯了政治态度模糊的毛病，在它所要求的实际“条件”方面犯了詭辯的毛病。它把两个問題混为一談了：（1）要揭露任何一个自由民主派所面有的“反革命和反无产阶级的”特点，必須同这些特点作斗争；（2）面这些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締結暫时的局部的协定的条件。这个決議案并没有做它应当做的事情（分析自由主义的阶级內容），而做了它不必做的事情（預先規定“条件”）。在党代表大会上拟訂这种暫时的协定的具体“条件”，根本就是荒謬的，因为这时連具体的对方，即这种可能的协定对象都还不存在；即便有了这样的“对象”，也不如让党中央机关去决定暫时的协定的“条件”，就像代表大会对待社会革命党人先生的“派别”問題时所做的那样（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決議案中由普列汉諾夫修正过的末尾一段，載于記錄第362頁和第15頁），那要更合理百倍。

至于“少数派”所提的反对普列汉諾夫決議案的異議，馬尔托夫同志的唯一理由是說：普列汉諾夫的決議案“是以必須揭露一个著作家的淺薄的結論作結尾的。这岂不是‘拿斧头去砍蒼蝇’嗎？”（第868頁）。用“淺薄的結論”这一尖刻的字眼作为掩盖思想貧乏的理由，这又是一种典型的夸夸其談。第一、普列汉諾夫的決議案是說要“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的一切表現”。所以，馬尔托夫同志所謂“全部注意力都应当集中在一个司徒卢威，一个自由主义者身上”的論断（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論断，記錄第88頁），純粹是一句廢話。第二、在說到不可以同俄国自由派締結暫时的协定时，把司徒卢威先生比作“蒼

蠅”，就等于为了說尖刻話而忽略一件极明显的政治事实。不，司徒卢威先生不是一只蒼蠅，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所以是一个政治人物，不是因为他本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而是因为他的立場是秘密活动界中唯一代表俄国自由派，即稍微有点活动能力和組織性的自由派的。所以，說到俄国的自由派以及我們党对待他們的态度时，正是要注意到司徒卢威先生，正是要注意到“解放社”，不然就是說空話了。也許馬尔托夫同志想要向我們証明俄国有另一个——哪怕只是一个也好——“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目前能稍微比得上“解放派”？对这样的嘗試研究一下，倒也不是沒有趣味的！^①

柯斯特罗夫同志拥护馬尔托夫同志的意見，他說，“司徒卢威的名字对于工人是毫无意义的”。这未免是（請柯斯特罗夫同志和馬尔托夫同志不要发火吧）阿基莫夫式的理由了。这未免好像是关于无产階級一詞的所有格問題的議論了¹⁴。

① 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反对普列汉諾夫同志的決議案时还提出这样一个理由：“必須反对这个決議案的主要理由，这个決議案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完全忽略了我們的义务是要在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不迴避同自由民主派締結联盟。列宁同志也許要把这种迴避叫作馬尔丁諾夫傾向。在新‘火星报’上，这种傾向已經表現出来了”（第88頁）。

这一小段話就其內容丰富來說，真是一个少見的“精美的杰作”集。（1）所謂同自由派締結联盟，這句話是十分糊塗的观念。馬尔托夫同志，誰也沒有說要締結联盟，而只是說要成立暫时的或局部的协定。这是有很大区别的。（2）如果普列汉諾夫在決議案中忽略了不可思議的“联盟”而只一般說到“支持”，那末这不是該決議案的缺点，而正是它的优点。（3）馬尔托夫同志是不是可以費点力气給我們解釋一下“馬尔丁諾夫傾向”的一般特征呢？他是不是可以給我們講一下这些傾向同机会主义的关系呢？他是不是可以考察一下这些傾向同党章第1条的关系呢？（4）我实在急欲从馬尔托夫同志那里听到“馬尔丁諾夫傾向”在“新”“火星报”上究竟表現在什么地方？馬尔托夫同志，請你赶快說出来免得我等得着急吧！

“司徒卢威的名字”（以及在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決議案中同司徒卢威先生的名字相提并論的“解放社”的名字）对于什么工人才是“毫无意义的”呢？是对那些不太了解或者完全不了解俄国“自由派或自由民主派”为何物的工人。試問，我們的党代表大会应当怎样对待这样的工人呢：是實应党员向这些工人說明俄国唯一确定的自由派呢，还是把某些工人由于自己不大了解政治而不大知道的那个名字隱諱不談？如果柯斯特罗夫同志跟着阿基莫夫同志走了第一步，而不願意再跟着他走第二步，那他一定会根据前一种看法解决这个問題。如果他根据前一种看法解决这个問題，他就会知道，他当时所持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无論如何，普列汉诺夫的決議案中提到的“司徒卢威”和“解放社”字样，要比斯塔罗維尔的決議案中所讲的“自由派和自由民主派”字样更能給工人多好几倍的东西。

現在俄国工人不着“解放”杂志，就不能真正了解我国自由派比較坦率表現出来的政治傾向。合法的自由主义刊物在这里毫无用处，正是因为它的論据模糊。我們应当大力（并在最广大的工人群众面前）运用自己的批評武器反对解放派，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能用真正的批評武器打破解放派先生們必然想削弱革命的民主性质的企图。

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叶哥罗夫同志对于我們“支持”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問題表示“大惑不解”以外，对于決議案的討論并没有提出任何有趣的材料，而且差不多沒有进行过任何討論。

当代表大会結束时，主席簡短地提醒說，代表大会的決議是全体党员都必須执行的。

(十四)代表大会上斗争的一般情况。

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

上面我們已經分析完了代表大會的討論情況和表決情況，現在我們应当作個總結，以便根據代表大會的全部材料回答一個問題：在選舉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暫時成為我們黨內基本劃分的最終的多數派和少數派，是由哪些人、集團和色彩組成的呢？必須把代表大會的記錄所提供的各種色彩在原則上、理論上和策略上的豐富材料拿來作個總結。如果不作總的“概括”，如果不把整個代表大會以及在表決時一切最主要的派別情況作一個全面的觀察，那末這些材料仍然是一些非常零碎片斷的材料，乍看起來，特別是在那些不願意費點氣力從各方面獨立地研究代表大會記錄的人看來（而下過一番工夫的讀者難道是很多麼？），某些個別派別好像是偶然產生的。

在英國國會報告中時常看到一個典型的字眼 division，意思就是“劃分”。人們在談到對於某個問題的表決情況時，就說議院“劃分”成某種多數派和少數派。我們社會民主黨的議院在代表大會上討論各種問題所發生的“劃分”，給我們描繪出一幅独一无二的、十分完備的、準確的、說明黨內鬥爭、黨內各種色彩和集團的圖畫。為了使這幅圖畫一目了然，為了看到一幅真實的圖畫，而不是一堆沒有內在聯系的、零碎片斷的事實和細節，為了結束對於個別表決的許多無謂爭論（誰擁護過誰，誰支持過誰？），我決定用圖表形式表明我們代表大會上所有各類基本的“劃分”。這樣的方法想必有許多的人覺得奇怪，但是我很懷疑可以找到別的什麼真正有綜合性和總結性、敘述得盡量完備而準確的方法。某個代表是投票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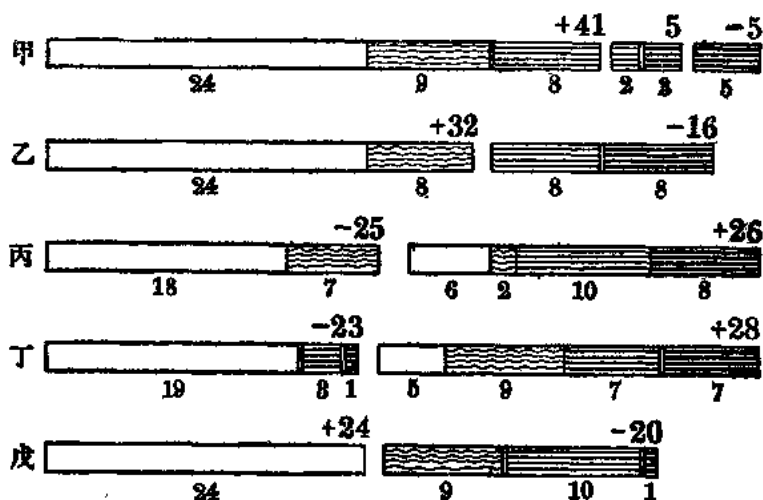
某个提議，还是反对某个提議，都可以根据記名投票結果絕對准确地弄清楚，而关于某些重要的无記名投票，也可以根据記錄作出一个很正确、很接近真实情况的判断。同时，如果对所有記名投票和所有涉及比較重要（例如，按照討論的詳細程度和热烈程度来判断）問題的无記名投票都一一注意到，就可以把我們党内斗争情况作一个在現有材料的情况下可能做到的尽量客观的描写。并且我們不作照相式的描写，換句話說，我們不去单独描写每一个表决，而是設法勾划出一幅图画，即列举所有各类主要的表决，把那些比較次要而只能使問題模糊不清的細微末节撇开不談。无论如何，根据記錄，每个人都能檢查我們图表中的每一种綫条，用任何个别的表决来补充，总之，不只是用判断、怀疑和指出个别偶然事件的方法来批判它，而是用根据同一材料繪出另一幅图画的方法来批判它。

当我们把每一个参加投票的代表列在图表中时，我們便以特别的綫条标出我們在代表大会整个討論过程中詳細考察过的四个基本集团，即：（1）火星报多数派；（2）火星报少数派；（3）“中派”，（4）反火星派。这些集团在原則色彩上的区别，我們已經从许多例子中看到了，如果有人因这些集团的名称太使爱拐弯抹角的人联想到“火星报”組織和“火星报”方針而不喜欢这些名称，那末我們要向他们指出，問題不在于名称。現在，我們已經根据代表大会的一切爭論查明各种色彩，也就容易用估計各个集团色彩的实质的評語来代替那些已經用慣和听慣的党内的别名（使某些人听来刺耳的代号）。这样做了以后，我們就可以看到这四个集团的名称如下：（1）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2）小的机会主义者；（3）中等的机会主义者；（4）大的（按照我們俄国的尺度来讲是大的）机会主义者。但願那些近来公然說火星派分子只是包括一个“小组”而不是表明一种方針的人听到这些名称时不太感到刺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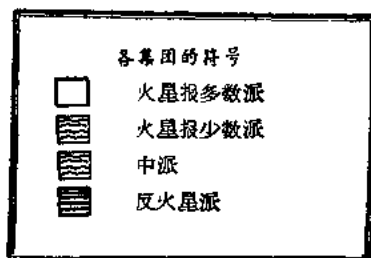
現在我們就詳細說明圖表上（見“代表大會上鬥爭的一般情景”圖表）究竟“拍攝了”哪幾類表決情況。

第一類（甲）表決包括的是，“中派”同火星派一起反對反火星派或其中一部分人。屬於這類表決的有關於整個黨綱的表決（除了阿基莫夫同志一人棄權以外，其餘的人都贊成），關於反對聯邦制的原則的決議的表決（除了五個崩得分子以外，大家都贊成），關於崩得章程第2條問題的表決（反對我們的有五個崩得分子，棄權的

代表大會上鬥爭的一般情景



圖表上附有“+”號和“-”號的數字，是表示對於某個問題投票贊成或反對的總票數。各條條下面的數字，是表示四個集團中每個集團的票數。從甲到戊各類究竟包括哪種表決，將在正文中加以說明。



有五票，即馬尔丁諾夫、阿基莫夫、勃魯克尔以及拥有两票的馬霍夫，其余的人都贊成我們）；这次表决也就是图表甲中所表明的。其次，关于批准“火星报”为党中央机关报問題的三次表决，也属于这一类表决；編輯部（五票）表示棄权，有两票（阿基莫夫和勃魯克尔）在所有三次表决中都投反对票；此外，在表决批准“火星报”的理由时，有五个崩得分子和馬尔丁諾夫同志表示棄权^①。

这一类的表决回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重要問題：代表大会的“中派”在什么时候跟火星派一道行进的呢？或者是在反火星派也跟我們一道行进的时候，这里只有很少的例外情况（通过党綱，不问理由如何而批准“火星报”）；或者是在問題仅限于作一些声明而不必直接采取一定的政治立場的时候（承认“火星报”的組織工作，不一定要个别集团切实地实现“火星报”的組織政策；否决联邦制，还可以在討論联邦制的具体草案問題时表示棄权，例如馬霍夫同志就有过先例）。我們在上面一般談到代表大会上派別划分的意义时，已經看見这个問題在正式“火星报”的正式說明中解釋得很不正确，正式的“火星报”（以馬尔托夫同志为代言人）拿反火星派也同我們一道行进的情况作借口来抹杀和模糊火星派和“中派”之間的区别，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之間的区别！甚至德法两国社会民主党內最“右的”机会主义者，也不会承认整个党綱这样的問題上投反对票。

第二类（乙）表决包括的是，彻底的火星派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共同反对所有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这类表决主要涉及的問題

^① 为什么正是要把关于崩得章程第2条問題的表决在图表上描繪一下呢？因为关于承认“火星报”問題的表决是不很完备的，而关于党綱和联邦制的表决又涉及到不很确定的具体的政治决議。一般說来，从一批同类性質的表决中挑出某一次表决作典型，一点也不改变图圖的基本特点，这是每个人作过相当的变更以后都会知道的。

是，實現“火星報”政策的具體的確定的計劃，要在事實上而不只是在口頭上承認“火星報”。屬於這一類的，有組委會事件^①，把崩得在黨內地位問題提到議事日程第一位討論，解散“南方工人社”，對於土地綱領問題的兩次表決，以及第六，反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國外聯合會（“工人事業社”），即承認同盟為黨在國外唯一組織的表決。在這裡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堅持原則的徹底政策對抗的，是在黨尚未成立以前流行的那種舊的小組習氣，機會主義組織或小集團的利益，以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狹隘理解。火星報少數派在許多場合，在許多極重要的表決（從組委會、“南方工人社”以及“工人事業社”的觀點看來極重要的表決）中……當問題還沒有涉及到他們自己的小組習氣，他們自己的不徹底性時，是跟我們一同行進的。這一類的“劃分”明顯地指出，在實現我們的原則的許多問題上，中派是跟反火星派一同行進的；他們接近反火星派比接近我們的程度大得多；他們在事實上傾向於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比傾向於社會民主黨革命派的程度大得多。那些雖然叫做“火星派”但是以成為火星派為可恥的人，隨時都暴露出自己的真相，而不可避免的鬥爭又引起不少的憤怒，結果使那些考慮最差而感受性最強的人看不見這個鬥爭所暴露出來的各種原則的色彩的意義。但是現在鬥爭的烈火已經稍微減退了，而許多熱烈戰鬥情

① 這次表決正是我們在乙類列出的：火星派當時有 32 票，贊成崩得分子的決議案的有 16 票。我們要指出，在這類表決中沒有一次是記名投票。在很大程度上確切指明代表分布情況的有以下兩種材料：第一、在討論時，火星派中兩個集團的發言人都表示贊成，反火星派和中派的發言人則表示反對；第二、表示“贊成”的票數始終是很接近 33 票的數字。同時不要忘記，在分析代表大會上的討論情況時，我們除了指出表決情況之外，還指出“中派”同反火星派一起（即同機會主義者一起）反對我們的許多場合。屬於這種場合的，有民主要求的絕對價值問題，支持反政府派問題，限制集中制問題等等。

况的客观的摘要又保留在记录上，只有闭着眼睛的人才看不见馬霍夫和叶哥罗夫之流同阿基莫夫和李伯尔之流的联合并不是偶然的，而且也不可能是偶然的。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只好迴避全面而确切地分析记录，或是企图事后用各种惋惜的口吻来改变自己代表大会上的行为。似乎用惋惜的口吻就可以消除观点上的区别和政策上的区别！似乎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现在同阿基莫夫、勃魯克尔以及馬尔丁諾夫結成联盟，就能迫使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恢复起来的我們党忘記火星派在几乎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同反火星派进行的斗争！

代表大会上第三类表决包括的是，图表五部分中的最后三部分（即丙、丁、戊），其特征就是一小部分火星派分子脱离出去而轉到反火星派方面，結果就使反火星派获得胜利（当他們还留在代表大会时）。为了十分确切地考察火星报少数派同反火星派結成的这一有名的联盟（在代表大会上一有人提起这个联盟就使馬尔托夫暴跳起来并上书訴苦）的发展情况，我們把这类記名投票所有三个基本类别都列举出来。丙类是关于使用語言平等問題的表决（这里列举的是对这个问题举行的三次記名投票中最完全的的最后的一次表决）。整个反火星派和整个中派都联成一气拼命反对我們，同时火星派方面又有多数派的一部分人和少数派的一部分人脱离出去。当时还看不出，哪些火星派分子同代表大会上的机会主义“右派”結成了最穩的和牢固的联盟。其次，丁类是对于党章第1条問題的表决（这里举出的是两次表决中最肯定的，即沒有一个人棄权的那次表决）。这个联盟已經表现得更明显和結合得更牢固了①。

① 按照所有材料看来，属于这一类的还有关于党章的四次表决：在第278頁載明，贊成佛敏約有27票，反对我們的有21票；在第279頁載明，贊成馬尔托夫的有26票，贊成我們的有24票；在第280頁載明，反对我的有27票，贊成我

火星报少数派全体都已经站在阿基莫夫和李伯尔方面，火星报多数派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站在他们方面，弥补当时转到我们方面的三个“中派”分子和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只要看一看图表就可以知道，究竟哪些分子是偶然和暂时地时而转到这边，时而又转到那边；哪些分子又是一往直前地同阿基莫夫之流结成牢固的联盟。根据最后一类表决（戊——中央机关报编委、中央委员会以及党总委员会的选举），即表明最后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那次表决，显然可以看出火星报少数派同整个“中派”以及同反火星派残余完全打成一片了。这时8个反火星派分子当中留在代表大会上的已经只有勃鲁克尔同志一人了（当时阿基莫夫同志已经对勃鲁克尔说明了他的错误，于是勃鲁克尔就在马尔托夫分子当中占了应有的地位）。7个极“右派”机会主义者退出大会，决定了选举的命运，使马尔托夫遭到了失败②。

现在我们就根据各类表决的客观材料向代表大会作一个总结。

人们往往说我们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多数派带有“偶然”性质。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就是拿这个理由来

的有22票，在同一页载明，赞成马尔托夫的有24票，赞成我们的有23票。这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对于中央机关补选问题的表决。没有载明记名投票（只举行过一次，但是已经遗失了）。崩得分子（全部或者一部分）显然是在援救马尔托夫。马尔托夫（在同盟中）对这类表决所作的错误的论断，已在上面纠正了。

- ② 退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7个机会主义者，就是5个崩得分子（崩得是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否决了联邦制原则以后退出党的）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即马尔丁诺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这两个人是在代表大会只承认火星派的同盟为党的国外组织以后，即在代表大会把工人事业派的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解散以后退出代表大会的。（这是列宁在1907年版上加的附注。——编者注）

安慰自己的。从图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說多数派是偶然的現象，这只是在一個意义上，并且只是在一個意义上，即在硬說7个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是偶然退出代表大会时，才能这样說。只有认为他們退出大会是个偶然現象（一点也不多），才可以說我們多数派也是个偶然現象。只要看一看图表，就能比閱讀任何长篇大論的文章更清楚地知道，如果这7个人不退出的話，他們会站在哪一边，一定会站在哪一边^①。但是，試問究竟在什么程度內才真正可以认为这7个人的退出是一种偶然現象呢？这就是那些爱說多数派是“偶然”現象的人不願意理会的問題。这就是使他們不愉快的問題。退出代表大会的正是我党右派中的最激烈分子而不是左派中的最激烈分子，难道这是偶然現象嗎？退出代表大会的正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彻底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难道这是偶然現象嗎？这种“偶然”退出，难道不是同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間进行的并且在我們图表中十分明显表現出来的反机会主义派的斗争有某种联系嗎？

只要提出这些对少数派不愉快的問題，就可以看出那些硬說多数派是偶然現象的話里掩藏着什么事实。这就是那件毫无疑问和不容爭辯的事实，即少数派是由我党内最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黨員組成的。少数派是由党内那些在理論上最不坚定，在原則上最不坚持的分子組成的。少数派正是由党的右派組成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划分，是社会民主党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划分为山岳派和吉倫特派¹⁵的直接的必然的繼續，这种划分不只是在昨天，不只是在俄国工人政党内出現的，大概也不是在明天就会消灭的。

这个事实，对于弄清分歧的原因及其变迁的問題有根本的意

^① 我們下面就会看到，在代表大会以后，阿基莫夫同志以及同阿基莫夫同志最有血统关系的沃龙涅什委员会，都是公然对“少数派”表示同情的。

义。誰企图用否认或者模糊代表大会上发生的斗争以及这个斗争表现出来的各种原则色彩的方法来逃避这个事实，誰就完全证明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貧乏的。但是要推翻这个事实，必須证明：第一、我們党代表大会上各次表决和“划分”的一般情况并不像我描写的那样；第二、按照代表大会发生“划分”的一切問題的实质來說，那些在俄国博得火星派称号的最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是錯誤的^①。先生們，請給我們证明这一点吧！

少数派是由党内最带机会主义性质、最不坚定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組成的，这个事实也就回答了那些不熟悉实际情况或者对問題考虑很差的人向多数派提出的那些怀疑和異議。有人对我们說，把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錯誤看成分离的原因，这不是小气嗎？是的，先生們，馬尔托夫同志的錯誤，本来是不大的（还在代表大会激烈进行斗争的时候，我就指出了这一点），可是这个小錯誤可能产生（而且已經产生了）許多恶果，因为那些犯了许多錯誤、在許多問題上表现了机会主义傾向、不坚持原则的代表把馬尔托夫同志拉到自己方面去了。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个同志表現得不坚定，本来是一件属于个人性质的次要的

① 专供馬尔托夫同志参考的附注。如果馬尔托夫同志現在已經忘記火星派分子一語是表示一个方针的拥护者，而不是表示一个小組组员，那末我們劝他根据代表大会的記錄看一看托洛茨基同志对阿基莫夫同志所作的关于这个問題的說明。代表大会上有三个小組（在对党的态度上）——“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編輯部，“火星报”組織——是火星派的小組。这三个小組中有两个小組做得很恰当，它們自行宣告解散了；第三个小組則表現得党性不强，沒有这样做，于是就被代表大会解散了。最广泛的一个火星派的小組，即“火星报”組織（它既包括編輯部又包括“劳动解放社”在內），在代表大会上只有 18 个人，其中只有 11 个人有表决权。那些只在方针上是火星派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火星派“小組”的人，据我計算，在代表大会上有 27 人，一共拥有 33 票。这就是說，火星派中属于火星派小組的不到半数。

事实，但是所有一切最不坚定的分子，所有一切根本不承认“火星报”方针并公然反对这个方针，或者口头上承认而实际上却往往跟反火星派一道走的人，组成了一个很大的少数，这就不是属于个人性质的，而是有全党意义的，决不是次要的事实了。

把“火星报”旧编辑部这样一个小组中充满顽固的小组习气和革命的庸俗观念的事实说成分离的原因，岂不可笑吗？不，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因为起来拥护这种个人小组习气的有我们党内所有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都为拥护任何小组习气而斗争的分子，所有根本不能超出革命的庸俗观念的分子，所有借口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的祸害具有“历史”性而加以辩护和保持的分子。狭隘的小组利益如果只在“火星报”编辑部一个小组中比党性占上风，那也许还可以认为是偶然现象。但是拼命拥护这种小组习气的正是同样（也许是更加）重视有名的沃龙涅什委员会的“历史继承性”以及所谓彼得堡“工人组织”¹⁶的“历史继承性”的阿基莫夫和勃鲁克尔之流同志，正是像哀悼旧编辑部“被杀害”事件那样痛心（也许更加痛心）地哀悼“工人事业社”“被杀害”事件的叶哥罗夫之流同志，正是马霍夫之流同志等等，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常言说得好：“请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那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请你告诉我，谁是你的政治同盟者，谁投票赞成你，那我就能告诉你，你的政治面貌是怎样的。

马尔托夫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小错误，如果它还没有成为他们同我们党内整个机会主义派结成牢固的联盟的出发点，如果它还没有由于这个联盟而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使那些受到“火星报”反对而现在决心拿彻底的革命社会民主派出气并引以为快的人进行报复，那末这仍然是而且可能仍然是一个小错误。但是代表大会以后发生的事件，恰恰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新“火

星报”上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了，阿基莫夫之流和勃魯克尔之流存心进行报复（見沃龙涅什委员会的傳单^①），馬尔丁諾夫之流在幸災乐禍，因为他們終于（終于呵！）得到許可在這可恨的“火星报”上用自已的蹄子踢那可恨的“敌人”，报复过去受的所有一切侮辱了。这特別明显地告訴我們，为了保持“火星报”的“继承性”，是多么需要“恢复‘火星报’旧編輯部”（摘自斯塔罗維尔同志 1903 年 11 月 3 日的最后通牒）……

代表大会（以及党）划分为左派和右派，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事实，本来不仅没有什么可怕，没有什么危險，而且甚至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恰恰相反，俄国（而且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中最近十年来的事实，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这样的划分。至于形成这一划分的根源竟是右派所犯的許多小錯誤，許多次要的（比較來說）意見分歧，那末这个情况（这个使从表面看問題的人和头脑庸俗的人感到惊奇的情况）就表明我們全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前我們因为大問題而发生分离，这些大問題有时甚至可以造成分裂，但是現在我們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已經趋于一致了，現在我們已經只有色彩上的区别，为了这些色彩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爭論，但是，为了这些色彩发生分离，就未免是愚蠢和幼稚的了（正如普列汉諾夫同志在他的值得注意的“不該这么办？”一文中完全公正地指出的那样，这篇文章我們下面还要談到）。現在，当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无政府行为几乎使党陷于分裂状态时，經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聪明人，他們竟說：一般說来，为了組委會事件、“南方工人社”或“工人事业社”的解散、党章第 1 条、旧編輯部的解散等等这一类小事情，是不是值得在代表大会上进行

^① 見本書第 204—205 頁。——編者注

斗争呢？誰这样推論^①，誰就是把小組观点带到党的事业中，因为党内各种色彩之间的斗争，当它还没有导致无政府行为和造成分裂的时候，当它还是在全体同志和全体党员一致承认的范围内进行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而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党的右派，同阿基莫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馬尔丁諾夫和馬尔托夫进行的斗争，是绝对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只要列举两件事就可以确凿地证明这一点：（1）当馬尔丁諾夫同志和阿基莫夫同志声明退出代表大会时，我們大家都决心設法澄清所謂“侮辱”的想法，我們大家通过了（是32票通过的）托洛茨基提出的決議案，这个決議案劝这两位同志对所作的解釋表示滿意而收回他們的声明。（2）当問題談到中央机关的选举时，我們让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或机会主义派）在两个中央机关中占少数席位，让馬尔托夫加入中央机关报，让波波夫加入中央委员会。既然我們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就决定选举两个三人小組，从党的观点来看，我們也就不能有別的做法了。如果说代表大会上暴露出来的色彩上的区别不大，那末我們从这些色彩斗争中作出的实际結論也是不大的，因为这个結論只不过是说两个三人小組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应当让給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

①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我在代表大会上同“中派”某一个代表的談話。他向我訴苦說，“我們的代表大会充滿了多么沉重的气氛呵！这是多么殘酷的斗争，这是怎样在鼓动互相反对，这是多么激烈的論战，这是怎样的非同志态度呵！……”我回答他說，“我們的代表大会是多么好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斗争。各种意見都发表出来。各种色彩都暴露出来。各种集团都显现出来。手举过了。決議通过了。阶段渡过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呢。这才不是无休止的讨厌的知識分子的无謂口角，人們結束这种无謂口角并不是因为他們已經解决了問題，而只是因为他們說得疲倦了……”

这个“中派”同志用疑惑的目光看清我，詫异地聳了聳肩。原来我們用不同的語言講話。

只是由于党代表大会上的少数派不同意成为中央机关中的少数，那些遭到失败的知識分子才起初发出“頹丧的啜泣”，随后又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了。

在作結束时，我們要再一次从中央机关成員問題上看一看图表。当然，除了色彩問題以外，代表們在进行选举时还注意到某某人是不是适当、工作能力强不强等問題。現在少数派很乐意把这两个問題混为一談。至于这两个問題各不相同，那是不言而喻的，只从一件简单事实就可以看出，选举最初的三人小組为中央机关报編委的計劃，还在代表大会以前，即当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同馬尔丁諾夫和阿基莫夫的联盟还是誰都料想不到的时候就已經拟訂好了。对于不同的問題，应当用不相同的方法来回答。对于色彩問題，应当在代表大会的纪录中，在所有一切問題的公开討論和表决情况中去找答案。关于某人是不是适当的問題，大家在代表大会上一致决定用秘密投票来解决。为什么整个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样的决定呢？——这是一个十分淺显的、无须多談的問題。但是，少数派（他們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以后）甚至連淺显的道理也开始忘記了。我們听到过无数热烈的、狂热的、兴奋得几乎发狂的拥护旧編輯部的話，但是談到代表大会上那些同拥护六人小組和拥护三人小組的斗争有关的色彩的話，我們簡直連半句也沒有听到过。我們从各个角落听到什么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人沒有工作能力、不适当、心怀叵測等等流言蜚語，但是我們簡直沒有听到过半句关于代表大会上那些为中央委员会中的优势而斗争的色彩的話。我觉得，在代表大会外面散布关于个人品质和行动的流言蜚語，是不体面的和卑鄙的（因为这种行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只能向全党最高机关揭露的組織秘密）。用这种流言蜚語在代表大会以外进行斗争，我确信，这就是排挤行为。对于这

些流言蜚語，我能給予公眾的唯一回答就是指出代表大會的鬥爭，你們說，中央委員會是由不大的多數派選舉出來的。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不大的多數派是由所有那些最堅持一貫的，不是口頭上而是事實上為實現“火星報”計劃而鬥爭的人組成的。因此，這個多數派的道義威信應該比它的形式威信要高得多，對於那些把“火星報”方針的繼承性看得比“火星報”某個小組的繼承性更重要的人說來，這個道義威信更要高得多。誰能夠更有資格判斷某人是不是適於實行“火星報”的政策呢？是那些在代表大會上實行過這個政策的人呢，還是那些往往反對這個政策而維護一切落后性、一切無用的東西以及一切小組習氣的人？

(十五)在代表大會以後。兩種鬥爭方法

以上我們已經把代表大會上的討論情況和表決情況分析完畢，這種分析已經 *in nuce*（溯本求源地）說明了代表大會以後發生的一切情況，所以對於我們黨內危機的以後各個階段也就可以談得簡短一些了。

馬爾托夫和波波夫拒絕參加選舉，立刻就使黨內各種色彩之間的黨的鬥爭滲進一種無謂爭吵的氣氛。格列博夫同志不相信那些落選的編委冥想轉到阿基莫夫和馬爾丁諾夫方而去，以為問題首先是由於氣憤，所以他在代表大會閉幕以後第二天就向我和普列漢諾夫提議和平了結，在保證編輯部有相當的代表參加總委員會的條件下（即兩個代表中一定有一個代表屬於黨的多數派）把所有四個人都“補選”進去。這個條件在普列漢諾夫和我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如果他們同意這個條件，就等於說他們默認自己在代表大會上犯了錯誤，就等於說他們願意和平而不願意戰爭，願意同

我和普列汉諾夫接近，而不去同阿基莫夫和馬尔丁諾夫接近，不去同叶哥罗夫和馬霍夫接近。于是，“补选”方面的让步就带有个人的性质，而在个人問題上让步，以平息怒火和恢复和平，是我們不應該拒絕的。因此我和普列汉諾夫就表示同意了。但是編輯部的多数拒絕这个条件。格列博夫也就离开了。于是我們就观察后果：或者是馬尔托夫坚持他在代表大会上（在反对中派代表波波夫同志时）表示过的忠誠立場，或者是他所追隨的那些不坚定的、傾向分裂的分子占上風。

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是馬尔托夫同志想把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联盟”当作个别的政治事实（正像倍倍尔在1895年同福尔馬尔的联盟是个別事实一样——*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①），或者是他想把这个联盟巩固起来，竭力証明我和普列汉諾夫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錯誤，因而成为我們党内机会主义派的真正首領。換句話說，有两种可能的办法：或者是无謂爭吵，或者是进行政治上的党的斗争？我們三个人中間（在代表大会閉幕以后第二天，中央机关只有我們三个人），格列博夫最傾向于前一种解决办法，并且尽一切力量給吵了架的儿童調解。最傾向于后一个解决办法的是普列汉諾夫同志，他的态度十分坚决。我这一次采取了“中派”或“泥潭派”立場，并试图采取說服方法。現在如果企图把口头上的說服重述一遍，那就等于干一件糊塗透頂的事情，所以我也就不去重蹈馬尔托夫和普列汉諾夫两位同志的复轍。但是我认为有必要从我給一位火星报“少数派”分子写的一个书面劝告中引証几段話：

……馬尔托夫拒絕加入編輯部，他和党内的其他著作家拒絕参加报社工作，有一批人拒絕替中央委员会工作而宣傳抵制或消极反抗的思想，所有

① 如果可以把小事同大事相比較的話。——編者注

这一切都必然——甚至違反馬尔托夫和他的朋友們的意旨——会造成党内分裂。即便馬尔托夫会坚持忠誠的立場(他在代表大会上十分坚决表示的立場)，其他人也是坚持不住的，——因此我所指出的那个結局将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們心自問：究竟我們为什么要发生分裂呢？我再三分析代表大会上的一切事件和印象，我意識到我常常在十分气急的时候行动‘瘋狂’，我願意向任何人承认自己的这个过錯，如果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感、责备和斗争 etc. 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作过錯的話。但是，現在當我們一点也不瘋狂地观察已經达到的結果，观察用瘋狂的斗争办法实现的东西时，我根本不能不认为在这些結果中沒有一点，簡直沒有一点对党有害的东西，絕對沒有一点对少数派侮辱或凌辱的东西。

当然，处在少数地位本身也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难堪，但是我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我們‘玷污过’某人，以为我們想侮辱或者欺辱某人的看法。絕對沒有这么回事。决不应该把政治上的分歧变成給对方加上所谓居心不良、行为卑鄙、傾軋以及在日益到来的分裂气氛中非常流行的动听的罪名來說明事件。决不应该这样做，因为这至少是 *nec plus ultra*① 不合理的。

我在政治上(以及在組織上)同馬尔托夫发生分歧，正像我同他发生过几十次分歧一样。既然我在党章第 1 条問題上遭到失敗，就不能不极力設法利用我(以及代表大会)所剩下的机会来进行报复。一方面，我不能不設法成立严密的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設法选出三人編委会……我认为只有这个三人小組才能成为負責的机关而不会变成以小圈子作風和怠慢习气为基础的团体，才能成为唯一真正的中央机关，其中每个人可以随时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党性观点，絲毫不掺杂其他成分，*irrespective*②任何个人意气，任何侮辱、退出等想法。

在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件以后，这个三人小組一定能使在一个方面反对馬尔托夫的政治路綫和組織路綫合法化。这是毫无疑問的。但是因此要撕裂党嗎？因此要破坏党嗎？难道在示威問題上，馬尔托夫和普列汉諾夫不是反对过我嗎？难道在党綱問題上，我和馬尔托夫不是反对过普列汉諾夫嗎？难道任何三人小組不总是以自己的一方反对每一个参加者嗎？既然火星报

① 极端。——編者注

② 不管。——編者注

多数派无论在‘火星报’組織内或者在代表大会上都认为馬尔托夫的路綫这一特别色彩在組織方面和政治方面是錯誤的，可是企图用什么‘陷害’和‘攻击’等字眼来解释这一点，难道不就是愚蠢的行为嗎？难道用‘恶棍’字眼辱骂这个多数派堵塞这件事，不就是愚蠢的行为嗎？

我再說一遍，我也同代表大会上的火星报多数派一样，深信馬尔托夫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綫，认为必須把他糾正一下。因为受到糾正而生气，由此作出結論說受了侮辱等等，那就不合理了。我們过去沒有‘玷污过’任何人，而且現在也不想‘玷污’任何人，不想排除任何人参加工作的机会。由于被排斥出中央机关而掀起分裂，这在我說来是一种不可思議的愚蠢行为。”^①

我认为現在必須把我这个书面声明重說一遍，因为这个声明确切地指出多数派极力想一下子分清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由于攻击的激烈性和“瘋狂性”等可能产生的（在激烈斗争中也是必然产生的）个人怒火和个人气愤；另一件事情則是一定的政治錯誤，政治路綫（即同右派的联盟）。

从这些声明中可以看出，少数派的消极反抗在代表大会閉幕以后立刻就开始了，因此我們馬上警告說：这是一个使党走向分裂的步驟；这是根本同 在代表大会上表示忠誠的声明相矛盾的；这只是由于被排除出中央机关（就是說由于落选）而进行分裂，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沒想过要排斥任何一个党员参加工作的机会；我們之間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究竟是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綫錯誤，还是我們在代表大会上的路綫錯誤这个問題还没有弄清楚，还没有解决）已經日益变成夹杂着謾罵、猜疑等成分的无謂爭吵了。

^① 这封信（1903年8月31日〔9月13日〕給波特列索夫的信。——編者注）早在9月間（新历）就写好了。这里刪掉了我认为与問題无关的一些話。如果致信人认为刪掉的話正是十分重要的，他可以很容易地把刪掉的地方补上去。順便說一下。我要趁此机会讲清楚，我允許我所有的論敌公布我所有的私人信件，只要他們认为这样做对事业有好处就可以了。

但是警告並沒有起作用。少数派的行为表明，最不坚定和最不重視党的分子在他們中間占了上風。于是我和普列汉諾夫只好收回我們对于格列博夫的建議所表示的同意：既然少数派用自己的行动証明他們不仅在原則方面而且在起碼的黨員忠誠态度方面也是政治上不坚定的，那末所謂“继承性”的話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当时普列汉諾夫比誰都更巧妙地嘲笑那种要求人家把大多数公开說自己有新的和日益增加的分歧意見的人“补选”到党編輯部中去的荒謬現象！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怪事，当新的分歧还没有在刊物上向全党讲清楚以前，中央机关的党的多数派竟会自动把自己变成少数呢？让人们先把分歧談出来吧，让党去討論这些分歧的深度和意义吧，让党自己糾正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犯的錯誤吧，如果它确实犯了什么錯誤的話！为了一些尚未說明的分歧就提出这种要求，这已經表明提出要求的人是十分不坚定的，表明他是想用无謂爭吵来完全压倒政治分歧，表明他既根本不尊重整个党，又根本不尊重本人的信念。世界上还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种原則性坚定的人，他們在自己打算說服的机关里取得（用非正式手續取得）多数以前，竟然拒絕进行說服。

最后，10月4日，普列汉諾夫同志宣称他要最后试图結束这种荒謬現象。召集旧編輯部所有六个委員在一起开会，有一个新中央委員也曾經列席會議^①。普列汉諾夫同志費了足足三个钟头証明，那种想从“少数派”中“补选”四个人而跟“多数派”的两个人作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他提議补选两个人，以便一方面排除那种担心我們想“欺凌”、压制、圍困、杀戮、埋葬什么人的顾虑，另一方面則保障党的“多数派”的权利和障地。补选两个人的提議也被

^① 除此以外，这个中央委員¹⁷專門同少数派举行过几次个别談話和集体談話，嚴斥过荒謬的謠言，并揭发他們不要忘記黨員的職責。

否決了。

10月6日，我和普列漢諾夫給“火星報”全體舊編委以及同事托洛茨基同志寫了一封正式信，內容如下：

“敬愛的同志們：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不得對你們拒絕參加‘火星報’和‘曙光’雜誌的工作一事正式表示惋惜。雖然我們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剛一閉幕立刻就邀請你們，之後又多次邀請你們參加工作，可是我們始終沒有從你們那裡收到任何一篇作品。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聲明，它認為你們拒絕參加工作絲毫不是編輯部方面引起的。任何一種個人意氣，當然都不應該成為你們參加黨中央機關報工作的障礙。如果你們拒絕參加工作是由于你們和我們之間有某種意見分歧，那我們認為詳細說明這種意見分歧對於黨是非常有好處的。不但如此，我們認為最好是儘快地在我們編輯的刊物上向全党講清楚這些意見分歧的性質和深度。”^①

讀者可以看出，我們當時還不了解，“少數派”的行為究竟是出於他們意氣用事，還是出於他們願意給機關報（以及黨）以新的方針，這新方針究竟是怎樣的，內容又是如何。我想，現在即使指定70個說明員根據無論什麼刊物和無論什麼証詞來闡明這個問題，那他們也是永遠弄不清這筆糊塗賬的。無謂爭吵的結子恐怕是沒有解開的日子；要么把它斬斷，要么就把它擺脫^②。

接到我們10月6日的信以後，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托洛茨基以及柯里佐夫給我們回了一個不到三行字的答復，說自從“火星報”轉入新編輯部手裏的時候起，他們根本不參加“火星報”的任何工作了。馬爾托夫同志比較願意說話，于是就賞

① 在給馬爾托夫同志的信中，還補充一段關於一本小冊子問題的話以及如下話語：“最後，為了事業的利益，我們再一次通知您，我們現在還準備補選您為中央機關報的編委，以便您有充分可能在黨的最高機關正式申述自己的一切觀點並進行辯護。”

② 普列漢諾夫同志大概會在這裡補充說，要么就滿足那些製造無謂爭吵的人的一切希望。下面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這是做不到的。

賜了我們這樣的回信：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收。敬愛的同志們：為了回答你們10月6日的來信，我特聲明如下，我認為用不着再來協商我們在一個機關報共同工作的問題了，因為你們在10月4日由一個中央委員參加的會議上已拒絕回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即為什麼你們收回了你們要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斯塔羅維爾以及我在我們担保選舉列寧同志為總委員會的‘代表’的條件下加入編輯部的建議。既然你們在這次會議上再三拒絕說明你們自己當着見證人所發表的聲明，那我也並不認為需要在給你們的信里說明在目前情況下我拒絕參加‘火星報’工作的理由。如果必要的話，我將向全黨詳細說出我對於這一點的意見；黨已經可以從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記錄中看出，為什麼我拒絕了你們現在又提出來的要我在編輯部和總委員會里占一個席位的建議……①

爾·馬爾托夫”

這封信以及上述幾個文件不容反駁地說明，馬爾托夫同志在他的“戒嚴狀況”中竭力（用感嘆號和刪節號）迴避關於抵制、搗亂、無政府狀態、製造分裂的問題，即關於用忠誠的鬥爭手段和不忠誠的鬥爭手段的問題。

人們向馬爾托夫同志等等提議，要他們說明他們的意見分歧，請他們直爽地說出問題的底細以及他們的意圖，勸他們不要再鬧脾氣而要平心靜氣地分析他們在黨章第1條上犯的錯誤（這個錯誤是同他們轉向右方的錯誤有密不可分聯系的），——但是馬爾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們公然拒絕交談，却叫喊說：我被圍困了，我受欺凌了！人們對於這些“吓唬人的字眼”的嘲笑，並沒有使這些可笑的怒氣平息下去。

怎麼能圍困一個拒絕共同工作的人呢？——我們這樣質問馬爾托夫同志。當少數派拒絕处在少數地位時，怎麼能侮辱、“欺

① 下面一段話是馬爾托夫對當時翻印他那本小冊子問題的回答，這裡從略了。

凌”和压迫他們呢？要知道，任何一种少数地位，都一定和必然对处在少数地位的人有某些不利的地方。这种不利的地方，要么就是必須加入在某些問題上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則的委员会，要么就是必須站在委员会之外攻击委员会，因而也就要受到从坚固的炮台中射出来的炮火的攻击。

馬尔托夫同志叫喊什么“戒严状况”，是不是想說人們用不公平不忠誠的手段反对他們这些处在少数地位的人或者統治他們呢？只有这样的論点（在馬尔托夫心目中）也許有半点合理的影子，因为——我再說一遍——少数地位是一定和必然有某些不利的地方的。但是可笑的是，当馬尔托夫同志还拒絕交談时，无论怎样也是不能同他进行斗争的！当少数派还拒絕处在少数地位时，无论如何也是不能統治他們的！

当我和普列汉諾夫两人在編輯部工作时，馬尔托夫同志找不出一件事實可以証明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有越权或者濫用权力的地方。少数派的实际工作者也找不出一件事實可以証明中央委员会有越权或者濫用权力的地方。不管馬尔托夫同志現在在他的“戒严状况”一文里如何支吾搪塞，但是始終有一个完全不容反駁的事實就是：在所謂戒严状况的叫喊声中，除了“頹喪的啜泣”以外，是沒有任何东西的。

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們根本沒有正当的理由反对代表大会所任命的編輯部，这最好是用他們自己所說的“我們不是农奴！”（“戒严状况”第 34 頁）一語來說明。这就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資产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他們把自己看成高于群众組織和群众紀律的“上等人物”。用“我們不是农奴”作为說明拒絕在党内工作的理由，就等于彻底暴露了自己，就等于承认自己完全沒有理由，完全不能論証，完全沒有什麼引起不滿的正当原因。我和普列汉諾

夫两个人声明，我們认为他們拒絕工作完全不是由我們这方面引起的，我們請他們說出自己的分歧意見，可是他們回答說：“我們不是农奴”（并补充說：我們关于补选問題的生意還沒談好）。

那些在爭論党章第 1 条时就已經暴露了自己傾向于机会主义推論和无政府主义空談的知識分子个人主义者，总觉得任何一种无产階級組織和紀律，都好像是农奴制。讀者們很快就会知道，新的党代表大会，在这些“黨員”和党的“負責人”看来，也会是“上等人物”忍受不了和觉得可怕的农奴制机关……这个“机关”对于那些喜欢利用黨員招牌但是又覺得这个招牌不符合党的利益和党的意志的人看来，确实是可怕的。

我在給新“火星报”編輯部的信里列举的并由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里刊印出来的那些委员会的決議，在事实上証明少数派的行为是一貫違反代表大会的決議的，是一貫被坏积极的实际工作的。由机会主义者和仇恨“火星报”的人組成的少数派割裂了党，損害并破坏了工作，因为他們想給自己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失敗这件事出口气，并感到用正派的忠誠的手段（在刊物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說明問題）他們永远不能駁倒人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責备他們是机会主义者和不坚定的知識分子的罪名。他們意識到自己沒有力量說服党，于是就用破坏党和妨碍任何工作的手段来要挾。人家責备他們，是說他們（因在代表大会上犯了錯誤）把我們的器皿砸了一个縫，而他們針對着这种責备却拼命設法把已經损坏的器皿完全打破。

概念混淆到极点了，甚至把抵制和拒絕工作都說成“正派的”^①斗争“手段”。馬尔托夫同志現在竭力迴避这个为難的問題。

① 矿区委员会的決議（“戒严状况”第 38 頁）。

馬尔托夫同志竟这么“有原則性”，以至当抵制手段由少数派使用时，……他就拥护抵制手段，而当抵制手段威胁到处于多数地位的馬尔托夫本人时，他就斥責抵制手段了！

我认为，究竟这是无謂爭吵还是对于社会民主工党内正派的斗争手段的“原則的意見分歧”的問題，可以不必分析了。

在两次企图（10月4日和6日）要求那些掀起“补选”糾紛的同志說明理由都失败了以后，中央机关只好看一看那些口头上答应应用忠誠手段进行斗争的同志在事实上将是怎样的态度。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給同盟发了一个通告（見同盟記錄第3—5頁），声称中央委员会正在拟訂章程并邀請同盟會員来协助。同盟领导机关当时否决了（以两票对一票，見同盟記錄第20頁）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的建議。少数派对这个通告所作的答复立刻就表明，所謂忠誠和承认代表大会的決議只不过是空話罢了，其实，少数派是立意絕對不服从党中央机关的，却以十足的詭辯和无政府主义詞藻的敷衍話来回答中央机关关于共同工作的号召。我和普列汉諾夫以及其他多数派分子在收到领导机关成員捷依奇的所謂公开信时（第10頁），立即坚决表示“抗議同盟的負責人用粗暴的違反党紀的手段阻碍党机关的組織活动和号召其他同志也違反紀律和章程的行为。所謂‘我认为自己沒有权利响应中央委员会号召参加这项工作’，所謂‘同志們！我們無論如何不应当让它（中央委员会）給同盟制定新章程’等話，是一种鼓动手法，这只能引起每一个稍微懂得什么是党、什么是組織、什么是党紀的人的气憤。这种手法令人十分气憤，是因为他們用这种手法来对付剛剛成立的党机关，他們无疑是企图在党员同志中間破坏对这个党机关的信任，而且这是在同盟领导机关成員的名义下背着中央委员会使用

的手法。”(第 17 頁)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代表大会当然只能成为一幕滑稽剧。

馬尔托夫同志从一开始就繼續使用他在代表大会上使用过的“籠絡人心”的策略，不过这一次他是針對着普列汉諾夫同志，用的方法是歪曲私人談話的內容。当普列汉諾夫同志提出抗議，馬尔托夫同志只得收回(同盟記錄第 89 頁和第 134 頁)他那种輕率的或者充滿火气的非难。

輪到做报告的时候了。代表同盟参加党代表大会的是我。讀者只要把我的报告提綱(第 48 頁及以下各頁)^①拿来参照一下，就知道我当时已經大致分析了代表大会上的历次表决情况，而本书內容就是对这种分析加以發揮。报告的全部重心就是要証明馬尔托夫及其伙伴怎样由于犯了錯誤而成为我們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的事实。虽然这个报告是在大多数最怀恨在心的論敌面前做的，他們也不能从这个报告中发现一点点不符合党内斗争和辯論的忠誠方法的成分。

相反地，馬尔托夫的报告，除了对我的叙述作了部分的局部的“修正”以外(这些修正的不正确性，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了)，却是……一种神經失常的产物。

怪不得多数派拒絕在这样的气氛下进行斗争。普列汉諾夫同志对“发脾气”(第 68 頁)——这确实真正是“发脾气”！——提出抗議，而时表示不願意申述他已經准备好了的对于該报告实质的反駁，接着就退出了代表大会。其余的多数派分子，也差不多都对馬尔托夫同志那种“无理行为”提出了书面抗議(同盟記錄第 76 頁)，接着也退出了代表大会。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56—67頁。——編者注

少数派的斗争方法大家已经都看得十分明白了。我们责备少数派，是说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犯了政治错误，是说他们转向机会主义方面，是说他们和崩得分子、阿基莫夫之流、勃鲁克尔之流、叶哥罗夫之流以及马霍夫之流结成联盟。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失败，现在“制定了”两种斗争方法，其中包括多种多样的个别袭击、攻击和进攻等形式。

第一种方法就是破坏全部党的工作，败坏事业，力图阻挠一切而“不说明理由”。

第二种方法就是“发脾气”等等^①。

这个“第二种斗争方法”在同盟的所谓“原则的”决议中也有所表现，“多数派”当然没有参加对于这些决议的讨论。让我们仔细看一看马尔托夫同志现在在他的“戒严状况”里转载的这些决议案吧。

第一个决议案是由托洛茨基、佛敏、捷依奇等同志署名的，其中包含专为反对党代表大会的“多数派”而提出的两个论点：（1）“同盟深表惋惜的是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一些实际上同‘火星报’原先的政策背道而驰的倾向，以至在制定党章时没有充分注意到造成一种足以维护中央委员会独立性和威信之充分保障。”（同盟记录第88页）

这个“原则的”论点，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一样，是属于阿基莫夫式的空话，这些话的机会主义性质连波波夫同志也在党代表

^① 我已经指出，把国外生活和流放生活的气氛中经常见到的无谓争吵的最卑鄙的表现形式，都归结为卑鄙的动机，这是愚蠢的。这是在一一定的不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在一定的神经失常等情况下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一种毛病。我只得在这里把这种斗争方式的实质重提一下，因为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里完全重复了这种斗争方式。

大会上揭露过了！其实，那些硬說“多数派”不想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威信的断語，始終不过是誹謗罢了。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当我和普列汉諾夫两个人在編輯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內并没有什么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而当馬尔托夫分子加入編輯部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內却果然造成了中央机关报对于中央委员会的优势！当我們两个人在編輯部工作的时候，在总委员会內是俄国实际工作者多于国外著作家；而当馬尔托夫分子加入編輯部的时候，情况却相反了。当我們两个人在編輯部工作的时候，总委员会一次也沒有企图干涉任何一个实际工作問題；自从按一致意見实行补选的时候起，就开始进行这种干涉了。这一点讀者們在很短時間內就会詳細知道的。

該決議案的另一个論点說：“……代表大会在成立党的正式中央机关时，忽略了同事实上已經形成的中央机关的继承性的联系……”

这个論点完全归結为中央机关人选問題。“少数派”宁願迴避旧中央机关在代表大会上已經証明自己不中用并且犯了許多錯誤的事实。但是最可笑的是竟在組委会問題上引用“继承性”。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在代表大会上任何人也沒有提到批准組委会的全体委員。馬尔托夫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气得发狂地嚷道，包括三个組委会委員在內的名单使他感到可耻。“少数派”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最后名单中包括一个組委会委員（波波夫，格列博夫或佛敏，托洛茨基），而“多数派”提出的并使它通过了的名单，在三个人中則有两个組委会委員（特拉文斯基、瓦西里也夫和格列博夫）。試問，难道用“继承性”作借口就可以叫作“原則性的意見分歧”嗎？

我們現在来談另一个決議案，即由旧編輯部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首的四个委員署名的決議案。这里我們看到所有給“多数

派”加上的后来又在报刊上一再提起的主要罪名。这些罪名最好按照編輯小組組員們的說法来考察。这种罪名针对的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治党方式”，是跟“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集中制”不同的“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它“所重視的不是內部的統一，而是用純粹机械手段，用一貫压制个人首創性和社会主动性的办法实现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所以，这个集中制“根本不能有机地把社会的成員統一起来”。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在这里說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大概，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自己也不大明白，他是在写地方自治派申請实行符合願望的行政改革的呈文呢，还是在那里发泄“少数派”的怨言。心怀不滿的“編委”所叫喊的党内“专制”究竟指什么呢？所謂专制，就是一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不受監督的、不負責任的、不經過选举的权力。从“少数派”的报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們认为这个专制君主就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当該決議案起草和通过的时候，我是同普列汉諾夫一起在中央机关报工作的。因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們就是认为普列汉諾夫以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員都不是按照他們自己对于事业利益的观点，而是按照专制君主列宁的意志来“統治党”的。既然實難說什么专制的統治，那就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其余一切參加統治的人——除了专制君主一人以外——都只不过是別人的御用工具，唯命是听的小卒，执行別人意志的差役罢了。我們要再三問明：难道这就是最值得尊敬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所謂“原則性的意見分歧”嗎？

其次，我們的“黨員”，即这些剛剛从党代表大会（他們曾冠冕堂皇地承认代表大会的決議是合法的）回来的“黨員”在这里所說的，究竟是怎樣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致呢？他們是不是知道在一

个根据比較牢固的原則組織起来的党内，除了党代表大会以外，还有什么另外可以达到一致的方法嗎？如果說知道，为什么他們不勇敢地爽直地說他們已經不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代表大会了呢？为什么他們不試来向我們說出自己的新意見和在似乎有組織的似乎是个党的內部达到一致的新方法呢？

再其次，我們的知識分子个人主义者在这里說的是怎样的“压制个人首創性”呢？他們剛剛在此以前还被党中央机关报規劝說出他們的意見分歧，但是他們非但不发表意見反而談起“补选”生意了。一般說来，我和普列汉諾夫或者中央委员会怎么能把根本拒絕同我們进行任何共同“活动”的人的首創性和主动性压制下去呢！在被压制者拒絕参加的机关或者委员会里，怎么能“压制”什么人呢？落选的編委既然拒絕“做被統治者”，那末他們又怎能埋怨“統治制度”呢？我們根本不可能在領導我們这些同志方面犯什么錯誤，因为这些同志根本就沒有在我們领导下做过什么工作。

看来很明显，高喊所謂官僚主义，不过是要掩盖他們对于中央机关人选的不滿，不过是要掩盖他們違背自己在代表大会上冠冕堂皇地說过的那种諾言的丑恶行为。你是官僚主义者，因为你是代表大会不按照我的意志而違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义者，因为你是根据代表大会的形式上的決議，而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极端机械，因为你凭借党代表大会的“机械的”多数，而不考慮到我想得到补选席位的願望；你是专制君主，因为你不願意把权柄交給旧时的亲热伙伴。代表大会愈是直接斥責他們那种小組习气，就愈使他們感到不愉快，因而他們愈加努力坚持他們那种小組习气的“继承性”。

除了上面說的以外，这些关于官僚主义的叫喊中沒有而且也

不会有什么 实在的 内容^①。这样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再一次证明少数派的知識分子不坚定性罢了。少数派想使党信服，似乎中央机关人員选举得不恰当。是用什么方法使党信服呢？是用批評我和普列汉諾夫所編輯的“火星报”的方法嗎？不是的，这是他們沒有力量干的。他們想用一部分黨員拒絕在他們所仇視的中央机关领导下工作的手段来使党信服。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内的任何一个中央机关，都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对那些不願意服从领导的人进行领导。拒絕服从中央机关的领导，就等于拒絕留在党内，就等于破坏党，——这不是說服办法，而是破坏办法。用破坏方法来代替說服方法，这就表明自己沒有坚定的原則性，也就是表明对自己的思想沒有信念。

人們在大談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一詞在俄語中可以理解为地位观念。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升官思想，就是特別注意地位而忽視工作，爭吵补选席位而不进行思想斗争。这种官僚主义确实根本不是党所希望的，并且是对党有害的，于是我平心靜气地請讀者自己来判断，現在我們党内斗争的双方究竟哪一方犯了这种官僚主义毛病…… 人們在說什么粗暴的机械的統一方法。粗暴的机械的方法当然是有害的，但是我又要請讀者自己来判断，如果新方針和旧方針斗争时，在尚未使党信服新观点的正确以前，在尚未向党說明这些观点以前，硬要把自己的人送进党机关中去，这难道不是最粗暴、最机械的斗争方法嗎？

但是也許少数領受用的字眼有某些原則的意义，表現出一种与細小的局部的理由(这个理由在当时情况下显然成了“转变”的起点)无关的特殊思想吧。如果撇开因“补选”引起的吵鬧不談，也

^① 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就是说，普列汉諾夫同志在实行了有效的补选以后，就不再被少数派看作“官僚主义集中制”的拥护者了。

許这些字眼終究反映另一种观点体系吧？

我們就从这一方面来观察問題。这里我們首先要指出，在同盟中最初着手作这种观察的是普列汉諾夫同志，他指出了少数派轉向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事实，而馬尔托夫同志（他現在最感到气憤的是，并不是大家都願意承认他的立場是原則的^①立場）在他的“戒严状况”里宁願完全迴避这一事件。

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掀起的一个一般性的問題是：同盟或者某一委员会为自己制定的章程不經過中央委员会批准，或者違反中央委员会意見，是不是有效呢？看来，問題再明显不过了：章程是組織性的正式表現，而組織每一委员会的权利按照我們党章第6条規定應該无条件地屬於中央委员会；章程要求确定各委员会的自治范围，在确定这些范围方面有决定权的是党的中央机关，而不是党的地方机关。这是一个基本道理，而那些說什么“組織”并不常常以“批准章程”为前提的深奥的論断純粹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同盟自己也曾表示想要成为一个根据正式章程組成的团体）。但是馬尔托夫同志甚至忘記了（也許是暂时忘記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道理。按照他的意見，要求批准章程，只是表明“以前的革命的火星派的集中制已經由官僚主义的集中制所代替”（同盟記錄第

① 新“火星报”由于列宁似乎不願看到原則性的意見分歧或者否认这些分歧而感到气憤，是再可笑不过的了。如果你們比較有原則地对待問題，那你們就会比較快地考察我再三指出你們轉向机会主义去的声明。如果你們的立場比較有原則，那你們就不会这样厉害地把思想斗争降低为地位观念。既然你們自己竭力妨碍别人把你們当作有原則性的人看待，那末就請你們埋怨自己吧。例如，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况”里說到同盟代表大会时，隱諱了他和普列汉諾夫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爭論，但是又喋喋不休地說列宁是高于中央的人，說列宁閃一閃目光就能使中央下一道命令，說中央委员会是以得胜的姿態冲进同盟的等等。我决不怀疑，馬尔托夫同志这样詮釋主題正是証明他有自己的深刻的思想性和原則性。

95 頁)，同時馬爾托夫同志在同一篇演說里又說，他認為這正是問題的“原則的方面”（第 96 頁），而他在他的“戒嚴狀況”里卻寧願迴避這個“原則的方面”！

普列漢諾夫同志立刻就回答馬爾托夫，請他不要使用如官僚主義、昏聩剛愎等等這類“有失代表大會尊嚴”的字眼（見第 96 頁）。於是他就同馬爾托夫同志辯論起來，因為馬爾托夫同志認為這些字眼是“對於一定方針的原則的表述”。當時普列漢諾夫同志也同所有的多數派分子一樣，會根據這些字眼的具體意思來加以考察，清楚地了解這些字眼沒有什麼原則的意思，而只有所謂“補選的”意思。雖然如此，但是他還是對馬爾托夫之流和捷依奇之流那種頑強態度做了讓步（第 96—97 頁），願意對他們那些似乎是原則的觀點作原則的考察。他說，“如果真是這樣（就是說，如果各委員會在建立其組織方面、在制定其章程方面是自治的），那它們就會是在對整體的關係上，對黨的關係上實行自治了。這已經不只是崩得派的觀點，而簡直是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了。其實，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個人的權利是無限的，認為他們可能彼此發生衝突，認為每個個人都可以自行確定自身的權利範圍。自治的範圍不應當由該集團自己確定，而應當由它作為其一部分的那個整體來確定。崩得就是違反這個原則的明顯的例證。可見，自治的範圍是要由代表大會或者由代表大會所成立的最高機關來確定的。中央機關的權力應當以道義的和理性的威信為基礎。這一點我當然是同意的。組織中的每一分子，都應當關心使機關有道義的威信。但是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既然需要威信，那就不需要權力了……把思想的威信和權力的威信對立起來，——這是這裡所不應當有的無政府主義詞句。”（第 98 頁）這些論點本來是再淺顯不過的，這本來是不言自明的定理，根本用不着進行什麼表決（第 102 頁），至

于說人們不相信这个定理，那只是因为“目前各个概念都混淆了”（同上頁）。但是，少数派既然滿怀着知識分子个人主义思想，也就势必企图把代表大会的成果推翻，違抗多数的意志；但这种企图是只能用无政府主义的詞句来辯白的。最可笑的是，少数派除了新說普列汉諾夫不應該使用如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一类过分厉害的字眼以外，再也不能向普列汉諾夫提出任何其他的責难了。普列汉諾夫很公正地嘲笑了这些訴苦，他問道：为什么“饒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字样不便使用，而 a lèse-majesté（得罪陛下）和昏聩剛愎字样却便于使用呢”？这个问题始終沒有得到答复。这种独特的 *qui pro quo*^①原来是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及其伙伴们习以为常的了；他們的新字眼带有鮮明的“火气”的迹象；当人家指出这一点时，他們就很气憤——說什么我們是有原則性的人；但是，人家对他們說，如果你們根据原則来否決局部服从整体的制度，那末你們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了。于是他們又因人家使用了厉害的字眼而生气了。換句話說：他們想同普列汉諾夫搏斗，但是又要普列汉諾夫別認真攻打他們！

馬尔諾夫同志及其他一切“孟什維克”企图用同样幼稚的手段揭露我的一个“矛盾”，已經不知有过多少次了。他們从“怎么办？”或者从“給一位同志的信”里引証一些談到思想影响，談到爭取影响的斗争等話，同經過党章实行“官僚主义”影响，以及依靠权力实行“专制”傾向等等对立起来。多么幼稚的人啊！他們已經忘記了，从前，我們党还不是正式的有組織的整体，而只是各个集团的总和，所以在这些集团間除了思想影响以外，別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为有組織的政党，这也就是說造成了一种权

① 誤會。——編者注

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真的，向自己的老同志谆谆讲解这样的基本道理，真叫人不好意思，特别是当你感觉到，问题只是在选举问题上少数不愿意服从多数！但是，在原则上，所有这些滔滔不绝地瞎说我有自相矛盾之处的责难，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新“火星报”并不拒绝利用党机关的招牌和权利，但是不愿意服从党的多数。

如果说这些谈论官僚主义的词句中有什麼原则，如果说这不是用无政府主义态度否认局部必须服从整体，那末这个原则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因为机会主义就是力图减轻个别知识分子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所負的责任，削弱中央机关的影响，加强党内最不坚定分子的自治，认为组织关系只不过是口头上的抽象承认而已。这一点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看见了，当时阿基莫夫之流和李伯尔之流，正如后来马尔托夫及其伙伴们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一样，大谈“可怕的”集中制。机会主义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它的本性，不只是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导致马尔托夫式的和阿克雪里罗得式的组织“观点”，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分析新“火星报”所刊载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论文时就会看出来。

(十六)勿因小节而乱大谋

同盟否决了关于同盟章程必须經中央批准的决议案（同盟记录第 105 頁），正如党代表大会的整个多数派立刻指出的，这是“粗暴地违反党章的行为”。如果把这种违反党章的行为看成是一些有原则性的人的做法，那就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了，这种做法在代表大会以后的斗争环境中必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党的少数派在向党的多数派“进行报复”（同盟记录第 112 頁），这种做法是

意味着党内的少数派不愿意服从党和不愿意留在党内。同盟既然拒绝根据中央的声明通过必须修改章程的决议(第124—125页),结果同盟大会势必被认为是一个非法的大会,因为这个大会虽然想算作党组织的大会,同时却又不服从党中央机关。党内的多数派也就立刻离开了这个 quasi 党的大会,不去参加这一幕不体面的滑稽剧。

于是,那种只愿意抽象地承认组织关系而在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时暴露出思想动摇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义,在实践上就走到了早在9月间,即在一个半月以前我曾经预言过的那种合乎逻辑的结局,即走到了破坏党组织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即在同盟代表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普列汉诺夫同志居然向两个党中央机关的同事声明,说他不忍“枪杀自家人”,说他“宁肯自杀,也不愿意分裂”,说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必须个人作最大限度的让步,其实当时进行这种极残酷的斗争正是为了取得这种让步(其程度要比为了拥护那些在党章第1条上表现的不正确立场的原则要大得多)。为了确切说明普列汉诺夫同志的这种有全党的重大意义的转变,我认为最好不拿私人谈话做根据,也不拿私人信件(这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去援引)做根据,而是拿普列汉诺夫自己在全党面前对问题的说法,即拿他发表在“火星报”第52号上的“不该这么办?”一文做根据,这篇文章正是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在我退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1908年11月1日)以后,在补选马尔托夫分子(1908年11月26日)以前写成的。

“不该这么办?”一文的基本思想就是,认为在政策方面不应当采取太激烈太不让步的莽撞的态度,认为有时为了避免分裂,对修正主义者(即那些和我们接近或者态度不一贯的分子中的修正主义者)以及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实行让步,是必要的。这种抽象的

一般的論点当然使“火星报”的讀者莫明其妙。普列汉諾夫同志那些漂亮的傲慢的声明（在以后各篇文章中所作的声明），說人們由于不了解他的新奇思想和不懂得辯証法而沒有懂得他的意思等話，使人听起来真是忍不住要发笑。其实，当“不該这么办？”一文写成时，能懂得的只有十来个住在日内瓦郊外的两个村庄（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是相同的）中的人。普列汉諾夫同志的不幸，就在于他把只是针对这十来个参加代表大会以后全部同少数派作斗争的人发出的一大堆暗示、非难、代数符号和猜测，都搬到成千上万的讀者面前了。普列汉諾夫同志所以陷入这种不幸，是因为他違背了他那提法很不恰当的辯証法的基本論点：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想用抽象的形式把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向馬尔托夫分子让步的这个很具体的思想包起来，是不妥当的。

普列汉諾夫同志当作新穎的战斗字眼提出来的让步作法，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或者是让步者已經深信那些要求让步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正直的政治活动家总是公开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錯誤）；或者是为了避免更大的灾难而向那不合理的、对事业有害的要求实行让步。从这篇文章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指的是后一种情况：他爽直地說要向修正主义者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現在全体黨員已經从同盟代表大会記錄中知道这就是馬尔托夫分子）实行让步，即为了避免分裂而必須让步。可見，普列汉諾夫同志的所謂新穎思想完全可以归結为一句并不新穎的处世格言，勿因小节而乱大謀，小的机会主义愚蠢行为和不大的无政府主义詞句高于党内的大分裂。普列汉諾夫同志写这篇文章时，分明知道少数派是我們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并且知道少数派是用无政府主义手段进行斗争的。普列汉諾夫同志主張，要用个人让步的办法同这个少数派作斗争，正象德国社会

民主党同伯恩斯坦作斗争时那样（又是 *si licet parva componere magnis*）。倍倍尔在他自己的党的数次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声明，說他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伯恩斯坦同志（不象普列汉諾夫同志以前所爱称呼的那样称为伯恩斯坦先生，而是称为伯恩斯坦同志）更善于接受周圍人們的影响，我們要把他放到自家人中間，我們要选派他做国会議員，我們將进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但不是用太激烈的手段（如梭巴开維支-Parvus 之流）来反对这个修正主义者，我們“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kill with kindness）这个修正主义者，正如瑪·伯尔（M. Beer）同志（我記得似乎是他）在一次英国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称道德国人乐于让步、爱好和平、温和、灵活和审慎，而反对英国的梭巴开維支-海德門的攻击时所說的那样。同样，普列汉諾夫同志也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阿克雪里罗得和馬尔托夫两位同志的小无政府主义和小机会主义思想。誠然，普列汉諾夫同志在十分明显地暗示到“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时，有意地把修正主义者說得含糊不清，似乎他指的是从机会主义轉向正統派方面的工人事业派，而不是开始从正統派轉向机会主义方面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馬尔托夫，但这终究是幼稚的軍事策略^①，是构筑得很不高明的

① 在党代表大会以后根本就沒有人談到要对馬尔丁諾夫、阿基莫夫、勃魯克爾等同志实行让步。我沒有所說过他們也要求“补选”。我甚至怀疑，斯塔罗維爾同志或馬尔托夫同志在他們两人以“党内半数”名义遞給我們紙条和“照会”时，未必和勃魯克爾同志商量过……在同盟代表大会上，馬尔托夫同志以坚强的政治战士十分气愤的心情提出抗議，說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梁贊諾夫或馬尔丁諾夫联合”，說他根本没有想到要同他們“勾結”，甚至沒有想到可能同他們一起（以編委資格）“为党服务”（同盟記录第 53 頁）。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严厉地指斥了“馬尔丁諾夫的傾向”（第 88 頁），而当奧尔托多克斯同志¹⁸巧妙地暗示說阿克雪里罗得和馬尔托夫也許“承认阿基莫夫、馬尔丁諾夫以及其他同志同样有权随心所欲地召集會議，为自己制定章程并按照这

工事，根本擋不住全党公論的炮火。

所以，誰只要了解当时政治形势的具体情况，誰只要洞察普列汉諾夫同志的心理，誰就会懂得我当时不能有什么別的做法。我这段話是专对那些責怪我不應該让出編輯部的多数派分子說的。普列汉諾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由一个贊成多数派意見的人变成了坚决主張調和的人，可是我当时不能不把他这种轉变了解为用意极好的轉变。也許普列汉諾夫同志想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达到公正的和平的綱領？凡是这样的綱領都归结于由双方当事人誠懇地承认自己的錯誤。普列汉諾夫同志究竟指出了多数派的什么錯誤呢？——他指出，对修正主义者采取了只有梭巴开維支才慣于采取的太激烈的态度。不知普列汉諾夫同志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是他自己說了关于驴子的那些挖苦話呢，还是当阿克雪里罗得在場时很輕率地讲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話；普列汉諾夫同志宁願使用“抽象”說法，并把罪过轉嫁到別人头上。这当然是各人有各人的兴趣。但是，我無論在給一位火星派分子的信中以及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都公开承认过我說話太激烈；难道我能不承认多数派方面的这种“錯誤”嗎？至于讲到少数派，普列汉諾夫同志很清楚地指出他們的錯誤是修正主义里想（参照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机会主义和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关于饒勒斯主义的評語）和导致分裂的无政府行为。难道我能阻撓想用个人让步以及一般用种种《kindness》（亲切的、温和的手段等等）使大家承认这种錯誤并消除它的害处的企图嗎？既然普列汉諾夫同志在“不該这么办？”一文中公然劝告大家“寬恕”“只是由于稍微

个章程行事”（第99頁）时，馬尔托夫分子馬上就来否认这一点，就象彼得否认他是耶穌的門徒一样（見第100頁，“奧尔托多克斯同志对于阿基莫夫之流、馬尔丁諾夫之流等人的耽心”，“是毫无根据的”）。

不一貫”而成了修正主義者的那些修正主義者中的“敵人”，我又怎能阻撓這樣一種企圖呢？既然我不相信這種企圖能有什麼良好結果，那末我除了在中央機關報方面表示個人讓步，並為維護多數派的立場而轉到中央委員會去以外，又有什麼辦法呢？^①當時我不能絕對否認這種企圖可能成功而獨自對於分裂的危險負責，因為我自己在10月6日的信中也曾經想把無謂爭吵解釋為是由于“意氣用事”。至於擁護多數派的立場，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是我自己的政治職責。在這方面指望普列漢諾夫同志是很困難而且很危險的，因為普列漢諾夫同志顯然決心要把他所謂“一個無產階級的領導人當自己的好戰癖性同政治的考慮相抵觸時便沒有權利迷恋這種癖性”一語用辯證法的口氣解釋成，如果真要射擊，那就以射擊多數派更合算些（按日內瓦11月間的天氣來說）……當時所以必須擁護多數派的立場，是因為普列漢諾夫同志公然違反必須具體地全面地觀察問題的辯證法要求，說到革命家的善良（？）願望時居然迴避了對一個革命家的信任問題，對一個領導了我們黨內一定派別的“無產階級領導人”的信任問題。普列漢諾夫同志講到

① 關於這一點，馬爾托夫同志很中肯地說我是 *avec armes et bagages*（帶着武器和行囊。——編者注）轉過去的。馬爾托夫同志喜歡使用軍事比喻：向同盟進軍，戰役，治不好的創傷，如此等等。老實說，我也有愛用軍事比喻的癖性，特別是現在從太平洋傳來的消息很引人注意的時候。但是，馬爾托夫同志，如果按軍語來說，下面就是事實真相。我們在黨代表大會上占領了兩座炮台。你們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攻擊這兩座炮台。在第一次小規模的相互射擊以後，我的一位同事，一座炮台上的指揮官，敞開了大門迎接敵人。我當然就帶着自己的小隊炮兵轉到另外一座幾乎還不巩固的炮台上去——“避開”占壓倒優勢的敵軍。我甚至提議講和：難道可以同兩個強國作戰嗎？但是，新的聯軍拒絕同我講和，反而用炮轟擊我這座“殘存的”炮台。於是我就開炮自衛。而我過去的那位同事、指揮官却怀着十分憤怒的心情一板正經地喊道：看哪，善良的人們，這個張伯倫多麼不喜歡講和呀！

无政府个人主义，并劝告大家說“有时”应该对違反紀律的行为装作看不见，“有时”要向“完全不是由忠实于革命思想的情感所引起的”知識分子放肆行为表示让步，但是他显然忘記了也应当考虑到党内多数派的善良的願望，忘記了在什么限度内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让步的問題应当由实际工作者去解决。同幼稚的无政府主义認論进行文字斗争是比較容易的，但是要在一个組織内同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进行实际工作就比較困难了。如果一个著作家竟然要負責决定对于无政府主义实行可能的实际让步的限度，那就只能暴露出他的过分的、十足学究气的、文人的自大狂了。普列汉諾夫同志一方面堂皇地宣称（正如巴札洛夫¹⁹所說的那樣，为了摆一摆資格），一旦发生新的分裂，工人們不会了解我們，同时他自己又在新“火星报”上登載了許多文章，这些文章按其真正的具体的意义來說，不仅工人始終不能了解，而且根本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了解的。怪不得有一个中央委員讀了“不該这么办？”一文的付排稿时会警告过普列汉諾夫同志，說他这篇文章恰巧破坏了他自己想把某些文件（党代表大会記錄和同盟代表大会記錄）公布范围稍微縮小的計劃，因为这篇文章激起一般人的好奇心，把一些带有刺激性而又完全曖昧不明的东西送到街头去裁判^①，必然引起一些令人莫明其妙的問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怪不得普列

① 我們在一所关着房門的屋子里进行了非常热烈的爭論。突然我們中間有一个人跳了起来，把临街的两扇窗子打开，并叫騰什么梭巴开維支、什么无政府个人主义者、什么修正主义者等等。当然，街头上聚集了一群好奇的人，而我們的敌人就幸災乐禍了。那时，其他参加爭論的人也走到窗前，表示願意把問題从头到尾說个清楚，而不暗示那些誰也不知道的事情。当时忽然有人把窗子关上了，說什么用不着談无謂爭吵（見“火星报”第53号第8頁第2栏倒数第24行）。普列汉諾夫同志，如果說本來就用不着在“火星报”上提起“无謂爭吵”²⁰，那就对了！

汉諾夫同志的這一篇議論抽象和態度曖昧的文章使社會民主黨的敵人拍手稱快，使“革命俄國報”的作家歡欣鼓舞，使“解放”雜誌方面的徹底的修正主義者大加贊揚。所有這些可笑而又可悲的謬會，所有這些使普列漢諾夫同志後來很可笑而又很可悲地企圖擺脫的這些謬會所以發生，正是因為他違背了具體問題應該完全具體分析這一辯證法的基本原理。例如，司徒盧威先生高興是完全自然的，因為他根本不願理會普列漢諾夫同志所追求的（但是不一定能夠達到的）那些“良好的”目的（kill with kindness）；司徒盧威先生歡迎而且也不能不歡迎現在人人都看見的在新“火星報”上開始產生的這種朝我們黨內機會主義派方面的轉變。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不僅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都歡迎各該國社會民主黨內發生的每一次向機會主義的轉變，哪怕是最小的和暫時的轉變。聰明的敵人所作的估計很少是純粹的謬會；請你告訴我，贊揚你的是誰，那我就能告訴你，你的錯誤在什麼地方。普列漢諾夫同志徒然地期望讀者不細心，竟說多數派根本反對在補選方面做個人讓步，而不是反對從黨的左派轉變到右派方面去。問題實質完全不在於普列漢諾夫同志為了避免分裂而實行個人讓步（這是很值得表揚的事情），而在於他雖然完全承認必須同那些態度不一貫的修正主義者以及無政府個人主義者⁴進行爭論，卻又寧願同多數派進行爭論，而他所以同多數派發生分歧，又是由於對無政府主義可能實行實際讓步的限度問題。問題的實質不在於普列漢諾夫同志改變了編輯部的成員，而在於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爭論的立場，他已經不在黨中央機關報上維護這個立場了。

至於說到當時作為多數派的唯一有組織的代表機關的中央委員會，那末普列漢諾夫同志當時同中央委員會發生分歧，只是由

于对无政府主义可能实行的实际让步的限度問題。自从11月1日我退出編輯部而让 kill with kindness 政策自由进行的时候起，几乎已經一个月了。普列汉諾夫同志有充分可能通过各种交往来檢驗这个政策是不是行得通。普列汉諾夫同志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不該这么办？”一文，这篇文章过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馬尔托夫分子钻进編輯部的唯一的入場券。有两个口号——修正主义（应该用寬恕敌人的态度同修正主义进行爭論）和无政府个人主义（应当用温和办法使无政府个人主义就范），特別鮮明地印在这个入場券上。先生們，請进吧，我会用温和的手段杀死你們的，——这就是普列汉諾夫同志在这个請帖上对自己的編輯部新同事們說的話。当然，中央委员会只得說出自己的最后的話（最后通牒，也就是关于可能和平的最后的話），說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看来，在什么限度內可以容許对无政府个人主义实行实际的让步。或者是你們願意和平，那时我們就会給你們一定数量的席位，以表明我們态度温和，爱讲和平，願意让步等等（我們为了保障党内和平所能給予你們的不过如此，和平并不意味着沒有爭論，而是意味着不許无政府个人主义破坏党）。請你們接受这些席位并逐渐从阿基莫夫方而轉回普列汉諾夫方而吧。或者是你們想坚持并发展你們的观点，最終地轉到（哪怕只是在組織問題上）阿基莫夫方面去，想使党信服你們是理直的，而普列汉諾夫是理亏的，——那时就請你們組織自己的作家集团，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并开始用正派斗争和公开論战的手段爭取多数吧。中央委员会在1908年11月25日的最后通牒內（見“戒严状况”和“对同盟代表大会記錄的述評”^①）

① 至于馬尔托夫在“戒严状况”中引用私人談話等等歪曲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把戏，我当然是不会加以分析的。这套把戏就是我在前一节曾經說过的“第二种斗争方法”，这套把戏只有神經病理学专家才有本事把它弄清楚。只要指

十分清楚地向馬尔托夫分子提出二者必居其一的問題，完全符合我和普列汉諾夫两个人在1903年10月6日給旧編委們写的那封信的內容；或者是意气用事（那时可以——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实行“补选”），或者是原則性的分歧（那时应当先說服党，然后才談得上改变中央机关的成員）。中央委员会当时有理由让馬尔托夫分子自己来解决这个二者必取其一的难题，尤其因为正是当时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 *profession de foi*②（“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里写过如下一段話。

“少数派只要求得到一种荣誉，即想在我們党的历史上作出第一个范例，处在“失败者”的地位时可以不組織新党。少数派的这种立場是出自他們对党組織发展过程的全部看法，出自他們对他們自己同以往的党的工作之間的牢固联系的認識。少数派不相信‘紙上革命’的神秘力量，认为自己的志願有深刻的十分重要的根据，能保証他們在党内用純粹思想宣傳手段使自己的組織原則取

出一点就够了，就是馬尔托夫同志在那里硬說他們同中央訂立过不发表駁判內容的协定，可是这种协定不管怎样去找，到現在也沒有找到。当时代表中央进行駁判的特拉文斯基同志曾用书面通知我，說他认为我有权在“火星报”以外的刊物上发表我給編輯部的信。

馬尔托夫同志那里只有一个字眼是我特別喜欢的。这个字眼就是“最坏的拿破侖主义”。我觉得，馬尔托夫同志把这个概念提得十分灵巧。讓我們冷靜地看一看这个概念是意味着什么吧。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用形式上合法而实际上违反人民（或党）意志的手段来取得权力。馬尔托夫同志，难道不是这样嗎？如果是这样，我就平心靜气地让公众来判断，是誰表现过这种“最坏的拿破侖主义”：是本来能够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行使自己的可以不让馬尔托夫分子进来的形式权利，但是沒有行使这种权利的列宁和伊格烈克²¹呢；还是那些在形式上正当地占据了編輯部（“一致同意的补选”），但明明知道这在实际上是符合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并害怕由第三次代表大会来檢驗这种意志的人們？

② 信条，綱領，世界观。——編者注

得完全的勝利。”(着重号是我加的)

多么漂亮、多么自負的言詞呵！在我們根据經驗確信，這些言詞只不过是一些言詞時，又是多么沉痛呵……馬爾托夫同志，对不起，現在我要代表多數派表示要求獲得你們沒能獲得的這種“榮譽”了。這種榮譽真偉大，值得為它一戰，因為小組習氣的傳統給我們留下的一種習氣就是，動輒進行分裂和十分熱心運用“不是咬牙切齒，就是握手言歡”這一格言。

大謀(指有統一的黨)應當高于並且確實高于小節(指為補選進行的無謂爭吵)。我退出了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伊格烈克同志(他是我和普列漢諾夫推舉為代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參加總委員會的)退出了總委員會。馬爾托夫分子用一封等於宣戰的信(見我們引用過的那本書)回答中央委員會關於提議和平的最後的話。那時，並且直到那時，我才給編輯部寫信(“火星報”第58號)說到公論問題^①。我說，如果真要談到修正主義，爭論不一貫性和無政府個人主義行為，爭論各領導人的失敗問題，先生們，那就讓我們把一切都說出來，痛痛快快地說出全部事實真相吧，——這就是我那封談到公論問題的信的內容。編輯部對這封信的回答是破口大罵，並堂皇地訓誡說，不要掀起“小組生活中的瑣事和無謂爭吵”……(見“火星報”第58號)。那時，我暗自忖度：啊，原來是“小組生活中的瑣事和無謂爭吵”……es ist mir recht，先生們，這一點我倒是同意的。那末這就是說你們把“補選”糾紛公開叫作小組的無謂爭吵了。這倒是真話。可是，如果同一個(似乎是同一個)編輯部在同一號(第58號)的社論上又談起官僚主義、形式

^①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98—102頁。——編者注

主义等等，那就令人觉得是杂音了^①。你不应该提起关于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补选而斗争的问题，因为这是无谓争吵。我们却要提起关于中央委员会补选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不是无谓争吵，而是关于“形式主义”问题的原则分歧。不呀，亲爱的同志们，对不起，这样的事，我可不会让你们来干了。你们想向我这座炮台开火，同时又要我把大炮交给你们。真是开玩笑呀！于是我就写了一封“给编辑部的信”（“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②，并且把它发表在“火星报”以外的地方；我在这封信中简略地说明了事实真相，并且再三问道，可不可以按照你们占中央机关报而我们占中央委员会的分配原则求得和平。任何一方面都不会觉得自己在自己的党内是“外人”，至于向机会主义方面的转变，我们可以争论争论，首先在报刊上争论，然后也许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

一听到我提起和平，所有敌人的炮台——包括总委员会在内——都立刻开炮来回答。真是弹如雨下。什么专制君主，施韦泽，官僚主义者，形式主义者，高于中央的人，片面性的人，莽撞的人，执拗的人，眼光狭小的人，疑神疑鬼的人，不讲和气的人……好极了，我的朋友！你们射完了吗？你们的军火库里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吗？你们的炮弹原来是很不顶事的呀……

现在该我说话了。现在我们看一看新“火星报”的新组织观点的内容，以及这些观点同我们党内划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至于这种划分的实质，我们在分析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和表决情况时已经说过了。

① 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杂音”只是因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中有杂音。关于“无谓争吵”的文章是普列汉诺夫写的（见他在“可悲的误会”中的自白，第57号），而社论“我们的代表大会”是马尔托夫写的（“戒严状况”第84页）。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② 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7卷第108—110页。——编者注

(十七)新“火星报”。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則立場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①当作基本对象来考察。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們在上面已經詳細地指出来了，因此現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細考察一下那个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細小的瑣碎的論据）得出正是这些面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討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則意义，不管它們如何产生，不管“补选”問題如何。目前我們正处在“让步”空气濃厚的时候，那就讓我們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談談”他的“理論”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論点（“火星报”第57号），就是“我們的运动一开始就有两种对立的傾向，这两种傾向互相对抗的程度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說，“在原則上，运动的无产階級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們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社会上的異己分子”，即激进知識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們党内的无产階級傾向和激进知識分子傾向是互相对抗的。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在这里（而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确实存在着这种对抗。况且，大家都知道，正是这种对抗才在很大的程度上說明目前社会民主党已經分成革命的（即正統的）和机会主义的（即修正主义，閣員主

^① 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两年来的‘火星报’論文集”，1906年圣彼得堡版第2册第122頁及以下各頁。（这是列宁給1907年版加的注。——編者注）

义，改良主义的)两派，这一点也在我們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統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識分子的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接近到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怕起来了，向后退縮了。他一点也不打算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們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問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編輯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記錄怕得要死。虽然我們看了上述一切之后不应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們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論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因自己有这个特性而避开关于我們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于是便到惬意的幻想中去求救。他說道：“难道合法的馬克思主义或半馬克思主义不是給了我国自由派一个文坛上的領袖嗎，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統的，即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出一个領袖給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呢？”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們只能說，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还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辯护。当那位半馬克思主义派的領袖流露出个自由派分子的神态时，凡是願意(和善于)探討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証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領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邏輯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外貌特征，这些特征暴露了资产阶级著作中对馬克思主义的反映²²。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从事分析“我們运动中的一般革命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絲毫——确实是絲毫——不能証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我們党内正統派的某些代

表人物的某些傾向，那他不過是鄭重地證明他自己的思想貧乏罷了。既然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只好用什麼可能有的歷史捉弄，那末，他的事情大概也是十分不妙的。

阿克雪里羅得同志的另一引証，即關於“雅各賓派”的引証，是更值得玩味的。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大概不會不知道，目前社會民主黨的分成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早已——並且不僅在俄國——使人有了運用“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歷史比擬”的借口。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大概不會不知道，目前社會民主黨中的吉倫特派隨時隨地都在用“雅各賓主義”、“布朗基主義”之類的名詞來形容自己的對手。我們不會象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那樣害怕真相，且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我們代表大會的記錄，看看這些記錄究竟有沒有什麼材料可供我們分析和檢查現在我們所考察的這些傾向和我們所剖析的這種比擬。

第一個例子。在黨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問題的爭論。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贊同”馬爾丁諾夫同志的意見）聲明：“關於奪取政權（即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段條文寫得跟其他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不大相同，有人可能把它解釋成領導組織的作用一定會把受它領導的那個階級推到後面去，並把它自己和那個階級隔離開，而且普列漢諾夫就是這樣解釋的。因此，我們的政治任務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黨’的一樣”（記錄第124頁）。普列漢諾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立即反駁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責他這是一種機會主義觀點。阿克雪里羅得同志難道看不出，這次爭論向我們表明（不是用想象的歷史捉弄，而是用事實）社會民主黨內有現代雅各賓派和現代吉倫特派相對抗嗎？阿克雪里羅得同志所以談起什麼雅各賓派來，不正是因為他自己已經與社會民主黨內的吉倫特派為伍（根據他所犯的錯誤來說）了嗎？

第二个例子。波薩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則的絕對价值”这个“基本問題”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見分歧”(第169頁)。他和普列汉諾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則的絕對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領(叶哥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領(哥里德勃拉特)当即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諾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頁),——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为正統派同资产阶级倾向有联系的看法,不过不同的是阿克雪里罗得始終沒有把这个意見具体地說出来,而哥里德勃拉特則把它同一定的辯論联系了起来。我們不妨再問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爭論也向我們具体地(在我們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目前社会民主党內有雅各宾派和吉倫特派相对抗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經与吉倫特派为伍了嗎?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1条的爭論。究竟是誰在捍卫“我們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誰在強調說明工人不怕組織,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視“組織起来!”这个口号的激励作用呢?究竟是誰叫人防备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誰在暗中把激进知識分子引到党里来,是誰在关心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单个人物和急进青年呢?是吉倫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和吉倫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抗辯在我們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指責“劳动解放社”多数的那个“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可是他抗辯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附和伯恩施坦派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言滥調,証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所以高喊什么激进知識分子的危險,无非是为了掩飾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分明是关心这种知識分子的言論。

运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唬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

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經意識到本階級利益的无产階級的組織有密切联系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学生，害怕无产階級专政，迷信民主要求有绝对价值的吉倫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現在，把政治斗争縮小为密謀活动的思想已經在刊物上被駁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駁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經被闡明和反复地說明了，因此現在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进行密謀活动的組織是危險的东西。人們害怕密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如像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費心机地力图証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階級知識分子那种在目前社会民主党人中間常常显露出来的吉倫特式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拚命想說出一种新意見（其实这种意見早已有人說过几百次了），即要人們防范 40 年代和 60 年代法国革命密謀家的策略（見第 62 号上的社論）²³。在最近一号的“火星报”上，目前社会民主党中的吉倫特派也許想向我們証明，40 年代法国密謀家中有些人认为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是党用来影响階級的基本工具，这早就成了家喻戶曉和用不着再來說明的起碼常識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見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回味起碼常識，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馬尔托夫所处的那种地位的必然結果，他們已經墮落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讲什么样的話。所以他們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詞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遙远的过去找到少許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場辯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各种不同的色彩来看，这个立場是无法辯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談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

而外，还說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說不仅“經濟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的毛病”，过分“迷醉”，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醉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讀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談闊論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問道：他們究竟是在模仿什么人呢？这种議論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呢？誰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經濟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們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經濟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8号），人們就认为“經濟主义时代”“已經完全过去了”，經濟主义“已經被完全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醉显然是一种祖傳現象。“火星报”新編輯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經完全被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們在代表大会上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是因为他們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杂志上犯的那些錯誤嗎？如果是这样，那我們就成了十足的傻瓜了。可是，誰都知道我們并没有这样做，我們在代表大会上和阿基莫夫之流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們在“工人事业”杂志上所犯的旧的、已經完全被埋葬了的錯誤，而是因为他們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錯誤。我們并不是根据他們在“工人事业”杂志上的立場，而是根据他們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場来判断究竟哪些錯誤已經真正消除，哪些錯誤仍然存在，因而有爭論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經濟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傾向仍然存在，这些傾向曾經在討論和表决許多問題时表現了出来，并且終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問題的实质完全在于，“火星报”新編輯部因某些很明显的原因为图模糊这种新的划分同我們党内目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善于說明新的划分的

政治起源(或者說,为了让步想蒙蔽^①这种起源),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在組織問題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組織原則(党章第1条)的爭論引起的,其結果便是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實踐”。經濟派和政治派之間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在策略問題上的分歧。

这种由党内生活的真正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問題退回到早已解决了的而現在又故意搞出来的問題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来辯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創的那个始終貫徹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論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內容比形式重要,綱領和策略比組織重要,认为“組織的生命能力同它所灌輸給运动的那种內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例”,认为集中制不是“自滿自足的东西”,不是“万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偉大的真理呵!綱領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組織重要。識字課本比詞源学重要,詞源学比句法学重要,——可是,关于那些在考試句法学时沒有及格而現在居然因留級而矜夸的人,又能說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組織原則問題上的議論,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关于党章第1条),而在組織中的行动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現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太不自量力了!其实,什么是組織呢?它不过

① 見“火星报”第53号上刊載的普列汉諾夫論“經濟主义”一文,在這篇文章的副題上,大概排錯了幾個字。“論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的幾點公開意見”幾字顯然是“論同盟代表大會”,也許是“論補選”幾字之誤。雖然在相當條件下可以對個人的欲望作些讓步,然而決不容許——不是從庸人觀點而是從黨的觀點來看——把黨所關心的一些問題混淆起來,不能把已經開始由正統派方面轉到機會主義方面去的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所犯的新錯誤問題,偷換為今天在許多綱領問題和策略問題上也許願意由機會主義方面轉到正統派方面來的馬爾丁諾夫和阿基莫夫之流所犯的舊錯誤(即現在只有新“火星報”才會回憶的錯誤)問題。

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不是万灵丹；什么是句法学呢？它是沒有詞源学那样重要的东西，它不过是把各个单字联起来的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編輯部得意地問道：“如果我們說，代表大会制定党綱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大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們的說法？”（第56号的附刊）我想，这个經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并不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說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全人类一样，永远只給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要知道，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是与此同出一轍的。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譏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些冒充哲学的庸俗議論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問題上的錯誤辯护，替他們不会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的毛病辯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些党綱比党章重要，党綱問題比組織問題重要的庸俗議論，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組織問題上的錯誤辯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知識分子的不坚定（因此他們只能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話）辯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嗎？这难道不是夸奖那些留級的人嗎？

通过党綱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你們看，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議論含有多么濃厚的急进派知識分子的氣味，这种氣味与資產階級頹廢思想不是比与社会民主主义更相投！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詞在这句名言里完全应当从象征的意义上去理解。既然說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願意思索，那末他們不妨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們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綱，这不仅沒有使我們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沒有使我們避免分裂。在党綱問題上和策略問題上的一致是保證党内團結，保證党的工作的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我的老天呀！

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只好說明一下多么淺显的道理呵！)。为了保証党内团结，为了保証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組織上的統一，而这种統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規定的党章，沒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沒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則，那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从前，当我們在綱領和策略的基本問題上还没有一致时，我們就曾直截了当地說我們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組习气盛行的时代，声明在統一以前必須划清界限，我們当时根本没有說到共同組織的形式，只是談到我們在綱領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問題（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問題）。現在我們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經保証了表述在党綱和党关于策略的決議中的充分的一致；現在我們必須采取下一个步驟，于是我們在我們大家的同意下实行了这个步驟；我們規定了把一切小組溶为体的統一的組織形式。現在却有人把我們拉轉去，把这种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們拉轉去干无政府主义行为，讲无政府主义空話，恢复小組来代替党的編輯部，而現在又用什么讀識字課本要比学句法学更能促进文理通順的道理来替这种退步辯护！

三年前在策略問題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現在又在組織問題上使用起来了。我們不妨看看新編輯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議論。亚历山大罗夫同志說：“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針，在党内不只应当通过思想斗争，而且应当通过一定的組織形式来实行。”編輯部教訓我們說：“把思想斗争和組織形式这样相提并論，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組織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56号附刊第4版第1栏下面确实是这样刊印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說法和那种說鉄球是鉄球，炸彈是炸彈的笑話毫无二致。思想斗

爭是一種過程，而組織形式不過是包着內容的形式！問題正在於我們的思想爭究竟是由更高級的形式；即由大家必須遵守的黨的組織形式包着呢，還是由過去的渙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的形式包着。人們把我們從更高級的形式拉轉到更原始的形式上去，並且還為此辯白，說什麼思想爭是一種過程，而組織形式不過是形式。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從前把我們從策略計劃拉轉到策略過程上去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不妨看一看新“火星報”為了反對那些似乎只看到形式而看不到內容的人所說的這些關於“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的大話（第 58 號的社論）。難道這不是第二號阿基莫夫主義嗎？頭號阿基莫夫主義曾經拿“無產階級鬥爭”的更“深刻”內容，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來替社會民主黨內某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策略任務的提法上的落后開脫。第二號阿基莫夫主義，也用組織不過是形式而整個實質在於無產階級的自我教育這種同樣深奧的理由，來替社會民主黨內某一部分知識分子在組織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上的落后辯白。替小弟弟担心的先生們，無產階級是不怕組織和紀律的！無產階級是會因為那些不願加入組織的教授先生和中學學生先生在黨組織監督下工作，就急於要承認他們是黨員的。無產階級由它們全部生活養成的組織精神，要比許多知識分子徹底得多。對我們黨綱和策略多少有些認識的無產階級分子，都不會用形式不如內容重要的口實來替組織上的落后辯護。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某些知識分子，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仇視和鄙棄無政府主義空話方面缺乏自我教育。第二號阿基莫夫之流，現在也和頭號阿基莫夫之流從前誣蔑無產階級，說它還沒有成熟到進行政治鬥爭的地步一樣，在誣蔑無產階級，說它還沒有成熟到組織起來的地步。已經成為自覺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并感到

自己是黨員的无产者，也一定会像他从前用十分鄙棄的态度斥責过策略問題上的尾巴主义一样，用十分鄙棄的态度来斥責組織問題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請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說：“如果真想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活动”（用着重号是为了加深意思）“統一而又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組織，那末，这种思想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組織本身作为一种形式”（請听，請听呀！），“只能随同”（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着重号，都是作者自己加的）“构成其內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 57 号）。这岂不是和民間故事里的那人物遇見人家送葬时高喊“恭喜恭喜”的笑話一模一樣嗎？大概，我們党内沒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們活动的形式（即組織）老早就落在內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不識时务的人才向落在后面的人們喊什么齐步走！不要赶到前面去！不妨拿我們党和崩得比較一下。毫无疑问，我們党的工作內容①要比崩得的工作內容丰富多样，广泛得多，深入得多。理論規模更巨大，綱領更进步，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組織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傳鼓动工作更多样，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示威和总罢工时进行的人民运动更壯闊，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動更有力量。可是“形式”怎样呢？我們工作的“形式”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

① 更不必說，我們党的工作內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社会民主革命派的精神确定（在党綱等等中确定）的，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們同那些在“少数派”內占大多数的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結果。同样，关于“內容”問題，也不妨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 8 号（第 46 号至第 51 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 12 号（第 52 号至第 63 号）比較一下。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說了。

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旁观”的人都触目伤心，无限惭愧。工作組織比工作內容落后，是我們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集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經是我們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們无法采取繼續前进的重大步驟来发展內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費，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之流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們”，却在这个时候带着深思的神情鼓吹說：形式只应当随着內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如果有人成心想加添謬論并从大道理上替机会主义詞句找一些根据，那就請着在組織問題（党章第 1 条）上所犯的小錯誤会引向怎样的結局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从前我們就听見有人用这个調子来对待策略問題；現在我們又听見有人用这个調子来对待組織問題。組織問題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必然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許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傾向推崇为 观点的体系，推崇为一种特別的原則意見分歧，就会从他的心理中产生这样的东西。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們看見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們又看見有人企图把它推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証实了我們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經表示过的意見：参加社会民主运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观点限意識到本階級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們已經領教过了）揭发我的罪状，說我把党想像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 57 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那个吓人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階級組織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階級組織的理論的責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学会组织，使它成了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人民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教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要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领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领会的纪律和组织。对这个学校怕得要死，对这个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 *Edelanarchismus*，即所谓“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据我看不如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者所特有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凶恶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怜又可笑的嗟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并且他们认为特别吓死人的，就是把编辑变成工作人员），他们一听见有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样子，发表鄙视的（对“形式主义者”）意见，说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向我提出的正是这样一种训示，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引了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所说的话。举一些小组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确立的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的行为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們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沒有任何組織联系的单个小組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組轉到另一小組，只是某一个人“自願”的事情，並沒有任何正式規定的整体意志作为他的行动的准繩。各个小組內部的爭論問題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的要挟”来解决，正如我在“給一位同志的信”^①里根据許多小組和当时我們六人編輯部的經驗所形容的那樣。在小組时代，这种現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誰都沒有想到要贊美它，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引以为苦，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組溶为一个正式的党組織。現在，这种溶合已經實現了，可是有人硬向后拉我們，用冒充最高組織观点的无政府主义詞句来款待我們！在那些过慣了家庭式小組的自由散漫生活的人們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狹隘、太狹窄、太累贅、太低級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約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派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狹隘的小組联系。一个小組內部或各个小組之間的联系，在过去当然是不需要也是无法規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以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沒有根据的“信任”来保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用这两种东西来保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謂“用官僚主义态度”（在放蕩不羈的知識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使我們除掉小組的剛愎自用，除掉小組的任意胡鬧，除掉小組的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无謂爭吵。

新“火星报”編輯部用教訓的口吻反对亞历山大罗夫說，“信任是一种維妙維肖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釘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

①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04—221頁。——編者注

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这种提出信任——赤裸裸的信任——的范畴，恰巧就是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思想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部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纲领、我们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和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行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硬向后拉我们，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怎样议论那些也许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作家集团吧。处处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他们说什么，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讲道理的团体，我们就同它“磋商”（sic）；不然我们就把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对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态度呀！其实，这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路加修饰的，充满了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只鳞片瓦。这种立场的虚假，必然会产生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

想，以至把渙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組織的 原則，同时在口头上又假仁假义地把这种渙散状态說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級党机关构成的严密体系，因为在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派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見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則，用什么“官僚主义的形式”手續規定“磋商”或划清界限的 党的 办法，而是让人们去推崇以前小组的无謂爭吵，空談“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組織方法。

在这方而受过“工厂”訓練的无产者正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訓那些无政府个人主义者。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上述知識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識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更丰富的知識、更广闊的政治視野。可是，随着我們这个 真正的 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軍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說无政府主义空話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 要求 普通党员，而且 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象他从前蔑視策略問題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視組織問題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組織問題上的立場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同吉倫特主义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特点就是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对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嗥叫，对“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拥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視”的惋惜，对“唯命是从”这种要求的滑稽喊叫，对“昏聩刚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則意思（如果說它含有什么原則意思的話^①）。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捍卫和辯护任何一

① 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叫鬧的“朴选”意思撇开不谈。

种落后表现的，无论是对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都是如此。新“火星报”拥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的立场，是同拥护自治制的立场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治制已经信用扫地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拥护自治制还有些害羞，它还叫我们相信它同情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在集中制这个词的下面加上着重号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所谓“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quasi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拥护自治制的思想。难道现在不是大家都看见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用一种可笑的热心来证明，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应有自治权，国外同盟的章程确定了这些关系，它确实是不管党内多数的意志的，不管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拥护的正是自治制。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拥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①，我认为重要的是，应当在这里指出他无疑有拥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

① 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去，那怎么能分配人力呢？关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真是不好意思来说明。

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所固有的根本特徵。

在新“火星報”(第 58 號)上拿“民主主義的形式原則”(着重號是作者加的)和“官僚主義的形式原則”相對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義這個概念的唯一嘗試了。這種對照(可惜，這種對照也和他們對非火星派分子的指正那樣沒有加以發揮，沒有加以闡明)，確實有些道理。拿官僚主義和民主主義 versus^①，這也就是拿集中制和自治制相比，也就是拿社會民主黨革命派的組織原則和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的原則 versus。後者力求自下而上地來行動，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內，都堅決主張實行自治制，主張實行達到(在那些狂熱堅持這點的人們那里)無政府主義地步的“民主主義”。前者力求由上層出發，堅決主張擴大中央機關對於部分的權力和權限。在渙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盛行的時代，這種上層機關(社會民主黨革命派力求在組織上由上層出發)必然是一個由於自己的活動和自己的革命徹底性而享有極大威信的小組(在我們這裡就是“火星報”組織)。在恢復黨的真正統一並在這個統一的基礎上解散各個過了時的小組的時代，這種上層機關必然是黨的代表大會，即黨的最高機關；代表大會儘可能把各個積極組織里的一切分子團結起來，任命中央機關(它的成分往往要多讓黨內先進分子滿意，少讓黨內落後分子滿意，往往要多讓黨內革命派喜歡，少讓黨內機會主義派喜歡)，使它成為黨的最高機關，直到召開下屆代表大會為止。至少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那里是如此，目前無政府主義者所根本仇視的這種風氣在亞洲社會民主黨人中間也開始流行起來，雖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難，不免要遇到鬥爭，不免要遇到無謂爭吵。

① versus——相比。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原則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識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倫特主义），在各国社会民主党內，在有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地方（試問在什么地方沒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不过 *mutatis mutandis*（有相当的改变）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內暴露得特別明显，近来在第 20 号薩克森选区选举运动中遭到的失敗（所謂覺勒事件^①）把党的組織原則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則問題，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瘋狂努力的結果。覺勒（他从前是一个牧师，他是不无名气的《Drei Monate Fabrikarbeiter》^②一书的作者，他是德勒斯頓代表大会上的“主人公”之一）本人是一个露骨的机会主义者，所以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主持的《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社会主义月刊”）立刻来“袒护”他。

綱領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有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为了向讀者說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运动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識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哥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干格·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和阿克雪里

① 覺勒 1903 年 6 月 16 日曾在第 15 号薩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德国国會議員，但他在德勒斯頓代表大会²⁴以后辞去了議員职务。第 20 号选区議員罗津諾夫逝世以后該区选民又想推举覺勒为候选人，来补这个缺額。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薩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坚决表示反对，虽然它們沒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覺勒为候选人，但是它們终于使覺勒放棄了候选人的資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敗。

② “在工厂里干了三个月”。——編者注

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論文的标题“对覺勒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見”（《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4月第4期），就已經了不起了。內容也同样是声势浩大的。沃·海涅同志坚决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則”，抗議“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議員。沃·海涅同志教訓我們說，問題并不在于偶然事件，而在于一般“在党内有一种官僚主义和集中主义的傾向”。他說，这种傾向从前也有过，但是現在已經成了特別危險的东西了。必須“在原則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馬尔托夫同志所著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一书中剽窃来的）。不要“让一切重要政治問題都由一个中央机关来处理”，应当要党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談“生活一定会占上风”那篇演說中借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論据說，“如果細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談，那末我們就会看到，对修正主义者所持的殘酷态度（着重号是作者加的，大概是想暗示要把“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吧），主要是党内的正式代表不信任‘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讀过論反对戒严状况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英国的名詞，Outsidertum），傳統对一切異乎寻常的現象表示不信任，沒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表示不信任”（見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決議），“一句話，就是我們在前面所說明的那种傾向，就是党内官僚主义和集中主义的傾向”。

“紀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憤怒，并不亚于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他写道：“……有人指斥修正主义者缺乏紀律，只是因为他們給‘社会主义月刊’写

过文章，有人甚至不願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縮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要人在应当有绝对自由的思想工作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請回忆一下所謂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組織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說法）“就足以証明那种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絕，百般攻击这种創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組織，一个策略，一个理論”的可恨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簡單化的集中制”的要求等等，真是“仿照得阿克雪里罗得”一字不差。

沃·海涅所挑起的爭論激烈起来了，既然德国党内没有什么补选問題的无謂爭吵把这个爭論遮盖起来，既然德国的阿基莫夫之流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經常在專門的机关刊物上闡明自己的面目，于是这次爭論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統派和修正派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們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制”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資格出面說話的，是考茨基（1904年“新时代”杂志第28期的《Wahlkreis und Partei》——“选区和党”一文）。他說：“沃·海涅的論文表明整个修正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德国而且法国和意大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到处拚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烏有的，他們的傾向到处都在导向組織的瓦解，把“民主原則”歪曲为无政府主义。考茨基教訓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者說，“民主并不是沒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統治他們委任的代表，它与那些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統治者的权力形式不同”。考茨基詳細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自治派所起的破坏組織的作用，說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①参加社会民主运动，才使机会主义、自治主义和違背纪律的傾向加强起来，

并且再三提醒說“組織是无产階級解放自己的武器”，“組織是无产階級所特有的階級斗争的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差，所以那里的“自治制的傾向”所产生的結果，不过是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②和迫害異教徒的相当好听的高調，只是无数吹毛求疵的議論和爭吵，分析这种議論和爭吵只会引起无数的口角”。

俄国党內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差，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少，“好听的高調”和爭吵的成分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結論說：“也許，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問題上，都不像在組織問題上表現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異。”在談到正統派和修正派在这方面的基本傾向时，考茨基也用“吓唬人的字眼”表示說：官僚主义和民主主义 *versus* (相对立)。考茨基写道，据說，給予党的执行委员会权力来影响各地选区選擇候选人(国會議員候选人)，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則，因为民主原則是要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自动地来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来进行……但是，如果說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則，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會議員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問題，所以党至少應該經過党所信任的人 (*Vertrauensmänner*) 去影响指定候选人的事情。“如果誰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那就不妨让他試一試，建議由全体黨員 (*sämtliche*

① 考茨基把 施勒斯 拿来作例子。这种人总是傾向于机会主义，他們也就“必然覺得党紀律对于他們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許的拘束”。

② *Barrstrolch*——开除教籍。这是德国人用来表示俄国人所謂“戒严状况”和“非常法”等語的名詞。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字眼”。

Parteigenossen) 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根本用不着埋怨缺乏民主精神,因为上述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是由党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的。”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个别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谈”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受到驳斥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乃至“用精确的章程确定下来^① (statutarische Festlegung), 同时加强组织的严格性 (grössere Str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严格性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还只私下里答应在将来什么时候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德国的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的聪明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解放派先生,——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响应了这个新的争论,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

^① 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党章法来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这个问题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召开党代表大会时起所经历的全部“更换”对照一下,是非常有益的。请看看苏利奇的演说(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以及以后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更换的全部意义。

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拼命地袒护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由德国交易所资本创办的“法兰克福报”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刊），它表明无耻剽窃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刊物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里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拚命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反对“党内独裁”，反对“党内首长的绝对统治”，反对“专门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手段，反对“盲目服从”“死板纪律”的要求，反对“唯命是从”，反对把党员变成“政治死尸”（这比讲小螺絲釘和小輪子更厉害！）的要求。交易所里的騎士們在社会民主党那里看见反民主的制度时愤愤不平地说，“据说，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应当加以取缔，因为这种个性有产生法国制度的危险，即产生饑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如曾德尔曼在薩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直接说过的那样。”

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原则的含义，毫无疑问，这也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是用同样的字眼表现出来的。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虽然有上述条件的差别^①，但是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

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組織問題上的思想过程和傾向显然是相同的。由于从前在我国馬克思主义者中間和目前在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間有許多急进知識分子，所以由这种知識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也就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現出来。从前我們是在世界觀的基本問題上，即在綱領的問題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因此在目的方面的整个分歧也就必然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馬克思主义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我們社会民主党人分道揚鑣。后来我們是在策略問題上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因此我們同克思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較次要問題上的分歧也就自然只是暫時的，並沒有弄到什么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現在我們应当克服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这些問題当然不像綱領問題和策略問題那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們在目前却涌到我們党内生活的前台来了。

談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决不当忘记整个現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現出来的特征，模稜面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來說总是迴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問題，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間像游蛇一样迴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見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善良天真的願望等等。綱領問題上的机会

-
- ① 現在誰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問題上分成經濟派和政治派，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虽然馬尔丁諾夫和阿基莫夫两同志同馮·福尔馬尔和馮·愛里姆两同志，或同薩勒斯和米勒当两人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組織問題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问又是相同的，虽然，人民沒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間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編輯部走馬看花式地涉及考茨基和海涅的爭論时（見第64号），畏縮地迴避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統派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傾向問題。

主义者爱德·伯恩斯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綱領的，虽然他本来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綱領，但是他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闡明“批評”的“一般原則”（主要是用非批判的态度抄襲资产階級民主派的原則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者馮·福尔馬尔同志也是同意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老策略的，也是多半只唱唱高調，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風涼話，但是根本不提出什么肯定的“關員主义的”策略。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者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直到現在也沒有提出什么可以“用党章調定下来的”肯定的原則論点，尽管有人一再公开提醒他这样做；他們本来也願意，絕對願意“根本改良”我們的組織章程（“火星报”第 58 号第 2 版第 3 栏），但是他們宁願先来讲“一般組織問題”（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們这个不管第 1 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主义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馬尔托夫同志当然連在自己面前也不願意承认自己有原則上走向自治制的傾向）。因此，他們在組織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也就来得五花八門，多半是唱一些幼稚的高調，談些什么专制和官僚主义，什么盲目服从、小螺絲釘和小輪子等。——这种高調非常幼稚，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則性的意思，哪些真正是补选問題的意思。可是他們愈陷愈深，他們企图對他們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必然会导致自治制；他們企图“加深”和論証自己的观点，这必然要为落后現象辯护，走向尾巴主义，作吉倫特主义的空談。最后，无政府主义原則是作为唯一的、真正肯定的、因而在實踐上表現得特別明显的（因为實踐总是走在理論前面的）原則表現出来的。藐視紀律，要求自治，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們那个組織問題上的机会主义派反复玩弄的一套戏法，尽力搪塞，根本不肯

把自己的原則肯定地表述出來^①。在綱領和策略上的機會主義派那里，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這套戲法：藐視“正統思想”、忠實信仰、狹隘死板；提倡修正主義的“批評”和團員主義；鼓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

在一切現代機會主義者以及我國少數派的一切著作中發出的那種延綿不斷的埋怨聲調，都是同仇恨紀律的心理有密切聯系的。據說，有人在迫害他們，排擠他們，趕走他們，圍困他們，欺侮他們。在這些字眼里流露出來的真實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製造某某人被欺侮和某某人欺侮人這類談諧而動聽的笑話的人自己所意料的得多。比如，拿我們黨代表大會的記錄來看，就可以看出少數派都是一些在某個時候和因為某件事情受過社會民主黨革命派

① 現在，回想一下黨章第1條的爭論，就會清楚地知道，馬爾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羅得同志在黨章第1條問題上的錯誤的發展和加深，必然導向組織上的機會主義。馬爾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黨的思想，正是虛偽的“民主主義”，是自下而上建立黨的思想。相反的，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義化的”，就是因為我主張自上而下，由黨代表大會到各個黨組織來建立黨。無論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也好，無論是无政府主義的詞句也好，無論是機會主義的、尾巴主義的深奧思想也好，都是在對黨章第1條的爭論中就顯露了出來。馬爾托夫同志在“戒嚴狀況”一書（第20頁）中說新“火星報”上“開始了思想工作”。這種說法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因為他和阿克雪里羅得確實是從黨章第1條開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進的。只是不幸這個新方向是機會主義的方向，他們越順着這個方向“工作”下去，他們的這種工作越脫離補選問題的無謂爭吵，他們也就越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漢諾夫同志在黨代表大會上已經看出了這一點，並且他在“不該這麼辦？”一文中又再次警告過他們說：我甚至情願把你們補選進來，不過你們不要順着這條只會走到機會主義和无政府主義方面去的道路走去。——但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得兩人並沒有接受這個忠告，他們說：什麼話？不順着這條路走？要贊同列寧所說補選不過是一種無謂爭吵的意見嗎？絕對不行！我們要向他表明我們是些講原則的人！——果然表明了。他們已經向大家具體地表明了，如果說他們有什麼新的原則，那不過是機會主義的原則。

的欺侮的人。这中間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們把他們“欺侮”得退出了代表大會；这中間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們因为一切小組和他們自己的小組遭到压制而受到致命的侮辱；这中間有馬霍夫同志，他每当講話的时候都受到了侮辱（因为他每一次都丢丑）；最后，这中間有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們受到侮辱是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是因为在选举中遭到了失敗。所有这些难堪的侮辱，都不象許多庸夫俗子至今想象的那樣，是由于有什么人說过不可容許的挖苦話，作了激烈的攻訐，进行了瘋狂的論战，有什么人把門关得很响，有什么人要他以老拳等等偶然引起的結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結果。如果我們在这三年中不仅說了一些空話，而且表示了一种應該行动起来信念，那末，我們在代表大會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們和公开站在前列进行过斗争的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欺侮过以后，我們只要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馬尔托夫同志侮辱一下，就会使他們忍无可忍。数量轉变成质量了。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侮辱的人都忘記了相互間的嫌隙，嚎啕大哭，互相拥抱起来，并树起了“反列宁主义的起义”^①旗帜。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本是一件好事情。革命派实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也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实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不妙了。

普列汉諾夫同志只得以战俘的資格参加这种不妙的勾当。他

① 这种奇怪的想法是馬尔托夫同志說出来的（見“戒严状况”一书第68頁）。馬尔托夫同志总想等到他自己方面湊成五个人时实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論战手法并不巧妙，他分明是想用絕頂恭維敌人的办法来消灭敌人。

竭力要“泄憤出氣”，想在这个或那個起草有利於“多數派”的決議的人那里挑剔一下個別不恰當的詞句，並高聲嘆息道：“窮得可憐的列寧同志呵！他的正統派真妙呵！”（見“火星報”第68號的附刊）。

可是，普列漢諾夫同志呵，如果說我窮得可憐，那末，新“火星報”編輯部就未免窮得靠乞討過日子了。無論我怎麼樣窮，但我總還沒有窮到非乞討不可，沒有窮到只好閉起眼來不看黨代表大會，而到某些地方委員的決議中去找材料來練習自己的機智。無論我怎樣窮，但我總比某些人關千百倍，他們的擁護者不是偶而說出某句不恰當的言語，而是在一切問題上，不論在組織問題也好，在策略問題或綱領問題上也好，都是死死地抓住同社會民主黨革命派原則相反的原則的。無論我怎麼樣窮，但我總還沒有窮到只好把這班擁護者贈給我的頌詞向公眾隱瞞起來的地步。可是新“火星報”編輯部只好如此。

讀者們，你們知道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沃龍涅什委員會是個什麼東西嗎？如果你們不知道，可以讀一讀黨代表大會的記錄。你們從那里可以看出，這個委員會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勃魯克爾兩同志表現了出來，這兩位同志在代表大會上對我們黨的革命派進行過全面的鬥爭，並且有幾十次被大家——從普列漢諾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當作機會主義者來看待。正是這個沃龍涅什委員會在它的一月份的傳單（1904年1月第12號）上聲明說：

“去年在我們不斷發展的黨內，發生了一件對於黨有重要意義的大事件，舉行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即有全黨一切組織的代表參加的大會。召集黨代表大會本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條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險很困難的事情，因此難怪召集這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會本身雖然完全平安無事地舉行過了，可是並沒有滿足黨對它所提出的一切要求。1902年代表會議委託負責召集代表大會的那些同志被逮

補了，因此召集代表大會的事情只是由俄國社會民主黨內一個派別——火星派——指定的那些人擔任的。許多屬於社會民主黨而不屬於火星派的組織，都沒有被吸收來參加代表大會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使代表大會關於制定黨綱和黨章的任務執行得很不完善，至於黨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險的誤會的’重大缺陷，連參加代表大會的人自己也是承認的。在代表大會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於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許多從前似乎完全接受過、‘火星報’的行動綱領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識到該報許多主要由列寧和普列漢諾夫兩人所主張的觀點不切合實際。雖然他們兩個人在代表大會上也占過上風，可是實際生活的力量，實際工作——即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參加了的實際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糾正了理論家的錯誤，並且在代表大會開完以後就提出了嚴重的修正。‘火星報’大大地改變了，並且答應細心聽從社會民主黨內一切活動家的要求。這樣，雖然代表大會的工作應當由下屆代表大會來審查，並且在代表大會參加者本人看來，顯然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此也就不能由黨採納為不可改變的決議，可是代表大會闡明了黨內狀況，對於黨今后的理論工作和組織工作給予了大量的材料，此次代表大會對全黨的工作來說，也是一個大有教益的經驗。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和制定的黨章，將受到一切組織的注意，但是由於它們具有顯而易見的缺點，許多組織都表示反對只以它們為指南。

沃龍涅什委員會了解全黨工作的整個重要性，所以對組織代表大會的一切問題熱烈地發表了它的意見。它意識到代表大會上發生的事情的整個重要性，歡迎已經成了中央機關報（主要機關報）的‘火星報’所發生的轉變。雖然黨內和中央委員會內的狀況還不能令我們滿意，但是我們相信，困難的建黨工作經過共同的努力是會日益改進的。鑒於有許多謠言，沃龍涅什委員會特向同志們聲明，關於沃龍涅什委員會退黨一事是根本談不上的。沃龍涅什委員會十分了解，象沃龍涅什委員會這樣一個工人組織退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會是一個多么危險的例子，會是加於黨的一種多么厲害的責備，這對那些能仿效這種先例的工人組織是多么的不利。我們需要的不是製造新

的分裂，而是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并且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定期大会，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审讯来进行，因此任何一个组织，甚至中央委员会本身也没有权利开除某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龙涅什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整个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容易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员，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了解已有的大量文献的人，每个想了解许多摘录的指证、断章取义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其中每个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且把各个显然不同的主要阶段列举出来：（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提出机会主义条文，因而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了。（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

里也夫參加五人小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文斯基參加三人小組——發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漢諾夫爭得了多數（9票對7票），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由於我們在黨章第1條的問題上占少數。馬爾托夫同機會主義者的聯盟，具體地証明了組委會事件使我產生的種種焦慮。（3）關於黨章細節的爭論的繼續。機會主義者又來援救馬爾托夫。我們又處於少數地位，並捍衛少數在中央機關內的權利。（4）七個極端機會主義者退出代表大會。我們成了多數並在選舉中戰勝了聯盟（即火星報少數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聯盟）。馬爾托夫和波波夫拒絕接受我們所提出的兩個三人小組中的席位。（5）在代表大會閉會以後因為補選問題而發生的無謂爭吵。無政府主義行為和無政府主義詞句盛行一時。最不徹底和最不堅定的分子在“少數派”中占上風。（6）普列漢諾夫為了避免分裂而採取了《kill with kindness》政策。“少數派”占據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和總委員會，並且竭力攻擊中央委員會。無謂爭吵仍然充斥於一切。（7）對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次攻擊的被打退。無謂爭吵似乎開始稍微平息下來。這樣便有可能比較心平氣和地討論兩個純系思想性質而又使我們黨極為關心的問題：（甲）我們黨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分成“多數”和“少數”兩派從而代替了一切舊的劃分這個事實的政治意義和原因何在？（乙）新“火星報”在組織問題上的新立場有什麼原則意義？

每個階段都有其根本不同的鬥爭情勢和特殊的直接攻擊目標，每個階段都可以說是一個总的戰役中的個別戰鬥。不研究每個戰鬥的具體情況，就絲毫不能了解我們的鬥爭。我們把這一點研究清楚以後，就會明顯地看出，發展過程確實是按着辯證法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進的；少數變成多數，多數變成少數；各方時而轉守為攻，時而轉攻為守；思想鬥爭的出發點（黨章第1條）“被否

定”，让位給充斥于一切的无謂爭吵^①，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們既然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房共居”，就又回到純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了；但是这个“正題”已由“反題”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并变成了最高的“綜合”；这时对于党章第1条問題的单独的偶然的錯誤，已經发展成了对于組織問題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謂体系；这时这个現象同我們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根本划分的联系，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苗是按黑格尔的規律生长的，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彼此之間的斗争也是按黑格尔的規律进行的。

可是，無論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馬克思主义使其脚朝地后还加以接受的黑格尔的偉大辯証法，拿来同那种替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滾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出尔反尔进行辯护的庸俗手段混为一談，不应当把它同那种硬将各个声明，統一过程中各个阶段发展的个别面素混作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談。真正的辯証法并不辯护个人錯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轉变，根据十分詳細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証明这种轉变的不可避免性。辯証法的基本原理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 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黑格尔的偉大辯証法同那种可以用 *mettere la coda dove non va il capo* (脑袋钻不进去的地方，就把尾巴塞进去) 这句意大利諺語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妙訣混为一談。

我們党内斗争的辯証发展过程的总结可归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所公正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說俏皮話的人也說得

① 把无謂爭吵和原則分歧区分开这个难题，現在已經自行解决，凡是涉及补选問題的都是无謂爭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斗争情形，涉及党章第1条問題以及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傾向問題的爭論都是原則分歧。

对，他們說世界是由革命推进的，所以我們也实行了一次革命！他們在代表大会以后，果然实行了一次革命；一般地說世界是由革命推进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个一般的成語来断定，因为如果把永志不忘的馬霍夫同志的那个永志不忘的句子换个样子來說的話，也有类似反动的革命。为了断定某次具体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們党），就必须知道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成了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就必须知道究竟是革命原則还是机会主义原則鼓舞了战士。

我們党的代表大会是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現象。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出現于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們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結局，表明了我們党以及它的每个多少显著的部分在綱領、策略和組織問題上的全部面貌。我們第一次摆脱了小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傳統，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結合在一起，这些集团往往是彼此极端仇視，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們甘願（在原則上甘願）为了我們第一次在事实上創立起来的偉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战利品并不是不用代价就能得来的，而是經過战斗争取来的。为了消灭小組而进行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異常殘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風变成了狂風。这个狂風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組习气、情感和傳統的殘余，第一次創立了真正富有党性的負責集体。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則上为了党牺牲小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棄自己的小組又是一回事。清風对那些习惯于腐敗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鮮了。“党

沒有經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全國大會的考驗”，像馬爾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處在少數地位”中所公正說過的（偶然公正說過的）那樣。為小組被消滅而受的气未免太厉害了。狂風把我黨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都翻上來了，於是這些渣滓就卷土重來。以前頑固的小組習气压倒了還很年輕的党性。黨內被徹底粉碎的機會主義派，用偶然的阿基莫夫的鹵獲品加強了自己的力量，又對革命派占了一——當然是暫時的——優勢。

結果，產生了新“火星報”，這個新“火星報”不得不發展和加深它的編輯們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所犯的錯誤。舊“火星報”曾教人領會革命鬥爭的真理。新“火星報”却教人領會處世妙訣：忍讓與和睦相處。舊“火星報”是戰鬥的正統派的機關報。新“火星報”使機會主義死灰復燃——主要是在組織問題上。舊“火星報”為俄國機會主義者以及西歐機會主義者所痛恨，但這是光榮的。新“火星報”“聰明起來了”，很快就不再以極端機會主義者贊揚它為耻了。舊“火星報”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進，言行一致。在新“火星報”上，由於它的立場的虛偽必然產生——甚至不以什麼人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政治上的偽善態度。它大罵小組習气，是為了掩護小組習气對黨性的勝利。它假仁假義，斥責分裂，似乎除了少數服從多數以外，還可以設想用什麼其他手段來防止一個多少是有組織的黨發生分裂。它聲明必須考慮革命輿論，同時卻又隱瞞阿基莫夫之流的贊揚，並製造一些無聊的謠言來誣蔑我們黨內革命派的委員會^①。這是多么可耻呵！他們把我們的舊“火星報”糟蹋到何等地步了呵！

進一步，退兩步…… 在個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以及

^① 為了這件可愛的工作，甚至制定一個固定的格式，根據我們自己的某一個通信員的報告，多數派的某一個委員會虐待了少數派的某某同志。

政党的发展中也有这种现象。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怀疑一分钟，也是一种罪大恶极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造成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用顽强而有步骤的劳动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全部致命的危险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和在我们纲领和我们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既然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的竞争所分散，既然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既然经常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或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这支大军遭到任何曲折和后退，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词句，不管人们对落后小组习气怎样大加赞美，不管人们怎样炫耀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它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附 录

古謝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的冲突事件

这个事件和本书正文第十节所引用的馬尔托夫和斯塔罗維尔两同志的那封信里提到的所謂“伪造”(馬尔托夫同志的說法)名单有密切联系,这个事件的实情如下。古謝夫同志曾經通知巴甫洛維奇同志,說这份由史騰、叶哥罗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同志构成的名单,是捷依奇同志轉交給他古謝夫的(巴甫洛維奇同志的信,第12頁)。捷依奇同志曾为古謝夫同志这个通知,責备他是“故意誣蔑”,后来同志仲裁法庭认定古謝夫同志的“通知”“不正确”(見“火星报”第62号刊载的法庭判詞)。当“火星报”編輯部把法庭的判詞登出来以后,馬尔托夫同志(已經不是編輯部)又印发了一个题为“同志仲裁法庭的判詞”的傳单,他在这个傳单上不仅印了法庭的判詞全文,并且印了关于此案全部审理經過的記錄以及他自己所写的补充說明。在这个說明里,馬尔托夫同志說“为了进行派別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为了回答这张傳单,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利亚多夫同志和哥林同志印了一张题为“仲裁法庭中的第四个人”的傳单,在这里他們“坚决表示反对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因为馬尔托夫同志比法庭判詞讲的更厉害,硬說古謝夫同志动机不純”,虽然法庭并没有认为这里有什么故意誣蔑的成分,只是认定古謝夫同志的通知是不正确的。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詳細地解釋了古謝夫同志的通知可能是出于一种完全自然的誤会,并把馬尔托夫同志的行为估計为“无理取鬧”,因为馬尔托夫同志自己发表过(并且在自己的傳单中还发表)許多錯誤声

明，隨便罵古謝夫同志動機不良。他們說，這裡根本不能有什麼不良的動機。據我所知，關於這個問題的全部“文獻”就是如此，我認為自己應盡的責任是要幫助說明這個問題。

首先必須使讀者完全了解這個名單（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出現的時間和條件，我在本書正文裡已經指出，“火星報”組織在代表大會時期召集會議商量過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的問題，以便共同向代表大會提出一個相當的名單。這次會議結果發生了分裂；“火星報”組織中的多數派通過了由特拉文斯基、格列博夫、瓦西里也夫、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構成的名單，但是少數派不願讓步，而堅持由特拉文斯基、格列博夫、佛敏、波波夫、托洛茨基五人構成的名單。“火星報”組織中的兩部分人在提出和表決這兩個名單的那次會議以後，就再沒有在一起集會過。雙方都在代表大會上進行自由鼓動，想用整個黨代表大會的表決來解決這一引起他們分歧的爭論問題，並且雙方都極力想把盡量多的代表人數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在代表大會上進行的這種自由鼓動，立刻就暴露了我在本書正文裡十分詳細分析過的那件政治事實，即火星報少數派（以馬爾托夫為首）要戰勝我們，就必須依靠“中派”（泥潭派）和反火星派。這確實是必要的，因為絕大多數反對反火星派和“中派”的攻擊而一貫捍衛火星派的綱領、策略和組織計劃的代表都很快很堅決地站到我們方面來了。從既不屬於反火星派，又不屬於“中派”的33個代表（更確切些說，33票）中，我們很快就奪得了24個，並和他們訂立了“直接協定”，形成了“緊密結合的多數派”。而馬爾托夫同志方面只剩下了9票；要取得勝利，他就必須得到反火星派和“中派”的全部票數，然而他和這兩派雖然能夠一同行進（如在黨章第1條問題上），雖然能夠實行“聯盟”，即能取得他們的贊助，但是並不能同他們訂立直接協定，其所以不能是因為他在

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始终都和我們一样激烈进行过反对这两派的斗争。这也就是馬尔托夫同志处境可悲而又可笑的原因！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戒严状况”中想用一個毒辣得要命的问题来消灭我，说什么“我們敬請列宁同志爽爽快地回答一个问题：‘南方工人社’在代表大会上究竟对于誰是局外人呢？”（第28頁，附注）。我恭而敬之，爽快地回答說，对于馬尔托夫同志是局外人。証据是我很快就同火星派分子訂立了直接协定，而馬尔托夫同志当时却无论是同“南方工人社”，无论是同馬霍夫同志，无论是同勃魯克尔同志，都沒有訂立过并且也不能訂立直接协定。

只有把这一政治形势弄清楚以后，才可以了解所謂“伪造”名单这一麻煩问题的“关键”。請具体設想一下当时的实在情形吧，“火星报”組織是分裂了，我們双方都在代表大会上自由鼓动拥护各自提出的名单。在許多个别的私人談話中进行这种鼓动时提出的名单有好几个方案，时而提出三人小組来代替五人小組，时而又用这个候选人来代替那个候选人。例如，我很清楚地記得，在多数派的私人談話中曾經提出过魯索夫、奧西波夫、巴甫洛維奇、迭多夫²⁵等同志为候选人，但是在討論和爭論以后又把他們取消了。也許还提出过我所不知道的其他候选人。大会上每一个代表都在談話中表示过自己的意見，提出过某些修正，参加过爭論等等。很难設想这种情形只会在多数派中間发生。甚至可以肯定，在少数派中間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因为我們从馬尔托夫和斯塔羅維爾两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原定的那个五人小組（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后来用三人小組（格列博夫、托洛茨基、波波夫）代替了，并且格列博夫又不中他們意，于是他們乐意用佛敏来代替他（見利亚多夫和哥林两同志印发的傳单）。不要忘記，我在本书正文內把大会代表分成各个集团，是根据 post

factum^①所作的分析划分的。其实，这些集团在进行竞选鼓动时还刚刚开始形成，当时各个代表之间的意见交换是进行得完全自由的；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壁垒”，当时每个代表只要想同其他任何一个代表私下交谈，就可以随便去同他交谈。当时情况既然如此，那末在各种方案和名单中，除了“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提出的名单（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格列博夫、特拉文斯基）之外，还有过一个与它没有很大区别的名单，即由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什特伊恩、叶哥罗夫五人构成的名单，这也就毫不足怪了。这样一种候选人名单的产生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我们的候选人——格列博夫和特拉文斯基，显然是不中“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的意的（见他们那封载于本书正文第十节的信，在这封信里他们把特拉文斯基从三人名单中取消了，而关于格列博夫，干脆说是一种妥协办法）。用组委会委员什特伊恩和叶哥罗夫两人来代替格列博夫和特拉文斯基，原是完全自然的事；反之，如果党的少数派代表中未曾有过一个人想要实行这样一种更替，那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由叶哥罗夫、什特伊恩、波波夫、托洛茨基、佛敏五人构成的名单，究竟是誰提出来的呢？（2）为什么马尔托夫同志一听到有人把这样一个名单推到他头上就大发雷霆呢？为了准确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必须向全体大会代表询问一番。但是这在目前办不到。就必须特别弄清楚，党的少数派（不要把党的少数派和“火星报”组织中的少数派混为一谈）中，究竟有哪些代表在大会上听见过那两个引起“火星报”组织分裂的名单呢？他们究竟是怎样对待“火星报”组织中的多数

① 事后。——编者注

派和“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提出的这两个名单呢？他們沒有提出过，沒有听见过什么要对“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的名单作一种适当改变的假設或意見嗎？可惜，这些問題在仲裁法庭上仿佛也沒有提过，仲裁法庭（根据法庭判詞全文来看）甚至始終不知道“火星报”組織究竟是因为怎样的两个“五人小組”发生分裂的。例如，別洛夫同志（我认为他是“中派”的一分子）“曾經供认，他和捷依奇有很好的同志关系，捷依奇同他說过他自己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感想，所以如果捷依奇进行过什么拥护某种名单的鼓动，那他一定会把这件事通知別洛夫”。可惜始終沒有弄清楚，捷依奇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是不是和別洛夫同志說过他对于“火星报”組織的那些名单的感想？如果說过，那末別洛夫同志对“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提出的五人小組名单的态度又該是怎样的呢？他沒有提过或沒有听过对这个名单的适当改变嗎？既然这个情节沒有弄清楚，所以別洛夫和捷依奇两同志的口供中也就含有哥林和利亚多夫两同志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捷依奇同志——恰恰和他自己的断語相反——“曾經鼓动拥护”“火星报”組織拟定的“某些中央候选人”。接着別洛夫同志指出，“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傳閱的那个名单，他大約是在代表大会閉幕前两天遇見叶哥罗夫同志、波波夫同志和哈尔科夫委员会的代表时私下听到的。当时，叶哥罗夫曾經表示惊奇，为什么人家竟把他列入中央候选人名单，因为他——叶哥罗夫——认为把他推举为候选人是不能在大会代表中間——無論是在屬於多数派的代表中間或在屬於少数派的代表中間——博得同情的”。极可注意的是，这里显然是指的“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因为在党的代表大会其余的少数中間，把叶哥罗夫同志——組委会委員和“中派”出色演說家——推举为候选人的提議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可惜，正是关于党的少数派內不屬於“火星

報”組織的那些分子是不是同情的問題，我們從別洛夫同志口中根本沒有聽見什麼消息。而這個問題正是一個主要問題，原來捷依奇同志埋怨人家不應該把這個名單推到“火星報”組織中的少數派頭上，但這個名單可能是由不屬於這個組織的少數派搞出來的！

當然，現在很難想起，究竟是誰最初主張提出這樣一個候選人名單，我們中間每個人究竟是從誰的口中聽見這個名單的。例如，我既不記得這一點，並且也不記得多數派中間最初提出上述那個包括魯索夫、迭多夫等人的候選名單的究竟是誰；從許多關於各種候選名單的談話、假設和傳聞中，我只記得那些直接在“火星報”組織中或在多數派的非正式會議上提過的“名單”。這些“名單”多半是用口頭傳達的（在我的給“‘火星報’編輯部的信”第4頁倒數第5行里所指的那個“名單”，也就是指的我用口頭方式在會議上提出的五個候選人），但是往往也會記在字條上，這種字條一般是在代表大會的會議上由這一個代表遞給另一個代表，並且通常在散會以後就把它們銷毀了。

既然沒有精確的材料能夠說明這個轰动一時的名單的起源，那我們只好假定，或者是一個為“火星報”組織中的少數派所不知道的黨內少數派的代表曾主張提出這樣一個候選人名單，因此這個提議也就經過口頭和書面方式在代表大會上傳開了；或者是“火星報”組織中的少數派的某一個人在代表大會上曾經主張提出這樣一個名單，但是後來他把這一點忘掉了。我覺得後一假定更為可靠。這是因為提出什特伊恩同志為候選人的意見在代表大會上顯然得到過“火星報”組織中的少數派的同情（見本書正文），而提出葉哥羅夫同志為候選人的意見顯然是這個少數派在代表大會閉會後產生的（因為無論在同盟代表大會上或在“戒嚴狀況”中都对組委會沒有被批准為中央委員會一事表示惋惜，而葉哥羅夫同

志就是組委会的一个委員)。既然如此，既然这个想把組委会委員变为中央委員的主張显然在某些人的脑子里盘旋过，那末假設少数派的某一个人在私人談話和在党代表大会上提出过这种主張，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嗎？

可是，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不願意作这种当然的解釋，总想认定这里面有龔龔，有人蓄意陷害，有不誠实的成分，有人散布“明明虛假的、目的 在于中伤的謠傳”，有人“为了进行派別斗争而假造名单”等等。这个不正常的傾向只可說是侨外生活条件不健全或由于神經失常的結果，如果事情沒有弄到无理伤害同志信譽的地步，那我甚至根本不会談到这个問題。請你們想一想，捷依奇同志和馬尔托夫同志能有什么根据认定不正确的通知或不正确的傳聞含有醜醜的不良的意图呢？他們显然是由于神經失常，所以覺得多数派“詆毀”他們名声的，不是指出了少数派的政治錯誤（党章第 1 条以及和机会主义者联盟），而是把一个“明明虛假的”“假造的”名单推到少数派头上。少数派宁願說問題不是由于他們犯了錯誤，而是由于多数派采取了什么醜醜的不誠实的可耻手段！想在“不正确的通知”中找出恶劣意向原是极不合理的，——我們在上面敘述当时情况时已經指出这一点，同志仲裁法庭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它並沒有认定这里有什么誣蔑成分，什么恶意成分，什么可耻东西。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非常明显地証实了这一点，即早在党代表大会上还没有进行选举以前，“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就同多数派解釋过这种謠傳，而馬尔托夫同志甚至在他那封在多数派 24 个代表全体會議上宣讀过的信里也解釋过这种謠傳！多数派根本就没有想在“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面前隱瞞关于某一名单在代表大會上傳聞的事实，因为連斯基同志曾將此事通知过捷依奇同志（見法庭判詞），普列汉諾夫同志对查苏利奇

同志談过这一点（“同她是不能談話的，她仿佛把我看成特列波夫了”——普列汉諾夫同志曾經这样告訴过我，而这句重复过許多次的笑話再次証明少数派神經失常）。我曾經向馬尔托夫同志声明，說他的解釋（說这个名单不是由他——馬尔托夫——提出等語）在我看来已經够了（同盟記錄第 64 頁）。当时，馬尔托夫同志（我記得他是同斯塔罗維尔同志一起）向我們主席团递了一个內容大約如下的字条：“‘火星报’編輯部中的多数派請求允許他們参加多数派的非正式會議，以便駁斥那些对他們散布的可耻謠言。”当时我和普列汉諾夫两人就在这張字条上答复說：“我們並沒有听見過什么可耻的謠言。如果需要召集編輯部會議，那末关于此事应当特別約定。列宁、普列汉諾夫。”我們晚上出席多数派會議时，曾把这件事告訴过所有的 24 个代表。当时为了避免一切誤会，决定由我們 24 个人全体共同推选代表去向馬尔托夫和斯塔罗維尔两同志解釋一下。被选出来的两个代表，即索罗金同志和薩勃利娜同志，就跑去向他們解釋了一番，說謠也沒有把这个名单專門要馬尔托夫同志或斯塔罗維尔同志認賬，特别是听过他們两个人的声明以后，說这个名单究竟是由“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还是由不屬於这个組織的代表大会少数派搞出来的，是无关紧要的。要知道，事实上根本不能在代表大会上普遍查問一次！根本不能为了查問这个名单而向每个代表問一遍！可是，馬尔托夫和斯塔罗維尔两位同志又向我們写了一封正式辟謠的信件（見本书正文第十节）。这封信由我們的代表索罗金和薩勃利娜两位同志在 24 人會議上宣讀过。看来，这件事情已經可以告一段落了，——我說已經可以告一段落，并不是說已經找出了名单的来源（如果这对誰有兴趣的話），而是說完全排除了任何以为有人故意“危害少数派”或“中伤”某一个人，或故意“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的任何看法。

虽然如此，但是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大会上（记录第 63—64 頁）又把这个由病态心理勉强臆造的齷齪拖了出来，并且作出了許多不正确的通知（显然这是他自己神经过敏的结果）。他說，名单里有一个崩得分子。这是不对的。仲裁法庭的一切見証人——包括什特伊恩和別洛夫两位同志在內——都証实这个名单上有叶哥罗夫同志。馬尔托夫同志說，这个名单就是直接协定的联盟。这是不对的，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經說明了。馬尔托夫同志說，由“火星报”組織中的少数派提出的（并且能使代表大会多数拋棄这个少数的）其他名单，“甚至连假造也沒有假造过”。这是不对的，因为党代表大会多数全体都知道，由馬尔托夫同志及其伙伴提出的但沒有得到多数贊同的至少有三个名单（見利亚多夫和哥林两人印的傳单）。

一般說来，为什么这个名单竟使馬尔托夫同志气憤到如此地步呢？原来是因为这个名单說明他們轉到我們党的右派方面去了。当时馬尔托夫同志大喊大叫，反对“莫須有的机会主义罪名”，痛恨人家“把他的政治立場估計得不正确”，但是現在誰都看見，关于某个名单是不是由馬尔托夫同志和捷依奇同志提出来的問題并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其实这个罪名無論同这个名单或其他什么名单都是无关的，这个罪名不是誣加的而是真实的，对政治立場的估計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个勉强造成的关于轰动一时的名单的难办的案件，应当得出的总结如下：

(1) 馬尔托夫同志高喊“为了进行派别斗争而假造名单这件事是可耻的”，他用这种叫喊来伤害古謝夫同志名誉的行为，我們不能不与哥林和利亚多夫两位同志一起称之为无理取鬧。

(2) 为了改善气氛并且使党员不必认真对待任何一种反常的攻訐，也許应当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規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組織

章程里的一个規則。这个章程第 2 条中載称：“凡是違背党綱原則或犯有不名誉行为者，即不能再留在党内。关于他們的党籍問題，应当由党的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仲裁法庭来处理。审判員成分由提議开除者和被提出开除者各指定半数組成，主审員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指定。对于仲裁法庭判詞的控訴，可提交監察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审理。”这样的規則可能是一种对付那些輕意控告（或散布謠言）他人犯有什么不名誉行为的分子的好武器。在制定这种規則时，凡是屬於这样的控告，如果控告者不敢理直气壮地以控告者的資格在党面前說話并且力求得到相当党机关的判決时，即永远算作无理取鬧。

写于 1904 年 2—5 月

1904 年 5 月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按本书原文刊印并根据 1907 年
出版的弗拉·伊林“十二年來”
文集的手稿和正文作过校訂

注 釋

- 1 “进一步，退两步（我們党内的危机）”一书，是列宁在几个月内，詳細研究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會議記錄和決議、每个代表的发言、代表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別、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后写成的。

列宁的这本书引起了孟什維克的狂怒。普列汉諾夫要求中央擱棄列宁这本书。中央委员会的調和派企图阻止該书的刊印和发行。

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是在国外出版的，它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傳布很广。在莫斯科、彼得堡、里加、薩拉托夫、土拉、奧勒尔、烏发、皮尔姆、科斯特羅馬、希格雷、沙弗里（柯夫諾省）等地，在逮捕和搜查时曾經发现过这本书。列宁又把这篇文章刊印在“十二年来”文集中（1907年版，里封中印的是1908年版）。在新版中列宁刪掉了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等节，并在其他各节中作了某些刪改，同时也加了一些注釋。

本版完全按1904年第1版版本刊印，并保留作者对1907年第2版的补充材料。——第1頁。

- 2 “实际工作者”（帕宁）是孟什維克馬·薩·馬卡久勃的笔名。——第5頁。
- 3 1902年代表會議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代表會議，于1902年3月23—28日（4月5—10日）在別洛斯托克举行。“經濟派”和崩得分子企图把这次代表會議宣布为党代表大会。由列宁起草并由“火星报”代表在代表會議上加以說明的报告証明，这样的代表大会还没有准备好，也缺乏代表大会应有的权限。代表會議成立了負責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組織委员会，不久其中大多数委員被捕。同年11月，在普斯可夫會議上重新成立了負責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組織委员会。列宁在“‘火星报’編輯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各委員會會議（代表會議）的報告”中對別洛斯托克代表會議作了評價（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78—86頁）。——第5頁。

- 4 巴甫洛維奇的“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給同志們的信”，1904年日內瓦版。——第13頁。
- 5 索羅金是布爾什維克尼·艾·巴烏曼的別名；胡格是布爾什維克亞·米·斯托帕尼的別名。——第14頁。
- 6 “工人思想社”是“經濟派”的一個集團，他們出版了“工人思想報”。該報於1897年10月創刊，1902年12月停刊，共出16號。該報編輯有康·米·塔赫塔列夫等人。
列寧在發表在“火星報”上的文章中以及在“怎麼辦？”一書中，批判了“工人思想社”的觀點，指出它的觀點是國際機會主義在俄國的變種。
——第21頁。
- 7 柯斯特羅夫是高加索孟什維克諾·尼·饒爾丹尼亞的別名。——第34頁。
- 8 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決議彙編”1953年俄文第7版第1冊第43頁。——第36頁。
- 9 指1900年在漢堡發生的事件，這次事件是由於“石匠自由聯合會”一批會員在罷工期間違反中央聯合會的禁令竟去作包工而產生的。漢堡石匠聯合會向當地黨組織提出了這批會員社會民主黨人破壞罷工行為的問題。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指定的黨的仲裁法庭報責了“石匠自由聯合會”內這些社會民主黨人的行為，但否決了把他們開除出黨的建議。——第59頁。
- 10 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火星報”組織代表共16人，其中以列寧為首的多數派9人和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少數派7人。——第74頁。
- 11 薩勃利娜是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的別名。——第77頁。
- 12 格爾茨是德·伊·烏里揚諾夫的別名。——第84頁。

- 13 奥西波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布尔什維克罗·薩·捷姆里雅奇卡的別名。——第 126 頁。
- 14 列宁是指“經濟派”阿基莫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阿基莫夫反对“火星报”提出的党綱，其中一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一詞在党綱中不是主語，而是补語。——第 130 頁。
- 15 山岳派和吉倫特派是 18 世紀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资产阶级政治派別的名称。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当时的革命阶级即资产阶级中最坚决的代表，他們主張必須消灭专制政体和封建主义。吉倫特派和雅各宾派不同，他們动搖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并且走上了同君主派勾結的道路。
- 列宁称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派为“社会党的吉倫特派”，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山岳派”。——第 139 頁。
- 16 沃龙涅什委员会和彼得堡“工人組織”当时为“經濟派”所控制，对列宁的“火星报”及其建立馬克思主义政党的組織计划采取敌对立場。——第 141 頁。
- 17 即新任中央委員弗·維·林格尼克。——第 149 頁。
- 18 奥尔托多克斯是孟什維克柳·伊·阿克雪里罗得的別名。——第 167 頁。
- 19 巴札洛夫是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主要人物。——第 170 頁。
- 20 在 1903 年 11 月 25 日“火星报”第 53 号上同时发表了列宁的“給‘火星报’編輯部的信”（見“列宁全集”196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7 卷第 98—102 頁）和普列汉諾夫写的編輯部的回信。列宁在信中建議在該报上討論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原則上的意見分歧。普列汉諾夫拒絕这个建議，把这种分歧叫作“小組生活中的无謂爭吵”。——第 170 頁。
- 21 伊格烈克是中央委員調和派分子耳·耶·加尔彼林的別名。——第 173 頁。
- 22 指“合法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彼·別·司徒卢威的观点，列宁曾于

1894年秋天发表了题为“资产阶级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映”的演说反对司徒卢威。——第177页。

- 23 列宁是指馬尔托夫在“火星报”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嗎？”一文，馬尔托夫在該文中反对准备全俄武装起义，他认为准备武装起义就是空想和密謀活动。——第180页。
- 24 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勒斯頓代表大会于1903年8月31日—9月7日（9月13—20日）举行。代表大会指責了伯恩斯坦、布劳恩、党勒、大卫等修正主义者，但是并没有把他們开除出党，因此他們便毫无阻碍地繼續宣傳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第194页。
- 25 迭桑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多数派莉·米·克尼波維奇的別名。——第214页。